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英〕麦金德 著

武 原 译

内 部 读 物

商 务 印 书 馆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英〕麦金德著

武 原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65 年 · 北京

凡剑（Ken777）藏书

Halford J.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A Study in the Politics of

Reconstruction

Henry Holt &. Co. N.Y. 1942

内 部 读 物

民 主 的 理 想 与 现 实

〔英〕麦金德著

武 原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 107 号）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京 华 印 书 局 印 装

统一书号：12017·171

1965 年 5 月初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6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21 千字

印张 6　插页 1　　印数 1—3,400 册

定价（9）：0.65 元

出版说明

这是一本反科学的、反动的资产阶级地缘政治学著作。著者英人麦金德（1861—1947），是英国牛津大学地理学讲座的第一任主持者（1887 年开始），并曾长期担任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职务。他在本书中（1919 年初版），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解释”了地中海、欧洲半岛上三千年来重大的战争，提出了“陆权论”地缘政治思想。它鼓吹帝国主义国家统治集团染指东欧，以便统治“大陆心脏地带”（欧亚腹地），然后统治“世界岛”（欧、亚、非大陆），以至统治全世界。

“陆权论”地缘政治思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提出后，曾引起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广泛注意。以后由于通过纳粹将军豪斯贺费尔向希特勒的介绍，“陆权论”反动思想和其他反动的地缘政治思想，被当作纳粹德国“国家科学”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研究希特勒”的热潮的形成，伦敦、纽约又出版了麦金德著《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的再版本，本书一时又成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畅销书。

现在，在帝国主义国家，尤其是在美国，企图承继希特勒、麦金德衣钵的仍不乏其人。我们出版这本书，就是为了使读者得以清楚地了解麦金德的反动的地缘政治思想，并有助于展开对这种反动思想的批判，以推动当前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64 年 12 月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

重新建设的政治的研究

英国枢密院顾问官，近任帝国航运委员会主席，前任伦敦经济与政治学院院长、伦敦大学地理学教授，一度任牛津大学地理学讲师，《不列颠与不列颠海洋》一书作者
海福特·约翰·麦金德爵士阁下著

绪　　言

爱德华·米德·欧尔作

序

乔治·费尔丁·伊利奥特少校作

目　　录

1942年再版小言……………………………………………麦金德……1
引言…………………………………………………………麦金德……2
序……………………………………………………………伊利奥特……3
绪言……………………………………………………………欧尔……7
第一章　前景……………………………………………………………13

未来与和平；过去战争发生的原因；敌对利益集团之成长；关于国际联盟仅具法律的概念的危险性；世界残暴统治的可能性；提出的问题。

第二章　社会的动量……………………………………………………16

民主的理想主义及其随之而来的悲剧，它和现实的关系；“进行中的事业”的经济现实；“进行中的事业”的组织者，组织者从革命中涌现出来；组织者与社会纪律，伟大的组织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民主国家对专家的偏见；组织者从战略上考虑问题；他那“手段和方法”的头脑；拿破仑；俾斯麦；普鲁士的一切从战略出发的精神状态；日耳曼文化和战略；日耳曼的军用地图；经济方面的战略思想；但是民主国家从道德上考虑问题，“不并土地，不索赔款”；拒不从战略上考虑问题，除非为了防御，不得已而为之；如果不从地理的与经济的现实考虑问题，必遭失败。

第三章　海上人的观点…………………………………………………36

海洋是一个整体，这是地理的第一个现实，其重要性迄未完全认识清楚；因此需要从历史上来看；埃及的相互敌对的各河国；尼罗河被陆上强国“封住”变成了内

河；地中海上的敌对的各海上强国；地中海被陆上强国“封住”变成了内海；作为海军基地的拉丁半岛，海上强国以拉丁半岛为基地，包围“世界大海角”；拉丁欧洲半岛内部之分裂；因此较小的、但以海岛为海上基地的不列颠乘机发展成为海上强国；伦敦海上基地；关于大战中的海上强国；“世界岛”；海上强国最为重要的基地。

第四章　陆上人的观点……………………………………………… 71

从内陆看“世界岛”；“心脏地带”的地理位置；其他天然区域；阿拉伯中央地带；流动的骑手和种地人，阿拉伯人力图建立世界帝国；大草原地带；鞑靼之入侵及其后果；西藏高原以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西北通道；从“心脏地带”到阿拉伯又到欧洲畅通无阻，“心脏地带”在战略上的意义；黑海盆地包括在内；波罗的海盆地包括在内；“心脏地带”和“世界岛”一样，是实际上存在的事实；陆上强国的最为重要的堡垒。

第五章　各帝国互争雄长……………………………………………105

哥萨克人驰骋于“心脏地带”；俄罗斯人本土的清楚划分；真正的欧洲；分成东欧和西欧；二者之间的基本对抗；它们主要的分歧；东欧的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特腊法耳加战役似乎将历史的潮流分为两支，达一个世纪之久；英国与“并非欧洲”；但是实际上东欧是位置在“心脏地带”之内，没有两个潮流；19 世纪时英法政策一致，德国人企图控制东欧及“心脏地带”，引起世界大战；有组织的人力的经济现实——“进行中的事业”，政治经济与国家经济；1878 年的经济大改变；德国的政策是刺激人力的发展，然后运用人力，占领“心脏地带”；但是放任主义（自由贸易）也是帝国的政策；两种政策的冲突；它们是两个“进行中的事业”，冲突是无法避免的。

第六章　国家的自由……………………………………………132

我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但是几乎被打败了；如果德国得胜，如果只是在陆地上得胜，你就必须郑重考虑如何和一“心脏地带”帝国相处；“心脏地带”是世界自由之一贯的地理上的威胁；德国怎会犯了在西线发动攻势的错误；汉堡和人力政策；我们必须在现在把东欧和“心脏地带”分开；必须分成三个而不是两个国家体系；“中间层”国家的人民；如果办到这一点，国际联盟就有实现可能；但是决不能有占优势的伙伴；可是你又不得不郑重处理“进行中的事业”；在你那国联中，相当一部分会员国的力量应大致相等；关于若干具有世界重要性的战略要地，“进行中的事业”的未来，各国的不平衡的成长；理想的情况是独立国家经济发展的平衡；“进行中的事业”的悲剧，真正自由的国家为实现和平而制定的政策。

第七章　人的自由……………………………………………159

这种自由国家内的男男女女是否会更自由些；国内组织建筑在各个地区上之必要；否则组织就要建筑在全国范围的阶级及利益集团上；这便无可避免地引起国际的阶级战争；因此理想的情况是平衡的国家中之平衡的省；这种组织使最大多数的人获得最多的机会；民族运动的起因；反对不恰当的集中；兄弟国家必须在经济上平衡，必须由兄弟的省组成；兄弟关系之能否持久，有赖于对“进行中的事业”的发展的控制。

第八章　后记……………………………………………176

最近的英国大选，大选在世界范围内的意义；关于睦邻遗风之可贵。

附录　1919 年 1 月 25 日发生在法国外交部的事件的札记……………………………………………179

1942 年再版小言

我已同意本书再版，内容完全和 23 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翌日我所写的一样。近来大家对德国的地缘政治学派议论纷纷，而该派创始人豪斯贺费尔将军（General Haushofer）又在他的著作中着意提到我的观点，看来把我自己对这些观点的说法再次公诸于众，是有好处的。当目前的战争结束，和平恢复，正当的理想主义浪潮席卷我们英语国家时，人们是会更愿意倾听要求以现实主义来调剂的呼吁的，如果这样的呼吁曾经受了以后发生的事件的考验而分毫无损的话。

海 · 麦金德

1942 年 4 月

引　　言

这本书，不论其价值如何，不是由于战争时期狂热思想的冲动而写成的。所据以成书的许多意见，其梗概早在十多年前就曾在发表的文章中谈到了。1904 年，在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的一篇《历史的地理枢要》（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论文中，我简单谈到了“世界岛”和“心脏地带”。1905 年，我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杂志上写了一篇题为《量衡国家和帝国力量的人力》（Man-Power as a Measure of National and Imperial Strength）的文章。“人力”这一名词之流行，我相信是从这篇文章开始的。这一名词的含义，不仅包括作战力量，而且包括生产力——作为经济论证的焦点，应该是生产力而不是财富。我现在所以不揣冒昧，以较长的篇幅来阐述这些主题，是由于——我以为——战争证实了而不是动摇了我以前的观点。

麦金德

1919 年 2 月 1 日

序

我以惊奇、叹服、惋惜的心情读了这本书。

惊奇——居然会有人能如此清楚地看到了、衡量了世界战略〔德国人称之为“地缘政治”(Geopolitik)〕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心理等因素，以及每一因素和其他因素之间的恰如其份的关系。

可叹的是，世界战略这门科学，英语国家人民并没有予以任何重视。这方面的权威人士我们产生的不多，虽然，我们作为自由的人民要生存下去，世界战略具有极重大的意义。这说明了为什么当迫切的需要强迫我们关心“地缘政治”的时候，而出现在我们报刊上的和广播中的文章和讲话，大部分内容却肤浅、外行。

像海福特·麦金德爵士写的这本书，英语国家人民居然忽视了 20 多年之久，而在这段时期内，正是他们比任何其他时期都更迫切需要明智的见解，这一事实极足以说明我们如何趑趄不前，不愿按照海福特爵士为我们确定的看法来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这样考虑问题，否则就要国破家亡。

叹服——因为海福特爵士既做到了明晰地识透国家生存及其内在关系的基本要点，又能以同样明晰的道理和简洁的文字来阐述，使人人能读能懂。我也算写过一些这类问题，深知这方面一个问题上考虑已经相当成熟的概念，跟把这概念以晓畅的文字写出来之间，存在着一直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困难的原

因，当然在于世界战略的问题没有一个是可以孤立地钻研的：其内在关系之复杂，其千头万绪、五光十色的情况，使人一握笔杆，就出现了一大串令人头痛的“如果”、“但是”和“可是”等等。

这种生涩的笔墨，海福特爵士不知怎的设法避开了，而代之以平妥流畅、开门见山、见解客观的文字。

惋惜——这本书竟然几乎被正是为他们而写的人、说英语的人所忽视，却给德国人帮了大忙。德国人难得创造什么新东西，但是他们能够很快识货，利用别人的好主意。

人间再没有更好的例证，像豪斯贺费尔歪曲麦金德用以维护民主的原则而为纳粹的目的服务那样，来说明魔鬼引用圣经来达其目的的了。

但是，说到最后，麦金德讲的是原则。原则是不变的，只要有人肯花功夫去钻研领悟，都可以用它来为任何目的服务。因此，在法国沦陷到珍珠港事件之间一段争执尖锐的时期，麦金德的“世界岛”的原则，在我国有许多人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麦金德认识到世界越来越小，近代的交通和运输工具已把大陆变成岛；大岛只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的世界岛，该岛包括欧、亚、非三洲；一个就是南、北美洲所组成的较小的岛，澳洲则是作为面对亚洲的前哨，大不列颠则是面对欧洲的前哨。

他以冷静的、逼人的逻辑指出，如果有一个掠夺成性的强国，在整个“世界岛”上建立了无人敢与争衡的单一控制，并且在那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便会产生无可避免的后果。因为到那时候，南、北美洲只是一个较小的岛而已，人口不如，国家资源不如，力量的各个方面都不如。德国在欧洲所处的优越地位，和东欧在麦金德称之为“心脏地带”的欧亚广大中央地区所

处的优越地位在世界战略中所起的作用，人们还没有了解清楚。但是：

“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

这一结论逻辑严谨，无懈可击。这也是主张成立通情达理的国际组织所可能提出的最有力的和切合实际的论点。

除非我们西方世界的民主主义者目前就准备根据这种看法考虑问题，按照全面战略的最广的含义来研究全面战略，把世界大家庭成员的全部责任担负起来，并且不仅是口头上、而且是天天不放松地注意提高警惕，使世界确确实实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场所，否则我们的文明迟早要在地球上荡然无存，而被其他的东西所替代。

“我们要重新控制住自己，”麦金德说道，“否则我们便要成为世界地理不折不扣的奴隶，遭受唯物主义的组织者的剥削。”

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我们就几乎到了这种不可收拾的境地。我们之得救，正如麦金德所指出的，是由于：

第一，英国舰队处于戒备状态并出了海；

第二，法国的军事天才，这是法国军事学院深谋远虑的果实，因此尽管法军在其他许多方面疏于戒备，却赢得了马恩战役[①]的胜利；

第三，人数不多的英国正规军在伊伯尔[②]首战中所作的壮烈牺牲。

① 马恩（Marne），河名，位于法国东北部，西流至巴黎附近入塞纳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军在该河沿岸迎击德军得胜。——译者

② 伊伯尔（Ypres），市镇名，在比利时西部。——译者

换句话说，我们那次是“由于我们一般人都不肯从长远看问题，不肯早作准备，而被异常的天才和异常的英雄主义救出来的——这正是民主国家的力量、也是它的弱点的最好说明”。

我认为这样说是公道的：这一次我们之得救，可能是由于皇家空军战斗机司令部的处于备战状态，克尽厥职，为我们保住了英国这个海上力量的堡垒；也由于红军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这种精神，在没有表现出来之前，我们西方国家的人谁也不信。但是这样的奇迹不会常有，冲击民主国家的浪潮，一个比一个更接近于把民主国家淹没了。路易十四比菲力浦二世更接近于取得霸权，拿破仑胜过路易十四，霍亨索伦王朝的威廉又胜过拿破仑，而希特勒胜过所有人，几乎得逞。我们一定要找到办法，使民主国家得以继续生存，并以民主国家出于仍不失其为民主而拥有的武器和办法，来保卫本国，使不遭受极权国家的侵略。

这便是麦金德教导我们的课题。阅读这课题，仔细考虑，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

乔治 · 费尔丁 · 伊利奥特少校

1942 年 6 月 14 日

绪　言

海福特·麦金德爵士写的这本小书，具有难得的永久性价值。虽然书成于1919年，着重提到了当时悬而未决的如何处理德国的问题，但是无论哪里都还没有一本更好的书，谈到影响我们世界的命运的地理事实。在任何其他地方，关于海上强国与陆上强国的相对力量，关于诸如铁路、汽车运输、潜艇和航空的发明打乱了二者之间的平衡的情况，都没有作出此本书更现实的估计。一代之前，更无他书如此清楚地预见到导致专制政治统治下的德国重新成为强有力的军国主义化的国家的环境。

海福特爵士是英国地理学家中的泰斗，但他更有所长。他是真正懂得战略的学者之一——懂得一种将国家力量中的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和心理等因素结成一个整体的全面战略。可以这样来说明他的才具：对于要知道我们的世界的政治动力学的人说来，他的著作在今天比马汉[①]海军上将所写的文章还要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对于掌握大权、可以左右国家命运的人的影响，至少和马汉的影响相等。这本书——关于地缘政治理论的第一本简明、权威性的英文著作，据卡尔·豪斯贺费尔将军称誉说，曾对德国的战略思想造成极深的印象。通过豪斯贺费尔，麦金德转而对希特勒的思想过程发生了影响，结果是他的若干意见出现于《我的奋斗》（Mein Kampf）的篇章之中。希特

① 马汉（Mahan，A.T.），1840—1914，美国人。——译者

勒对东欧的政策受这种影响特别显著;麦金德曾将这个地区称之为“历史的地理枢要”。

纳粹采用麦金德的观点,并不能解释为他对德国帝国主义有任何同情。正相反,所有他的作品,尤其是这本书,都曾提出警告:由于它的野心和它所处的在欧洲的战略位置,德国始终处于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与独立的地位,我们自己的国家也在内。他从开始就敏锐地感到,德国企图独霸世界的梦想很可能成为现实。40 年前——当马汉关于海军力量至上的理论的声名达于顶点时——麦金德告诉本国人民:英国的“海上霸权并非万世不变的基业”,海上强国可能被陆上强国迂回包抄,欧洲大工业国家之兴起(受到保护贸易主义的帮助)可能动摇英国经济与战略安全的基础,英国已不再可能采取有限责任的政策。他进一步警告说,如果英国一旦失去它当时所据有的、远远超过和它竞争的国家的领先地位,它的海上霸权和它的大国地位,可能都会一去而不复返。

他看到,由于德国和俄国在欧洲大陆上所处的位置,如果两国联合起来,或者一国控制了另一国,就能统治世界。他懂得现代运输已把大陆缩成了岛。欧洲、亚洲和非洲并不构成三个而是构成一个大陆——“世界岛”。这个“世界岛”是世界力量的真正重心,西半球只不过是面积较小、人力较少和天然资源较差的一个岛而已。“世界岛”的“心脏地带”是中欧和东欧。它们在地理上和战略上所处的位置,可以使它们控制整个“世界岛”。因此他发出了真知灼见的警告:

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

虽然专家们可一读再读本书，而获益匪浅，但本书不是专为他们写的。如果我们要实现民主理想，必须面对现实，本书就是为凡是要懂得这些现实的人写的。负责进行战争的军人应该读，运筹帷幄、决定全面战略的政治家应该读，处理国际事务的外交家应该读，关心上次战争、上次和平以及目前斗争的基本事实的新闻记者应该读，当然，献身于胜利和仔细考虑处理战后事宜的必不可少的指导原则的公民们，也应该读。

正如海福特爵士所指出的那样，民主国家人民不喜欢从战略和强权政治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只有被强迫了他们才会这样做。现在进行强迫的力量如此强大、如此残酷无情，就是已经到了不容忽视从上述角度考虑问题的程度。因此，就战略的根本作了意义重大的阐述的《民主的理想与现实》，是对我们的作战努力的一项真正贡献。

这本书所能起的重大作用之一，是使我们更正确地了解到上次大战的基本问题以及凡尔赛条约的真正缺点。在本书篇幅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坦白承认 1914—1918 年的战争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斗争。对德国及其盟国来说，那是企图抓取一切看来是必要的权力，来控制“世界岛”的“心脏地带”，从而最后统治世界。对英美来说，这就使得它们有绝对必要保持最低限度的力量，没有这种力量，它们作为自由人民便不能生存下去。正如海福特爵士所说的那样，我们不是仅仅为了使世界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场所的理想目的而战，还是为了在“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一场倾注全力的决斗”中最后取得胜利的现实而战。在这场决斗中，美国和英国的海军力量结果取得了胜利。“但是如果

是德国对外征服得胜，那它就会在此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广阔的基地上，实际上在无可再广阔的基地上建立它的海上力量”，亦即以亚、欧、非三洲的广大资源建立海上力量。“如果‘大大陆’，整个‘世界岛’或其大部，在将来某一个时期成为海上强国单一的和统一的基地，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其他的岛国基地（英、美）不就在船只方面造不了这许多船，在海员方面拥有不了这许多人了吗？他们的舰队无疑地会继承其光荣历史传统，英勇作战，但是结局是注定失败的。……如果我们……从长远看，我们不是仍然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即‘大大陆’的一大部分可能有一天统一于一个势力之下，可能以之为基地，建成一个无敌的海上强国吗？”

如果在这之外加上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关于空军的情况——海福特爵士预见到空军的潜力——那如果轴心国家胜利了，我们便面临着令人胆寒的前景。

本书作者是国际联盟的信徒。但是他觉得国际联盟有一“住房问题”，亦即是，如果欧洲不遭受军事强国的控制或控制的威胁，它才能居住。他看到“一般人容易在这时候认为，仅仅由于厌倦的人们下定决心不要再有战争，以后也就会是无尽无绝的和平了”，而历史和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甚至在一场世界范围的斗争之后，国际紧张局势仍有再度出现的可能。他相信，尽管有 1918 年的失败，德国能够在短期内动员足够的力量，来违反任何并未有效地、持久地限制普鲁士主义的条约。

他相信，如果对德国“不公平”，危险性就少些，如果“公平”太多了，危险性就多些。他觉得，一个不是决定性的和平——也就是准许德国军事力量再起的和平——将是一场大灾难。实质

上他指出，唯一始终贯彻执行的决定是真正带有决定性的决定。他举例说明，美国在南北战争中取得无条件的胜利，所以美国的黑奴和各州脱离母国的问题，一劳永逸，从此解决。正如他所说的，不能取得 1918 年胜利的全部成果，是不利于协约国，不利于德国，不利于欧洲，也是不利于世界的。

本书第六章——这是本书专门讨论和平条件问题的唯一的一章——所谈到的关于和平条件的常识，此起汗牛充栋的更有名的著作和大批外交文件来，要丰富得多。除非我们阅读、钻研和消化本书所述若干基本的真理，我们便脱离了智慧，漠视了经验。胜利是极重要的。胜利之后至少有这希望：这样的事不能再发生。但是，只有既建筑在民主的理想上，又建筑在现实上——地理的现实和强权的现实上——的解决办法，才可以使这希望实现。

爱德华·米德·欧尔

普林斯登，新泽西

1942 年 5 月

第一章　前景

令人全神贯注的战争的种种具体细节，我们目前仍记忆犹新。在我们以及就是在我们一生中较早时期发生的事情之间，似乎有一层隔膜。但是高瞻远瞩的时期终究到来了，我们必须开始把我们漫长的战争当作一桩单独的大事，当作历史河流中一处大瀑布来考虑。最近这四年关系重大，因为这四年是一个世纪的结果，又是另一世纪的开端。在以前，国家之间慢慢地逐步形成了紧张局势，而现在，用外交辞令来说，已存在着一种缓和状态。一般人容易在这时候认为，仅仅由于厌倦的人们下定决心不要再有战争，以后也就会是无尽无绝的和平了。但是国际紧张局势还会再次逐步形成，尽管开始时很慢。滑铁卢战役后就曾有过一个世代的和平。1814 年在维也纳围着会议桌子商谈的外交家们中，有谁预见到普鲁士会成为对世界的威胁呢？我们是否有可能减少未来历史河床的坡度，使其不再有大瀑布呢？如果我们想使后代子孙不至于像我们鄙视维也纳的外交家们的智慧那样鄙视我们的智慧，那么，这正是我们所面临的不折不扣的任务。

历史上大规模的战争——在近四个世纪来，每约 100 年我们就有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不平衡发展的直接或间接的结果；而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并不是完全由于某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拥有更伟大的天才和更多的精力。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地球表面上富源和战略机会分配不匀的结果。换句话说，自然界中

根本没有各国机会均等这回事。假若我没有把地理的实际情况全部弄错的话，我还要进一步说，陆地和海洋的组合以及富源和天然通道的组合，事实上有助于各帝国的成长，并最终有助于单一的世界帝国的成长。如果我们要实现理想，建立一个足以制止未来战争的国际联盟，我们便必须承认这种种地理上的现实情况，并采取步骤来抵制它们的影响。上一世纪，在达尔文学说的魔力般的影响下，人们逐步认为，只有最能适应自然环境的那种组织，才应当生存。今天，当我们刚经过一场烈火的考验，我们理解到，人类的胜利，有赖于我们克服这种十足的宿命论。

文明是建筑在我们可以相互帮助的社会组织上的。文明越高度发展，分工就越细，组织就越复杂。其结果，一个伟大的和进步的社会具有一种强有力的动量；如果你不毁灭社会本身，你便不能骤然煞住或扭转它的发展方向。因此，独立思考的观察家们，在事情发生的多年之前就能够预见到，沿着逐渐汇集到一处的道路发展的各种社会终将发生冲突。历史学家在叙述战争情况之前，往往先谈到人们如何盲目，如何不肯去看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兆。而事实是，一个民族的社会，和其他任何一个发展中的事业一样，在年轻时经过诱导还能够从事所向往的事业，一旦老了，它的性格已经固定，它的生存方式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大的变动了。今天世界各国都正要从头做起，人类能否未雨绸缪，制定各国的发展道路，使它们尽管有地理上的诱惑，而不致在我们孙子这一代又发生冲突?

在我们渴望排斥历史上和势力平衡联系在一起的各种观念时，我们关于国际联盟的种种想法，如果受着纯法律概念的支配，岂非有些危险？我们的理想是，国家毋分大小，一律应当

公平对待；这和不问人们的社会地位有何差别，均须公平对待这一我们的理想是完全一样的。要维护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公平，便要动用国家的权力，而我们现在，在国际法未能使大战不发生之后，已认识到必须有某种权力，或者像律师们所说的某种罚则，来维护国与国之间的公平。但是对公民实行法律统治所必需的权力，很容易转成残暴统治。我们能否建立这样一种世界强权，既足以保持大小国家之间相处的准则，又不至于发展成为世界的残暴统治？通向这样的残暴统治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由一国征服其他所有各国，另一条是国际权力本身的滥用，而这种国际权力原本是建立来压制无法无天的国家的。当我们对人类社会作大规模重新规划时，我们必须承认，是先有盗贼的技能和盗窃机会的事实，方有有关盗窃的法律。换句话说，我们观察我们的重大问题，必须像工商界人士那样，考虑到成长和机会的现实，而不仅仅像律师们那样，规定什么是权利、应该采取什么补救办法。

在以下的篇幅里，我将致力于衡量经过历史上的事件、其中包括最近四年的历史上的事件考验的，我们地球上壮丽河山的相对重要性。然后我要估量，我们怎样才能把我们对自由的理想，跟我们的地球之家这许多持久的现实协调得最好。但是首先我们必须认识表现在一切政治组织的形式中的、人类本性的若干趋向。

第二章　社会的动量

“天助富有的人”

1789 年，明慧的法兰西人民，在其智慧之都巴黎看到了美好的远景、气魄宏伟的美好的远景——自由、平等、博爱。但是不久，法国的理想主义抓不住现实，以致随波逐流听任化身为拿破仑的命运的摆布。拿破仑以他的军事上的高效率恢复了秩序，但是在恢复的过程中建立了法国的霸权，这种霸权本身的规律就是否定自由。伟大的法国革命和法兰西帝国的经历，曾影响了以后的各种政治思想；这番经历，曾像是古希腊式的悲剧，在革命理想主义本性中命定要有一场灾难。

所以，当 1848 年欧洲各国人民又处于看到美好的远景的心境时，他们的理想主义的性质就比较复杂了。自由的原则之外添上了民族的原则，希望借助于各民族的独立精神，抗住那超越范围的组织者，保住自由。不幸的是，在这革命的一年，理想主义这条好船的锚又不起作用，而被化身为俾斯麦的命运卷走了。俾斯麦以他普鲁士式的高效率，歪曲了日耳曼民族的新理想，就像拿破仑曾歪曲更单纯的法兰西的自由和平等的理想那样。民族理想主义的悲剧——我们现在刚看到这种悲剧达到顶点——却并非是在自由的混乱中命中注定的，而是在组织者的唯物主义，一般称之为日耳曼文化中命中注定的。法兰西的悲剧是理想主义破裂的单纯的悲剧；而日耳曼的悲剧事实上却是取而代之的现实主义的悲剧。

1917 年，当俄罗斯沙皇帝国倒台，共和国美利坚参战的时候，全球的民主国家都认为它们看到了一大片曙光。至少在眼前，俄国革命走的是一般革命的道路，但是，我们仍然寄希望于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民主。我们在 18 世纪的自由的理想和 19 世纪的民族的理想之外，已添上了我们 20 世纪的国际联盟的理想。如果接着要发生第三次悲剧，那这悲剧将是大规模的，因为民主的理想在今天是大部分人类的安身立命的信条。德国人，由于他们那现实政治（Real-Politik），现实的政治——不只是实用政治——认为灾难是迟早无可避免的。军阀和普鲁士军人集团，可能纯粹是为了维护其权力而作战，但是德国社会中为数很多的有知识的人，是在一种政治哲学的诱导下而行动的；他们忠于这种哲学，并不由于我们相信它是错误的而削弱信念。在这次战争中，德国的预料在许多方面证明是错误的，他们的错料，是因为我们尽管在政策上有失误，却有一些明智的政府的原则，又作了不屈不挠的努力。我们最艰巨的考验还在后头。如果世界要长期地成为各民主国家的安全场所，国际的重建需要达到什么程度呢？而从这许多民主国家的内部结构来看。在这次战争中曾激起了英雄主义的理想，如果我们想使它成为推动重建社会这一艰巨任务的力量，有什么条件必须满足呢？再没有比这些问题更重大的了。我们能否头脑清醒地把我们新的理想主义和现实结合起来呢？

*　　　　*　　　　*

理想家是社会的中坚，没有他们来推动我们，社会不久就呆滞了，文明不久就衰退了。可是理想主义和两种迥然不同的情绪相关联。较早的理想主义，例如佛教、禁欲主义和中世纪基督教，

是建筑在绝情禁欲上的，圣芳济会的神父们立誓贞洁自守，安贫若素，服务众生。但是现代的民主的理想主义，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建筑在实现自我的愿望上的。其目的是每一个人可以过一种丰富的和足以自豪的生活。根据美国独立宣言的序言，凡人生而平等。天赋有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两种理想主义的趋向，在历史上和现实的两种发展相呼应。在较早时期，自然控制人的威力仍然不小。冷酷的现实限制了人的雄心大志。换句话说，整个世界是穷困的，清心寡欲是通向幸福的唯一的大家能走的道路。毫无问题，很少数人在生活上略有活动余地，但这只是以奴役很多人为代价取得的。甚至那所谓雅典的民主和柏拉图式的乌托邦也是建筑在家奴和工业奴隶制度上的。但是现代的世界是富有的。在不小的程度上，人现在控制了自然的力量，以前听任命运摆布的若干整个阶级，现在有了这样的想法：如果财富分配得更公平些，便应该更有可能实现机会均等。

这种人控制自然的现代现实——缺了它民主理想就软弱无力——并不完全来自科学知识的进步和发明。人目前所拥有的较大控制力是有条件的，而不像自然以灾荒和瘟疫控制人那么绝对。人的财富和相对的安全，在今天是建筑在分工和工作的互相配合上，是建筑在替代原始社会的简单工具的复杂的工厂之不断维修上。换句话说，现代财富的生产，是依我们的社会组织和资本的维护情况而定。社会是一种“进行中的事业”（Going Concern），我们的福利在不少方面或可与难于捉摸的工商业的“信誉”相比拟。工商业主的有赖于他的主顾的习惯，不下于他对工厂内机器正常运行的依赖，两方面都必须经常维修，

而维修了双方便都具有“进行中的事业”的价值，但是如果工商业一旦停顿，它们便只具有支离破碎的价值——机器成了只是那么一堆废铁，信誉一降而为账面债务。

社会依赖着人是有习惯性的动物而存在。把许多人的种种习惯相互结合起来，社会便具有一种结构，这种结构可以和运行中的机器的结构相比拟。庞塞太太能使一间房间的占有形成一个简单的社会，因为包克斯晚上睡觉，考克斯白天睡觉。但是当她的房客中有一个有了一天假期，暂时间改变了他的习惯，她的社会便脱了节。请任何人设想一下，所有他依靠的人——邮差、铁路人员、屠夫、做面包的、印刷工人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的人——如果突然改变了一向的规律他会处于什么境地，他便能初步理解到，现代人控制自然的力量，在多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社会是个“进行中的事业”，或者用工程师的话来说，是由于社会具有动量。把运行停止久了，使人们的习惯互相脱了节，社会顷刻就沦落为受自然控制的简单现实。结果要造成大批人的死亡。

简单说来，在与现代文明的关系上，生产力是一个比积累的财富重要得多的现实的因素。一个文明国家可以看得见的全部财富，尽管有若干珍贵遗产年代已经久远，但大体上仍的等于不超过七八年的生产。这一说法的重要意义不在于它的精确性，而在于它对现代人们迅速增长的实际意义；因为人仍依赖机械的和社会的生产机器，这种生产机器在过去四五代中已成为精巧得多、复杂得多的机器了。每有一次新科学的应用，便有一次社会组织上的相应变化。当詹姆士·瓦特（James Watt）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讨论分工，这不是偶然的巧合。在我们自己这时代，内燃机——解决摩托车、

潜水艇和飞机等问题的钥匙——和信贷制度共同得到前所未有的扩展，也不是一种盲目的巧合。金属机器的滑润有赖于活着的人的习惯。有一些对科学十分热心的人认为，研究富有人性的艺术已没有什么重要性，这种看法是经不起仔细考核的；在现代现实的情况下，对人的管理，上层和下层都在内，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困难，更为重要。

我们把社会机器的管理人称为组织者，但在这笼统的名词中一般包括有两种不同的范畴。首先，我们有行政人员；严格地说他们完全不是什么组织者，而可以说是一种组织内新机构的创造人。行政人员的作用是使运行中的社会机器维修得好，注意它的滑润。当人们死了，或者由于健康欠佳、年纪太大而退休了，行政人员的责任，便是以事先训练好的、称职的人来填补这些空缺。工厂的工头实质上是个行政人员。法官行施法律——把在事实上而不是理论上法官可以制定法律的情况除外。单纯就行政人员的工作而言，其中并无进步的思想。以某一机构而论，他的理想便是效率——工作进行得完全得心应手。他那具有特征的毛病叫做“官僚作风”。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良好，由于其动量的固有力量，实际上又会形成中国式的呆滞状态。一家开办已久、经营得法的企业的好名声，在市场上可以卖得一笔好价钱。社会动量最突出的例证可见之于市场本身不能迁移这件事。每个售货人都愿意到购货人惯常聚集的地方去，这样可以有把握有人来买他的货。在另一方面，如果可能的话，每个购货人都到售货人必须集中的地方去，由于售货人的竞争，他就可以买到便宜货。所以，当局一再要分散伦敦的各种市场，但竟都无效。

为了理解另一种形式的组织者，社会机器的创造者，让我们

再研究一下各种革命的共同发展道路。有个伏尔泰批评法国政府这个运行中的事业，有个卢骚描绘了一个较为幸福的社会的理想，百科全书巨著的作者们则证明这样一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是存在的。不久，这些新思想迷住了若干好心肠的热心人，可是他们对改变一般人的习惯这项困难工作缺乏经验。他们抓住了一个机会，来改变法国社会的结构。事出偶然而又不幸的是，他们减低了法国社会运行的速度。工作的停顿，生产工具和政府的确实四分五裂，有经验的行政人员的排除，不称职的门外汉的代职，这种种因素合在一起，把生活所必需的产品的生产率减低了，结果物价高涨，而信心和信用下降。革命的领袖们毫无问题宁愿苦一个时期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是饥饿的千百万群众在他们四周起来了。为了争取时间，他们使千百万群众去猜疑，认为不足是由于被推翻的力量的某种阻扰，于是无可避免地接着出现了恐怖统治。到最后人们成了宿命论者，放弃了理想，而寻找一个能恢复效率的组织者。这种需要，由于外国敌人侵犯国家领土，由于减少了的生产和松弛了的纪律已经削弱了国家的抵抗力量，而加强了。但是需要负起重建任务的组织者不仅是一个行政人员，不仅是只能修理和滑润机器，而一定要能够设计和制造社会机器。这样就有了“组织了胜利”的加诺[①]，还有拿破仑和他那民法。他们由于创造性的努力，赢得了永久的声誉。

组织的可能性，就其建设性意义而言，有赖于纪律。运行中的社会是由许多人的不同习惯通过千百万种的结合构成的，如

① 加诺（Lazare Nicolas Marguerite Carnot），1753—1823，法国军事家，整顿了当时法国的军队，采取了新战术，改善了军队供应，对筑城学有贡献，被誉为法军“胜利的组织者”。——译者

果要改变运行中的社会结构，即便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很多男人和妇女也必须同时相应地改变他们的不同习惯。除非政府出布告，要采用夏令惜阴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部分地遵行改变时间，会使社会陷于混乱。所以夏令惜阴制度的成功有赖于社会纪律，从中可以看出，社会纪律不在于人们的习惯，而在于同时而又相互关联地改变这些习惯的权能。在一个有秩序的国家，人们自然而然遵守纪律，很少要动用警察来贯彻纪律。换句话说，社会纪律，或者随着意志、命令来改变习惯，本身会成为一种习惯。军纪，单讲一声令下而进行的简单动作，看来是比较简单的事，但是职业军人知道得很清楚，习惯的纪律，和经短期训练速成的人所进行的甚至是最巧妙的战斗之间，有着差别。

在动乱时期，生产习惯的相互关联步步解体，虽然这种或那种盗贼会暂时使自己发财，社会整个说来则越来越穷。但是，尤其严重的是纪律的习惯的丧失，因为这意味着失去恢复的能力。想想俄国在一年连续革命中所引起的情况吧，它的情况有如可怕的瘫痪症状，脑子仍然能看能用，但是神经系统已不能使肌肉起任何反应。一个国家并不因为受到这种病魔的侵袭而死亡，但是它的社会的整个机器一定要重新构造；如果想要使经过一场困苦而仍能生存的男男女女不致忘掉习惯，不失去他们的文明所依赖的适应性，就必须赶快重新构造。历史证明，只有依靠武力在这种环境里建立一个崭新的纪律核心，此外是没有办法的；但是依仗武力的组织者无可避免地只把恢复效率当作他的目的。在他的统治下，理想主义兴不起来。因为历史关于这一点讲得很明白，所以近两个世代的理想家中有很多是国际主义者；用军事手段来恢复纪律，在一般情况下，不是通过被别国征服，便

是通过偶然打退了外国的侵略。

伟大的组织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这不是说他缺乏想像力——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而是他的想像力变成了“手段和方法”，不是难于捉摸的目的。他的头脑是玛萨的头脑而不是玛丽的头脑[①]。如果他是工业界的领袖，他脑子里的筹码就是劳工和资本，如果他是统率军队的将军，那筹码便是部队和给养。他的进行组织、旨在达到处于中途的目的——如果他是工业家，目的在钱；如果他是军人，目的在胜利。但是钱和胜利只是通向将来的目的的钥匙，而这些将来的目的在他是始终捉摸不定的。他赚钱一直赚到死，或者，如果他是所向无敌的军人，就会像亚历山大那样，因为再没有可以给他征服的世界而哭[②]。他所最关心的是，他组织起来的企业或者军队，行政管理必须极有效率；他对他的行政人员要求严格。最重要的是，他重视纪律的习惯；他的机器必须得心应手，迅速灵活。

组织者无可避免地渐渐把人看成是他的工具。他的头脑是理想主义者的头脑的反面，因为他调动人马时是以多少个旅团计算的，从而必须注意物质上的限度，而理想主义者是诉诸于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灵魂是长翅膀的，能飞。并不能由此推论组织者对于在他之下的社会的福利漠不关心；正相反，他把社会认为是必须保持在高效率状态中的那么多的人力。无论他是军事家还是资本家，只要他有远见，都是这样看的。在政治的领域内，

① 典出圣经。意为“讲究实际而不感情用事”——译者

② 亚历山大（Alexander），公元前 356—323，马其顿国王（公元前 336—323），曾率军东征西讨，征服了希腊和波斯帝国，建立了大帝国，自以为全世界有人居住的地方都已属于他，再没有可以给他征服的地方了。——译者

组织者把人看成是为国家而存在的，是为斯图亚特学派哲学家霍布斯所说的“海怪”[①]而存在的。但是有民生思想的理想主义者把国家当作不能不要的坏东西、万不得已而才许它存在，因为国家限制自由。

西方基础稳固的民主国家里，自由的各种理想已经变成普通公民的固执的见解，而维持我们的自由的安全，正是依靠这些“思想上的习惯”，而不是依靠一瞬即逝的理想主义的狂热。1000 年来，这种种固执的见解在不列颠岛国的保护下生了根；它们是不断试验的成果，至少应当尊重地来看待它，除非我们准备认为我们的祖先是傻瓜。这种种固执的见解之一是，任命一个专家为国家的大臣是不明智的。在目前战争时期，当一个民主国家内的自由也已经必须服从效率的时候，就有些人希望我们说，目前我们安插在很高位置上的专家们，从今以后该由专家继任，我们的固执的见解过时了。可是甚至在战时，英国仍然以文职人员担任陆军大臣！当然，事实是，正常执行中的英国宪法的效率不高之处，只是一种说法——民主是跟对专制政体作战所必需的组织性不相容的——的反面。当现任的智利公使初次到英国时，他受到几位下议院议员的招待。他提到，从遥远的太平洋那边对这各国国会之母的看法，又提到他到了伦敦所听到的对于国会制度的政府一年到头的牢骚。他大声说道：“你们忘了，各国国会的主要功能之一是要事情做不成！”

---

① “海怪”原文“leviathan（利维坦）”，圣经旧约中的大海兽，被认为世界上再没有比它更为强大和凶恶的了。霍布斯（Hobbes，T.），1588—1679，英国机械唯物主义者，曾以“利维坦”为书名（1651 年出版，该书全名为《利维坦或物质、形式和教会的、世俗的国家权力》）为英国克伦威尔专制统治辩护。“leviathan”一词还有大人物、势力大的人、大财主的意思。——译者

组织者的思想主要是战略的，而真正的民主主义者的主要思想是道德的。组织者是在想如何使用人，可是民主主义者是在想人的权利，而多少权利正是组织者道路上的多少绊脚石，毫无问题，组织者必须是个主子，因为由于人生来是任性的，习惯又根深蒂固，如果不当主子，他便难有作为。可是，由于他那“手段和方法”的头脑，他是一个不好的最高主子。

如果脱离了现实的约束，民主的理想主义的报应便是组织者统治一切，盲目的效率统治一切。组织者开始时单纯得很，他那善于办事的头脑看不惯混乱，特别看不惯在他周围的无纪律状态。军人风度的效率毫无问题拯救了革命的法国。但是进行中的事业的冲击力如此之大，甚至把它自己的缔造者也卷向前去。为了提高人力的效率，到最后他一定要设法控制其一切活动，对工作和思想的控制不下于对作战的控制。他统治一切，效率不高对他是痛苦。所以拿破仑在他的大军和民法之外，又加上他和罗马教皇间的契约，根据这契约神父要成为他的奴仆。在亚眠（Amiens）条约之后他本可能享受持久的和平，但是他偏要继续备战。到最后他不得不遭到莫斯科大败，就像一个赚大钱的人要做过头，结果破产。

俾斯麦是普鲁士人的拿破仑，是他们的血和铁的人，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和他那法国的原型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而值得注意。他的结局和拿破仑的结局不同。他并没有在莫斯科大败之后被充军到伊尔巴岛[①]，也没有在滑铁卢战役

① 伊尔巴岛（Elba I.）在地中海的科西嘉与意大利之间，1814—1815 年间拿破仑第一次被流放在这岛上。——译者

后被监禁在圣赫勒拿岛[①]。不错，在把舵30年之后，这个老领航员在1890年被一个想要行动的新船长辞退了，但这是由于他的谨慎所致，不是由于他的飞扬跋扈的雄心。拿破仑和俾斯麦都具有最了不得的“手段和方法”的头脑，但俾斯麦还另有所长。他并不像爱默生[②]形容拿破仑那样只是一个大企业家。从来没有一个政治家比俾斯麦更善于判断如何把战争和政策结合起来。他打了三次时间短暂、胜利结束的战争，缔结了三项和约，每回都给普鲁士带来了许多利益。而这些条约内容大不相同！在1864年对丹麦作战后，俾斯麦拿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其目的无疑是想得那条基尔运河。在1866年和奥地利作战后，他不肯拿波希米亚（Bohemia），因此得罪了他的国王，直到1870年胜利后两人关系才完全恢复。毫无疑问，在这次宽大处理中，俾斯麦预见到将来会有一个时期普鲁士可能需要和奥地利联盟。1871年，在色当战役[③]和巴黎围城之后，俾斯麦屈从军方的压力，既拿了阿尔萨斯（Alsace），又拿了洛林（Lorraine）。

这位伟大的首相实际上具有一般普鲁士人所常缺乏的、能够在本国之外又能洞察别国的民心的眼光。他喜欢使用心理的方法。他一俟以普鲁士为首统一了日耳曼，便不再打仗了。可是他做了许多大事——有一段时期他统治了欧洲，而他的方法不只是尽量利用军事上的威望。在1878年柏林大会上，他帮助

---

① 圣赫勒拿岛（St．Helena I.）属英，在南大西洋中。1815—1821年间，拿破仑在滑铁卢大败后，被放逐该岛。——译者

② 爱默生（Emerson，R. W.），1803—1882，美国散文家，诗人。——译者

③ 色当（Sedan），法国东北部城市，在马斯河上，1870年普法战争中拿破仑二世在此惨败。——译者

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Bosnia）和黑塞哥维那（Herzegovina）两省，因此加深了奥地利和俄国在巴尔干半岛上的争执。在同一柏林大会上，他私下怂恿法国去占领突尼斯，而当法国不久实行占领时，正如他所预见的，意大利感到异常难堪。接着于 1879 年和奥地利成立两国联盟，又于 1881 年和奥地利、意大利成立三国联盟。情况就好像他哄他的牧羊犬绕着他的羊群跑，把羊群赶到他那里。以同样巧妙的手段，他使法英互相敌视，又使英俄互相敌视。在国内政策方面他使用了同样手法。1886 年，他不再和梵蒂冈斗争了，把天主教党拉过来支持自己，从而抵消了工业化了的又信奉天主教的来因（Rhineland）省内的社会主义倾向，也抵消了南方信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Bavaria）王国各州的独立主义的倾向。

真正的比较不能在拿破仑和俾斯麦之间进行，而该在拿破仑和整个普鲁士统治集团之间进行。这一集团的结局，我们现在正看得到，那是和拿破仑的结局相似的。那盲目地从事组织的人走向他的莫斯科大败，那盲目地从事组织的国家走向它的世界大战。那使全族充满了“手段和方法”的思想的哲学和教育，被命名为日耳曼文化。法国人是富有艺术性的，因而也是理想主义的人民，拿破仑以其天才的荣誉歪曲了他们的理想主义。而在另一方面，俾斯麦是唯物主义的日耳曼文化的产儿，但是他比本族一般的人伟大，还能慎重处理精神力量方面的问题。

日耳曼文化并不起源于腓德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胜利，而起源于耶拿之败[①]。18 世纪腓德烈的统治就像拿破

① 耶拿（Jena）是德国中部城市，1806 年拿破仑在这里大败普鲁士军。——译者

仑那样是个人统治，而 19 世纪的普鲁士，不问其表面打扮成什么样子，实际上是由知识丰富的“专家们”——参谋人员、官僚、大学教授——的寡头政治所统治的。唯我独尊的组织者腓德烈一味加强管理职能，以致他死时留下的普鲁士仅是一部机器，而到后来在耶拿战场上被打得支离破碎。

就在耶拿战役那年冬天，柏林仍在法军占领中，哲学家费希特（Fichte）到柏林讲学[①]。那时候在这普鲁士首都还没有大学，也不是对青年学生讲学，而是对深感国家处于重大危机中的最成熟的有头脑的人讲的。费希特讲解爱国主义的哲学，此时正当日耳曼各大学致力于抽象地崇拜知识和艺术。在其后几年中，即 1806 年与 1813 年之间，军队、官僚、学校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也就是在政府的需要和教育的目的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这便构成了普鲁士制度的精华和倔强的力量。全民兵役制和全民强迫教育相提并举，在普鲁士早就开始实行了，比 1870 年的英国教育法案早两代，教授人材济济的柏林大学，是作为大本营的姊妹组织成立起来的。因此在普鲁士，知识主要已不是为知识而求知识，而是达到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就是要使曾遭受大苦大难的国家取得胜利。再者，它是处于平原之中的一个兵营国家，没有西班牙、法国或者英国那样的天然屏障。手段取决于目的，既然普鲁士的目的是拥有必须建筑在绝对的纪律上的军事力量，其手段无可避免地是唯物主义的。从柏林的立场看问题，把日耳曼文化，亦即是从战略出发的心理

[①] 见玛·罗伯生、葛·罗伯生（Marriot and Grant Robertson）合著《普鲁士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russia)，1915 年克拉兰登出版公司（Clarendon Press）出版。

状态，加在全国人民的知识分子身上，是再好不过的事；但是从文明的总的立场看问题，这是给了一国以致命的动量——这就是说，从长远看，不是致文明的命，便是致这一国的命。

这许多年来，德国的军事地图之好是有口皆碑的。但是可以问一问，英美的极大多数人，是否充分了解过去三代中地图在德国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地图是日耳曼文化的重要工具，每个受教育的德国人都可以能是个地理学家。而英国人和美国人中，这种情况极少。德国人一直受教育，看地图不光看几张纸上因袭画成的界线，还看到永久的天然的机会——货真价实的“手段和方法”。他的现实政治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地图上。德国的中学和大学认真教地理，从刚有日耳曼文化就开始了。这是在耶拿战役以后一代中组织起来的，主要由于四个人——亚历山大·封·洪保德（Alexander von Humboldt)、伯格豪斯（Berghaus)、卡尔·李特尔（Carl Ritter）和斯提勒（Stieler)——的努力。他们和新成立柏林大学有关，也和从此声名鹊起的哥达(Gotha）的柏尔特斯（Perthes）地图出版社有关。直到今天，尽管在我国有两三家杰出的地图出版社做了不少事，如果你要一张好地图，精确地而又写实地把基本的对比表达出来的好地图，你多半还要找一张来自德国的地图。原因是德国有许多制图家，他们是有学问的地理学家，而不只是测量员或者制图员。他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由于有受了教育的广大群众，他们懂得重视，也愿意出钱买绘制精妙的地图[①]。

在我国，可能是出于直觉，我们重视教育的道德的一面，我

① 1895 年我在伊普斯威奇（Ipswich）对不列颠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地理组的讲演中，有一段话是叙述德国地理学派之兴起的。

们忽视唯物主义的地理。大战之前，据我所知，有不少教师反对把地理作为教育的一个项目，理由是地理倾向于助长帝国主义，就像他们反对体育训练一样，因为它倾向于军国主义。我们可能嘲笑这种过分的政治上的谨慎，就像前几个世纪的人嘲弄与世隔绝的隐士那样。但是以上每种情况之所以产生抗议，都是为了反对另一方面的过分。

柏林—巴格达，柏林—赫拉特（Herat），柏林—北京——它们并不仅是几个名词说说罢了，而是可以在脑海中的浮雕地图上实际想像的——对大多数盎格鲁—撒克逊人说来，包含有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最近才通过报纸上的简图零零碎碎地介绍到我们中间来。但是你的普鲁士人，他的父亲，他的祖父一生都在辩论这些概念，辩论时手里拿着铅笔。在处理和约的具体条件时，我们的政治家们无疑会有优秀的地理学专家协助，但是在德国代表们的后面，不仅是几个专家，还有具有地理知识的广大群众，他们很久以来就熟悉会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每一重要方面，会很快对他们的领袖们给予有远见的支持。这很可能成为有决定意义的优势，尤其是如果我们的人民思想上变得宽宏大量、满不在乎。如果在 1814 年秘密外交中泰里朗和梅特涅的成功，[①]被我们自己这时代战败国的发言人，在民选政府对外交所加的条件下也做到了，那真是咄咄怪事！[②]

思考中用地图的习惯，在经济的领域内并不比在战略的领

① 泰里朗（Talleyrand C. M.）1754—1838，1814—1815 为法国外交部长。梅特涅（Metternich，C.），1773—1859，奥地利外交大臣（1809—1821）、首相（1821—1848），反动的“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编者

② 不错，我们曾出门到各地旅行的人有一种地理的常识。也不错，我们在办公室和图书馆内放着地图，可以翻阅，就像我们查字典找一个字的拼法那样。但是

域内少些。不错，经济放任主义很少用得上它，但是法兰克福条约中德国加诸于战败的法国的“最惠国”条款，对于具有战略头脑的德国人，跟对于诚实的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人，有着很不同的意义。德国的官僚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对德国商业优惠待遇的机构。当德国在橄榄油进口关税这件事情上对意大利作了让步，这最惠国条款对于位在北方天空下的英国会有什么影响？是否会与其铁路车辆空着开回意大利，还不如装满了德国的出口商品呢？德国和它许多邻国之间极多而极复杂的商业条约的整个系统，是根据商业的通道和出产地区的位置的缜密研究而定的。德国官员是在思考“自己活着”的具体细节，而他那英国同行却把精力用在“让别人活”的消极原则上。

* * *

德国皇帝威廉告诉我们说，这次战争是世界上两种观点的斗争。“观点”是组织者的特点；他是高高在上地看问题的。吉伯林[①]和德国皇帝意见一致，但当他说有两种感觉：人的感觉以及德国人的感觉时，他用的是下面普通老百姓的语言。组织者作为组织者，无可避免地缺乏人性，或者可以说不是人。没有问题，德国皇帝和诗人都言过其实，为的是强调两种对立的倾向；甚至于民主国家也必定有组织者，就像甚至于日耳曼文化的信徒也必定稍有仁慈之心一样。真正的问题在于，一国之中究竟由谁作最后决定——是理想主义者呢，还是组织者。当国际主义者

正确的拼法并不往往就意味着文学才能，在地理上能具有高瞻远瞩、训练有素的知识，和在这里讨论中的思想方法有重大关系。

[①] 吉伯林（Kipling），1865—1936，英国作家，作品反映不列颠帝国主义扩张政策和殖民政策的思想体系。——编者

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作战时，他们是在对一切组织作无益的反抗。

民主国家拒绝从战略观点考虑问题，除非直到为了国防的目的，不得不这样考虑。当然，这并不排斥民主国家为了一个理想而宣战，像我们在法国革命时所见到的那样。今天我们的和平主义者的种种自相矛盾之一是，他们经常要求干涉别国的事。在中世纪时代，无组织的群众出发去反对异教徒，半路上就糊里糊涂死去了。西方民主国家对于目前的战争无准备，并不是由于事先缺乏警告。本世纪初，只提提英国的情况，就同时有三位受尊敬的人对我们掌握主权的人民大声疾呼，却没人理会：罗斯勃雷勋爵（Lord Rosebery）要求注重效率，老张伯伦先生[①]要求注意经济国防，罗伯茨勋爵（Lord Roberts）要求注意军事训练。民主国家意味着要经普通公民同意了才进行统治的，普通公民并不从山顶上观察事物，因为他一定要在肥沃的平原上工作。责备民选政府有上述特点是没有好处的，因为这些特点不仅是其缺点，也是其优点。当威尔逊总统说，我们必须使世界今后成为民主国家安全之所时，他承认了这些特点。当负有重责的大臣们——除却有关海军的防御力量——以我们对这次战争没有准备而自豪时，英国的下议院也不折不扣地认可了这些特点。

民主主义者从原则上考虑问题，不管这些原则——按他的个性——是理想、偏见还是经济法则。另一方面，组织者规划建设，并像建筑师那样，一定要考虑房屋的地基、他用来盖房子的

[①] 指 Joseph chamberlain，1836—1914，英国政客，即签订慕尼黑协定的张伯伦之父。——译者

材料。考虑必须具体周到，虽然砌墙最适合用砖，楣却最适合用石，屋顶最适合用木料和石板瓦。如果他所建立的是一个国家——要注意不是指在成长中的国家——他必须仔细考虑应该占有哪些领土才好，如何处理社会结构问题（不是经济法则问题），社会结构问题是历史上遗留下来到他手里的。因此他不像民主主义者那样一切从道德出发，而是从战略出发。

主张激烈的道学家，不问引人犯罪的诱惑之多，只要有罪就认为不能轻恕；对于“走正路”的住在贫民窟里的人，认为将来在天堂里毫无问题会得到优厚的好报。但是讲求实际的改良家们很费心思考虑住房问题！近来我们的政治道学家主张非常激烈，他们说教般地要求走“不并土地、不索赔款”的狭路。换句话说，他们不肯考虑地理和经济的现实。如果我们对一般人的天性还有一丁点信心，难道这点信心不能使我们移山！

但是，务实的常识警告我们，当民主国家难得有一次掌握了精良的武装，使世界在民主国家进行日常事务时成为一安全场所，那么最好还是抓住目前这个机会。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注意到未来的国际联盟的住房问题。我们必须有预见地考虑到空间和时间的现实，而不只是满足于纸上谈兵，定下操行的好原则。好，甚至于目前是我们同盟的人，看来也不会永远是好，而我们目前的敌人，可以相当肯定，至少在一段时期内看来是不好的。

“不并土地，不索赔款”无疑是个团结的口号，提出这种口号的人用意不在支持当今的残暴统治。但是这样讲肯定是合情合理的：律师的态度和工商业家的态度大不相同，律师的态度是，在没有得到相反的证据前必须坚持其推定的理由；而工商业家的态度不受公式条文的拘束。这个人办事，而那个人最多也不

过允许别人去办。

过去，在民主国家里，甚至对民选政府的活动都怀疑有问题，表现出他们有自知之明。大家一向这样想，也是迟早大家要这样认为的，自由国家的国家机构的主要作用，是防止出现残暴统治的情况，不管它是由国内违法乱纪的人所造成，还是外来的侵略者所想要造成的。普通老百姓不大会进行大胆的革新。因此必须有冒险家，单干的或是合伙的冒险家，来开辟通向进步之路。军人和官僚控制的国家情况就不同；拿破仑可能成为先驱者，就像约瑟夫二世[①]也可能成为先驱者，如果他的保守的臣民没有把他反掉的话。在普鲁士，一切的进步都是国家操纵的，而那里的进步，只不过是提高效率。[②]

可是，为了从目前危难处境中拯救民主，我们中止了正是保卫民主的东西，允许我们的政府把我们组织起来，不仅为了防御，也为了反攻。如果这次战争时间短，就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插曲。但是这次战争时间长，有一部分社会结构浪费掉了。也有一部分另作新的用途。因此习惯和既得利益者已经解体了，整个社会就像我们手中的一团泥，只要在它还松软时我们就有捏造它的能耐。但是捏泥人的艺术，就像对付烧得发红的金属的工人的艺术那样，不仅在于他知道要做什么，也在于他能够考虑到用以工作的材料的性能。他不仅一定要有艺术上的目的，也一定要有技术知识，他一定要发挥人的主动性来考虑现实；就当

① 约瑟夫（Joseph II）二世，1741—17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765—1790）。——译者

② 12 年前，我遇到一个普鲁士参谋，他告诉我，他毕生从事于研究如何在动员时节省半个小时。

他想要保持他的理想形式的时候，他一定要培养他那“手段和方法”的头脑。

就像艺术家直到快死的日子还在努力多学一些艺术（有关通过工作来表达的艺术）那样——多，不仅是科学意义上的多，也是在实际的“感触上”的多，以取得我们称之为对他的材料的更大控制力；一般人类有关于这球形世界的知识（在这世界上我们必须殚智竭虑设法住在一起），也从来是到死学不尽的。这不仅是因为我们已经积累了大量事实，而且是我们每经历过一个新时代，我们对于过去、现在的一切事情，都要用新眼光从新的立场、观点来看。这四年的战争显然改变了人的看法，在我们头发斑白的人所逝去的一生中，这种改变还没有出现过。然而当我们以目前之所知来回顾时，当今波涛汹涌的思想潮流，不是清清楚楚早在的20年前就已是涓涓细流了吗？上一世纪最后几年和本世纪最初几年，在柏林的组织者以及在伦敦和巴黎的少数人，已经看出这新动向的苗头了[①]。

我打算以20世纪的眼界，来描述若干地理的和经济的现实。绝大多数的事实很古老，大家都熟悉。但是，用中世纪大学教授的话来讲，即在真正的原因与行动的原因之间——在纯粹学术研究与不得已采取行动的认识之间，有着极大的差别。

① 张伯伦先生于1903年9月辞职退出内阁，以便于自由发挥其领袖作用；罗伯茨勋爵于1904年1月辞去总司令职务，用意相同。

第三章　海上人的观点

“于是上帝说道，让大水都集中在一处”

在有记录的人类历史的五六十个世纪期间，地理的实际情况大体上没有变，许多森林伐尽了，沼泽地的水流干了，沙漠区可能扩大了，而陆地和水的轮廓，山河的位置，除却细小之处而外，并没有变动。但是地理情况对人类活动的影响，不仅有赖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目前的和过去的现实，还在甚至更大的程度上有赖于人们如何想像现实。有史以来，洋终是一个，但是为了人的有效目的，就有两个洋，东洋和西洋，直到不过 400 年前绕航好望角之后，才认识到洋是一个。因此就发生了这样的事，在上一世纪最后几年中，马汉海军上将仍然可以根据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经文，创造其关于制海权的新的论点。洋从来就是一个，但是直到几年之前，这个伟大现实的实际意义才全部为人们所理解——说不定还只是现在才掌握了它的全部意义。

每一世纪都有其本世纪的地理透视。现在还活着的人，虽然超过了服兵役的年龄，受教育时用的一张世界地图，图上的非洲内地几乎都是空白。可是去年史末资[①]将军在对皇家地理学会讲演中，就能谈到德国人的野心，说他们想从目前已经勘探清楚的中非有利地位控制世界。20 世纪地理的透视和以前各世纪地理的透视的不同之处，却不仅在于范围大小。就轮廓而言，我

① 史末资（Smuts，J.C.），1870—1950，前英领南非军人、政客。曾任南非总理多年。——译者

们的地理知识现在齐全了。最近我们到了北极，发现它是处于深海之中，又到了南极，发现它是位于高原之上。有了最后这些发现，地理探险家已毕尽全功。再不会有大片肥沃的新大陆、重要的山脉、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河流要经过探险才能发现了。再者，世界地图刚刚画成，所有的旱地就都在政治上立了界碑，有了主。不问我们所考虑的地球表面上的种种内在联系是物质的、经济的、军事的还是政治的，现在我们是第一次处于定局的情况下。已经知道的事不会再湮没而为一知半解，最后变得一无所知；谋求界外土地的政治扩张的伸缩性已经没有了。每一次震荡、每一次灾难、每一次过剩，即使正好发生在地球的那一面，现在我们也感觉得到了，而且它们还可能从对蹠点再返回来。就像 1883 年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爆发，气浪波动，在地球上一圈又一圈地推进，到后来集中在相对的半球的一点上，然后又扩散，再结聚于气浪波动源地的喀拉喀托之上。人类的每一事件，今后也会这样在世界上回荡，一再发生回声。战争如果进行得很久（这次战争确是打得很久），每个大国都要被牵连进去，其终极原因就在这里。

直到今天，我们关于地理现实的观点，由于我们过去的先入之见而染上了实际目的的色彩。换句话说，人类社会和各种地理事实的关系，仍然不是按照地理实际情况而定，而是在不小的程度上，按照在历史的过程中人们对待它的态度而定。只有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能对地理的实际情况具有 20 世纪的正确、全面、因而也是客观的透视。这次战争使我们很快得到教训，但是我们的公民之中，看西方的前景能清清楚楚，而对东方的背景却模模糊糊的，仍大有人在。因此，为了明了我们目前的处境，

简单研究一下我们到达目前处境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是值得一做的事。让我们先从海上人的观点的接连几个阶段开始吧。

*　　　　　　*　　　　　　*

设想有一大片漠漠黄沙，拔海数百呎。设想有一峡谷，两岸岩石陡立，有如一条濠沟挖在这片沙漠高原之上，峡谷的底部铺着带状的黑土，一条银色的可以通航的河流，在这黑土中央向北蜿蜒 500 哩而去。这条河就是尼罗河，从阿斯旺（Assouan）——那里的花岗岩使船只不能通航——第一瀑布址滚滚而来，到三角洲顶部分泻入海。峡谷两边沙漠边缘的直线距离约 10 至 20 哩不等。站在边缘的一点上而背向着沙漠，石崖从你的脚前直落到下面的一长带平原上，放眼望去，夏日洪流滔滔，入冬一色碧绿，春时庄稼金黄，对面则又是石崖壁立在另一片沙漠上。这些石崖的许多凹处，很久以前就凿成了石窟寺庙和墓穴，凸处刻成了帝王天神的雄伟雕像。埃及，就在这长长的深陷的地带上，上古时期就成了文明国家，因为，一切主要的物质上的便利都辏集在这里供人们运用。一方面，它有一片沃土，水源充足，日光强烈，从而就有富饶的资源可使一国之民生活丰足。另一方面，全国各地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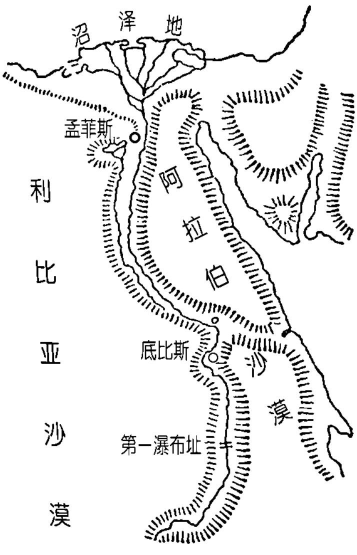


图 1．自有天地的河的世界。

田离那条波平浪静的河流，都不过五六哩。还有促进航运的动力，因为河的流向把船只漂向北，而定季风——在海洋上称之为贸易风——又把船只吹向南。富饶和一条交通线，人力及其组织上的种种方便，便是一个王国的必不可少的要素。

我们得知埃及早期的情景是，部落一个接一个的占有河谷，以大战艇组成舰队相互征伐，就像在我们自己这时代各部落在刚果河上作战一样。在这许多部落中，有一部落战胜了邻部，多占了一段河谷，多得了些物质基础来发展人力，而在这基础上再去征伐。到最后，全部河谷处于单一的就治下。埃及的历代国王都在底比斯（Thebes）建造宫殿。他们的政府人员——使者和官吏——在尼罗河上乘船南来北往。向东向西都有沙漠构成强固的屏障，而在北方的边界上，又有三角洲沿岸的一片沼泽抵挡住海盗。[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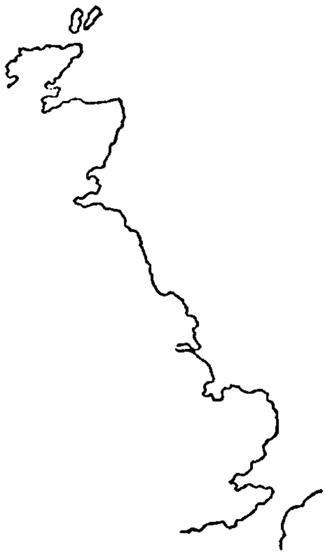


图 2．按上图相同的比例尺绘成的英国沿海航运图。

现在请你转而设想那“伟大的海”，即地中海。你可以看到，那

① 参阅梅尔斯（J.L.Myres）教授所著《历史的黎明》（The Dawn of History）。

里大体上具有和埃及一样的物质要素，不过规模较大，依靠这些要素建立起来的不只是一个王国，而是罗马帝国。这片广阔水道，从腓尼基海岸向西，淼淼2,000哩，直达直布罗陀处的海口，两岸土地肥沃，冬季有雨，秋收时阳光充足。但是沿尼罗河的居民和沿地中海岸的居民是有区别的。在埃及各地，人类活动的情况大致类似，每一组成部落都有其农人和船夫。沿地中海的各种族却各有其特殊发展；有的满足于在家耕地、行舟河上，有人则把大部分精力花在掌握航海技术和从事国外贸易上。居乡里、种玉米的埃及人和爱冒险的腓尼基人比邻而居，就是一例。这就使得需要有更长期的、更坚持的力量去进行组织，来把地中海所有的王国融合成一个单一的政治组织。

现代的研究已经查明，古代从事航海的主要种族，在各个时期都来自欧亚之间的一片水面，这片水有时叫做爱琴海和多岛（Archipelago）海，有时叫做希腊人的“第一大海”。从这海区来的海上人，看来曾把他们的行业教会了腓尼基人，那时候希腊语还没有在这“异教徒的群岛”上通行。为了我们现在的目的，最可注意的是，爱琴海上希腊以前的世界文明中心，根据神话的透示和近代发掘所得，是在克里特岛（Crete I.）上。那是海上强国的第一个基地吗？从这个家出发的海员向北航行，是否因为看见右边海岸上太阳升起，左边海岸上太阳下落，便把一边叫做亚细亚、另一边叫做欧罗巴？定居在爱琴海这“海室”的其他海岸上的航海者，即今天形成海岸居民包层的希腊人，他们后面没有几哩的内陆便是其他种族，他们是否来自克里特？多岛海中的岛屿如此之多，以致“多岛”这一名称，和埃及的三角洲一样，已成为地理上的一般用语。克里特岛是各岛中最大的和最肥沃

的。那末，我们是否在这里找到了第一个例证，证明一个较大的基地对于一个海上强国的重要性？海上的人力必定要由陆上某处的富饶资源来供养；如果其他方面条件相等——例如本国的安全和人民的精力——那么有更充沛的资源作为基础的国家便能控制海洋。

爱琴海发展的第二阶段所教授的显然是同一课题。操希腊语的骑马的部落从北方下来，进入目前成为希腊本土的半岛，并且定居在此，把早先的居民希腊化了。这些希腊人进至半岛的末梢，即进至通过科林斯地峡（Isthmus of Corinth）和大陆有一线相连的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e）。于是希腊各部落中有一部落，即陶里斯人（Dorians），在他们那比较强大的半岛的基础上组织了海军力量，征服了其基础虽然完全是岛然而较小的克里特。

几个世纪过去了。这期间，希腊人绕航了伯罗奔尼撒的南岬，进入爱奥尼亚海（Ionian Sea），又沿该海海岸开拓殖民地。该半岛就此逐步成为希腊的海之世界的中央城堡。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这两孪生海外侧沿岸，希腊殖民者只占边缘地带，容易受到来自边缘带腹地的攻击。只有在半岛中央地区他们才比较安全，虽然后来事实证明这种安全也不是绝对的。

爱琴海东外侧沿岸的波斯人，从内地进攻靠海的希腊城市，雅典舰队便从半岛的城堡越海去援救他们遭受威胁的亲人，于是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发生了争端。波斯的海上袭击在马拉松（Marathon）被打败了，于是采取了受挫的陆上强国显然要采取的战略：在国王薛西斯（Xerxes）的率领下绕道进军，在达达尼尔海峡上用船搭成一座桥，从北方进入半岛，想要捣毁这黄蜂



图 3．希腊诸海（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略图。图示克里特岛海上基地和希腊半岛海上基地，以及薛西斯迂回包抄海上强国雅典的进军路线。

窝；黄蜂从这蜂窝里钻出来，蜇了他们就飞跑，难于扑捕。波斯人的努力失败了。一直等到后来半希腊、半野蛮的、繁衍于希腊半岛根部的马其顿人才结束了海上强国的第一个周期。马其顿人征服了在他们之南的希腊海军基地，然后进军亚细亚，通过叙利亚进入埃及，半路上毁了腓尼基人的泰尔（Tyre）。他们剥夺了希腊人和腓尼基人的基地，从而使东地中海成为“内海”。在把以上这些事办完之后，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便能轻松愉快地进军上亚细亚。我们可以大谈船只的机动性，舰队之便于远征，但是，归根到底，海上强国基本上取决于适当的基地，物产丰富而又安全的基地。海上强国希腊所经历的阶段和河上强国埃及所经历的一样。两国结局相同。没有海军的保护，商业活动也得在水道上安全进行，因为沿岸都在同一个陆上强国的把守中。

* * *

我们现在来谈谈西地中海。那里的罗马起初是一个小山上的城堡，山麓有一座桥和沿河码头。这个小山—桥—港口—城镇是小小一国农民的城堡和市场，农民耕种亚平宁山脉和海之间称为拉秋（Latium）的平原。“巨流”台伯河（Tiber R.）从航运的角度看来不过一条小溪，只能通航当时的小海舶。小海舶从海岸溯河而上，行驶几哩便到了平原中央，但是这样就足以使罗马占上风，赛过和它竞争的附近阿尔巴山（Alban）和伊杜斯卡山（Etruscan）上的城镇。罗马和伦敦一样，有桥又有最深入腹地的港口。

罗马人依靠拉秋的生产力，出台伯河沿西地中海海岸往来。不久他们和迦太基人发生竞争。迦太基人依仗的是隔海相对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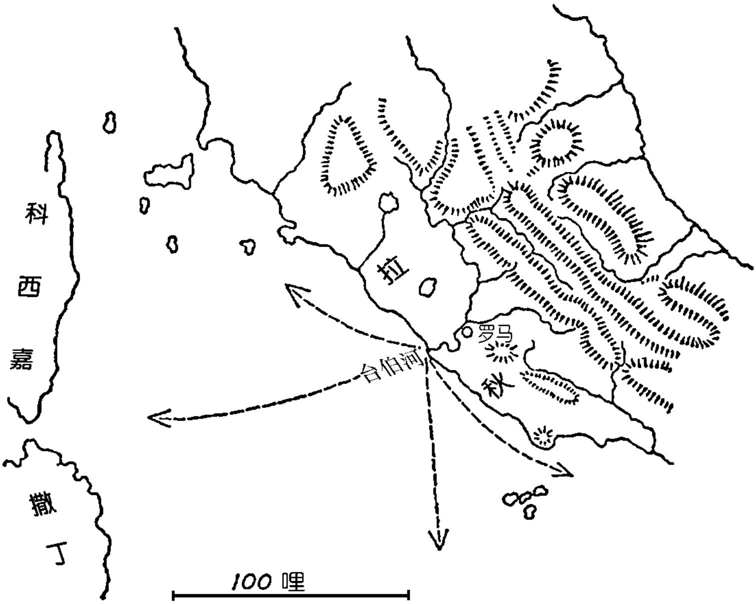


图 4．拉秋——富饶的海上基地。

非洲海角上迈杰尔达山谷（Mejerdeh Valley）的富饶资源。罗马和迦太基的第一次战争发生了，结果罗马人得胜，控制了海。他们于是着手全部并吞意大利的半岛部分，远达鲁比康河（Rubicon River)，以扩大他们的基地。

在罗马和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中，迦太基主将汉尼拔，就像薛西斯和亚历山大以前对付反对他们的海上强国那样，绕道行军，想迂回包抄海上强国罗马。他率领军队横越西面的海峡，从非洲进入西班牙，通过高鲁（Gaul）南部进入意大利。他被打败了，罗马就并吞了高鲁和西班牙的地中海海岸。在罗马和迦太基的第三次故事中，由于罗马占了迦太基本部，它便使西地中海



图 5．目的在迂回包抄海上强国的两次著名进军，同时也是“封闭”地中海的一次胜利。

成了“内海”，因为沿岸都在同一个陆上强国的把守中。

尚待完成的任务是，把地中海东西两盆地的控制连成一片，这两个盆地是由西西里海峡和墨西拿海峡（Strait of Messina）连着的。罗马的军团越入马其顿，从那里入亚细亚。但是拉丁的西方和希腊的东方之间的差别依然俱在，这显见于东西罗马两总督凯撒和安东尼之间发生内战。在阿克兴（Actium）海战中（该役是世界史上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凯撒的西方舰队打败了安东尼的东方舰队。从此就有五个世纪整个地中海成了“内海”；其结果，我们把罗马帝国基本上当作一个陆上强国。它并不需要舰队，除了少数警察使用的船只而外，就能像埃及的历代国王完全控制尼罗河水道那样，控制地中海这条海上动脉。陆上强国再一次剥夺了海上强国的基地，结束了水上争衡的一个周期。不错，最后曾发生阿克兴海战，凯撒的舰队像其他取得最后胜利的舰队一样，获得的战利品是整个海洋的控制权。但是这控制权后来并不是在海上保持的，而是把守了海岸后在陆地上保持的。

*　　　　*　　　　*

当罗马完成了它那环绕地中海的力量的组织工作时，接着有长长一段过渡时期，在这期间，西方文明的海洋发展在逐步准备中。过渡从罗马的公路制度开始，公路是为了军团行军更其迅速机动而铺筑的。

在罗马与迦太基的三次战役结束后，四个说拉丁语的行省围绕着西地中海——意大利、南高鲁、东西班牙和南西班牙以及迦太基非洲。这非洲行省的界外有撒哈拉沙漠保护，意大利的后方以亚得里亚海作护城河，但在高鲁和西班牙，罗马却与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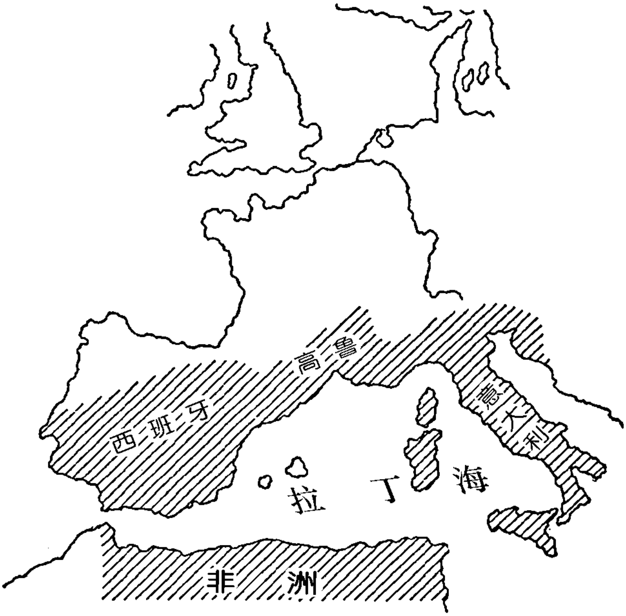


图 6．拉丁海，并示罗马与迦太基几次战争后的罗马领土。

不安的、独立的居尔特人（Celts）部落为邻。于是发生了帝国惯有的进退两难局面：迎向前去消灭这隐患呢，还是把它包围、封闭起来，但让它存在下去。仍然年富力强的民族选择前一条路，于是边疆和公路一直推到海边，蜿蜒在圣维森提角（Capes St. Vincent）和来因河口 1,000 哩之间。罗马帝国的拉丁部分结果逐渐依托在两种地势上：一方面是拉丁海——西地中海，另一方面是拉丁半岛——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①

① 我不知道拉丁海和拉丁半岛这两个名称以前曾用过没有。在我看来，这两个名称把重要的概况清楚表达出来了，我建议以后加以使用。

裘力斯·凯撒深入到比斯开湾（Bay of Biscay），建立了一支舰队，他用这支舰队击败了布列塔尼（Brittany）的威尼蒂（Veneti）的舰队。由于不列颠的居尔特人支援他们的亲属高鲁人，他接着横渡海映，在他们的海岛基地上打击了他们。100年之后，罗马人征服了不列颠所有南部和较富庶的部分，因此便消除了在高鲁海岸之外兴起一海上强国的风险。英吉利海峡也就这样成了“内海”，由陆上强国控制。

四个世纪之后，陆上强国罗马衰败了，于是拉丁半岛两侧的海很快就不再是“内海”。古代的挪威人从峡湾中出来在北海上纵横袭击，并且通过英吉利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甚至进入地中海的各个港湾深处，以其海军力量包围了整个广大的半岛。他们在不列颠岛和西西里岛占领了前方根据地，甚至还在诺曼底（Normandy）和意大利南部蚕食了大陆的边缘。

在这同时，撒拉逊（Saracen）骑骆驼的人从阿拉伯南下，占领了罗马帝国的迦太基、埃及和叙利亚——亦即地中海南的行省。然后他们以舰队出海，攻占了西西里的一部分和西班牙的一部分，作为海外基地。地中海因此不再是一个帝国的动脉，而成为划分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教国家的界壕。但是撒拉逊仗着较为强大的海军力量，使他们能够占住西班牙，尽管西班牙在地中海之北；就像早期的罗马一样，仗着较为强大的海军力量，能够占住迦太基，尽管迦太基在地中海之南。

拉丁基督教国家就这样被禁锢在拉丁半岛及其附属的不列颠岛上达千年之久。从古代的神圣海角（Sacred Promontory）朝东北方向是大洋海岸，直达哥本哈根海峡，直线距离为 1,500 哩；朝东则是蜿蜒的地中海岸，伸至君士坦丁堡附近的海峡，直



图 7．拉丁半岛，为现代罗曼斯语各国所据。

线距离也是 1,500 哩。每个海峡处都有一较小的半岛伸向大半岛，一边是斯堪的那维亚，另一边是小亚细亚，两个陆连沙洲之后就是两处陆地环绕的盆地：波罗的海和黑海；如果我们以不列颠来对等意大利，大半岛的末端就对称起来，你可以在大半岛上放一个纵长的十字架，头在德国，两臂在不列颠和意大利，脚在西班牙，中央在法国，这样便象征了这五国形成的基督教帝国；这五个国家，虽然位置偏北，却是罗马凯撒们的中世纪继承人。其东，波罗的海和黑海赋予欧洲从这里开始具有半岛特性，这里轮廓却不齐整，因为有巴尔干半岛向南伸展，逐渐缩成历史上有

名的小小的希腊半岛。

这样猜测是否饶有兴味：如果罗马不拒绝去征服来因河以东，那会出现什么情况？独一无二的极强大的海上强国，远至黑海和波罗的海也都拉丁化了，谁能说它不能从其半岛基地控制世界，但是古罗马基本上是地中海的而不是半岛的强国，必须把来因—多瑙边界看成是从地中海岸推进的限界，而不能看成是半岛政策的未竟之业。

正是两边的海的再次“开放”，才使欧洲第一次具有半岛感。一定要组织相应的对策，否则来自南北的压力会消灭掉基督教国家。因此查理曼（Charlemagne）[①]就横跨来因河建立了帝国，语言是半拉丁半日耳曼，但是宗教整个是拉丁的。以该帝国为基础，后来便有了各次十字军。时间使我们已能看得更透彻些，并运用海上人的观点，我们说，如果十字军成功，它们主要的作用将是再一次“封闭”地中海。持续达两世纪之久的漫长的多次十字军战争，是沿两条路线进行的。一方面，从维也纳和热那亚派遣舰队到叙利亚海岸的雅法（Jaffa）和阿克（Acre）；另一方面，大军通过匈牙利前进，沿着莫腊伐河谷和马里乍河谷（Morava and Maritza Va1leys）的著名“走廊”，通过君士坦丁堡和小亚细亚进入叙利亚。十字军的这几次陆上进军，从一日耳曼基地出发，绕道抚地中海之背，这和亚历山大从他的马其顿基地出发的同样的进军，显然有可对比之处。在半希腊的马其顿人和半拉丁的日耳曼人之间，确实有不少地方可以比较的。没有一个纯血统的希腊人不把马其顿人当作是个什么杂种！但是

[①] 即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约为公元742—814。——编者



图 8．图示德国处于拉丁半岛的咽喉，马其顿处于希腊半岛的咽喉。

马其顿人在希腊半岛广阔的根部上所占的地位，使他仍征服了希腊这海上基地；就像日耳曼人在大拉丁半岛广阔根部上所占的地位一样，使他们经常威胁来因河和阿尔卑斯山那边的拉丁各海上基地。

属于拉丁文明的各国人民因此受了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数世纪严冬的磨练；在这期间，他们被穆罕默德教徒围困在本国境内，几次十字军冲击突围都失败了。只是到了 15 世纪，在海上大规模开拓的时机才成熟，这种开拓后来使世界成为欧洲的了。值得我们现在暂停片刻来进一步研究一下这独特的环境。我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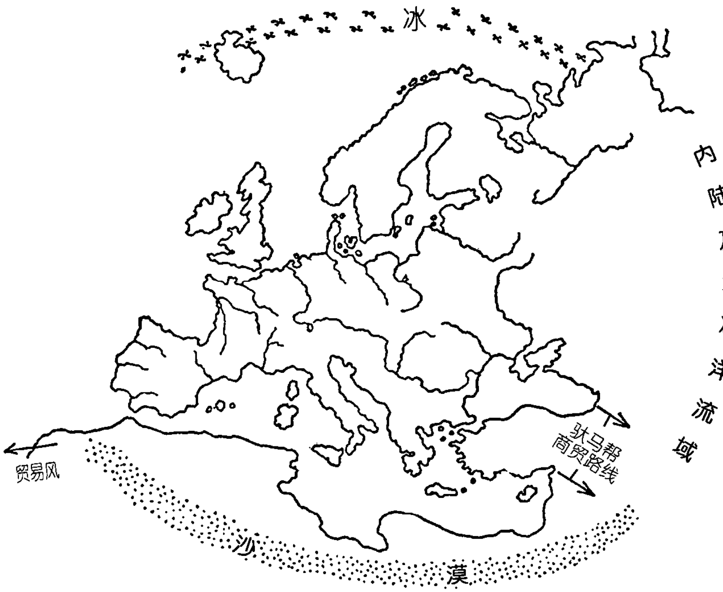


图 9．海上人的欧洲的河流和沿海通道。欧洲的全部陆地面积不到地球面积的百分之二。这是中世纪基督教国家的牢房，现代基督教国家的海上基地。

类的西方血统，在这环境中长成的进取心和坚毅性格，使西方人在现代世界中取得了领导地位。欧洲只不过是同时包括亚洲和非洲在内的大岛之一小角而已，而欧洲人的发祥地只占欧洲的一半——拉丁半岛及其附属的若干半岛以及聚于周围的各岛。其南是广阔的沙漠，骑骆驼要花约三个月才能横渡，因此黑人便和白人隔离开了。其西是茫茫大海，其北是冰封的海洋。其东北是无穷无尽的松林和河流，河水不是经由冰块壅塞的河口流入北冰洋，便是流入内陆海，例如和海洋隔绝了的里海。只在其东南才有可以通行的绿洲路线通向外界，但是从第 7 世纪到第 19 世纪，这些路线差不多全部被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封住了。

由于苏伊士地峡的阻隔，欧洲的水路系统怎么说也是和印度洋脱开了。因此，尽管陆上人可能认为欧洲和亚洲结成一体，从海上人的观点来看，欧洲却是个很具体的概念。它是另外一个世界，但是它有充足的富源；其中的水路交通，又使得各国自然而然结合成为亲密的大家庭。水路分支交叉，使船夫毋需冒险航行于大海之上，而在江河两岸中操舟航行，就能往返于海岸各地之间。此外，在罗马公路制度衰落后比较缺乏道路的时候，船夫往往上溯到许多河流的源头，这些源头现在已不值得再去航行，我们已废弃不用了。

关于中世纪欧洲之被围困，有两方面幸运的情况。一方面是，异教徒并没有控制了取之不竭的人力，因为他们的基地是没有水草的和略有水草的沙漠、草原以及面积较小的绿洲；另一方面是，拉丁半岛临洋的边界没有受到严重的威胁，因为还是异教徒的古代挪威人虽然凶猛残酷，但是以峡湾山谷为基地，这些峡湾山谷甚至此绿洲更狭小，出产更少；同时，无论他们定居在哪

里——在英吉利、诺曼底、西西里还是俄罗斯——人数不多，不久就被居住更久的当地人民同化了。因此欧洲的整个防御力量可以用来抵抗东南方的威胁。但是，由于欧洲文明获得了动量，便有余力去经营海洋，在后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威尼斯和奥地利两地就已足够应付。

在古代挪威人力图在格陵兰以北的冰雪世界里开辟通道而没有什么成效之后，葡萄牙人便着手沿非洲海岸航行，寻觅一条通东印度[①]的海路。他们的冒险受到半英半葡的“航海者”亨利王子（Prince Henry）为首的鼓励。乍一看似乎很奇怪，像哥伦布这样的航海家们，毕生从事于沿海航行，常常从威尼斯到不列颠，但当他们驶出直布罗陀海峡时，却老是不南下探险。看来尤其奇怪的是，等到最后他们决心去发现非洲的轮廓时，花了两代的时间，几乎年年航行，后来才有达·伽马[②]领头进入印度洋。他们的困难是由于物质上的原因。从卡内里群岛的纬度到佛得角的纬度，长凡1,000 哩，那一带非洲海岸是酷热的沙漠，因为干燥的贸易风不停地从内陆吹来。乘这股刮不停的风张帆向南，可能是比较容易的事，但是不能像现代航轮那样可以逆风行驶的帆船又怎能返航呢，这些船既不敢扬帆出海，抢过这股风行驶于大洋之上，又不敢沿着无淡水、无食品供应的海岸，没精打采斜兜着风驶返本土，因为那时候坏血症还无法医治。

葡萄牙人一旦找到了通向印度的海洋的洋道，不久便消灭了阿拉伯单桅商船的抵抗。欧洲从后方攻其敌人，就像薛西斯、

---

① 指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及其附近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印度支那和东印度群岛。——译者

② 达·伽马（Vasco da Gama），约 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译者

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十字军曾绕道进军到海的后方一样。

从那时候起，直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航时止，绕航好望角的欧洲的海上人继续不断，越来越多；他们又在东方的海洋上向北航行，远至中国和日本。直到今天，只有一条船，瑞典男爵诺登斯高特（Nordenskiold）的“凡加”号（Vega），沿亚洲之北航行——历尽艰险，费时两年——而有幸没有环绕航行三洲合一的大陆，因为这条船是经过苏伊士运河驶返本国的。同时除却冒险旅行而外，在上一世纪之前，也没有人从陆上到东印度去过。和东印度做买卖是由沿海航行来进行的（无疑这是大胆的航行），环绕那向南伸展的海角，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海角这一边的海岸是欧洲的和非洲的，另一边的是非洲的和亚洲的。从通向东印度的交通观点来看，世界是个大大的海角，在不列颠和日本之间伸向南方。这世界海角被海上强国所包围，就像以前的希腊海角和拉丁海角那样，沿海都可以进行舶来贸易，也会遭到来自海上的袭击。海上人自然选定靠近大陆海岸的小岛，例如蒙巴萨（Mombasa）、孟买、新加坡、香港，或者小小的半岛，例如好望角、亚丁（Aden），作为他们在当地贸易或作战的基地。因为这些地方可供他们的船只停泊避风，使他们的仓库得到安全保障。当他们胆量渐壮、力量渐强的时候，他们便把他们的商业城市，例如临近大河大江入口处的加尔各答和上海，变成物产丰



图10．世界大海角。

富、人烟稠密、有买卖可做之地。欧洲的海上人，由于他们具有更大的机动性，得以在约四个世纪内压倒非洲和亚洲的陆上人。

由于伊斯兰国家比较孱弱了，对基督教国家的迫在眉睫的危险就没有了，这无疑是中世纪末中古时代欧洲分裂的原因之一。早在 1493 年，教皇就已不得不从南极到北极，在大洋上划了他那有名的界线，以阻止西班牙的和葡萄牙的海上人发生争吵。由于这样的分裂，就兴起了五个互争雄长的海洋国家——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国——而不是一个国家。十字军军人的理想则无疑是一个国家。

1,000 年间，从海上强国的古代情况演变到现代情况，其结局驱使我们比较一下希腊半岛和拉丁半岛，而它们都有其贴近的岛，半岛的希腊和完全是岛的克里特之间早先的关系，就如同拉丁半岛和不列颠岛之间后来的关系。在陶里斯人的控翻下，半岛大陆较为富饶的资源被用来征服克里特。但到后来，斯巴达和雅典争锋，便无从充分利用半岛作为海上基地。大半岛和大岛的情况也如此。不列颠被罗马从半岛大陆征服了、占领了；但中世纪行将告终时，拉丁半岛上有几个互相敌对的海上基地，每一基地都有遭受来自背后陆上的攻击的可能，就像雅典和斯巴达曾遭到马其顿人的侵犯那样。在这些拉丁基地中，有一处，即威尼斯，和伊斯兰国家对垒，其他则为争夺制海权互相征伐不已。因此后来这较小的不列颠岛的基地，在拉丁半岛基地缺乏联合的情况下，成为包围、遏制这大半岛的强国的本土。

不错，在大不列颠内部，直到 18 世纪才出现有效的团结局面；但是地理的实际情形决定了，总是应该有优势的英格兰人民生息在岛的南部，不管他们和苏格兰人、威尔斯人相处得好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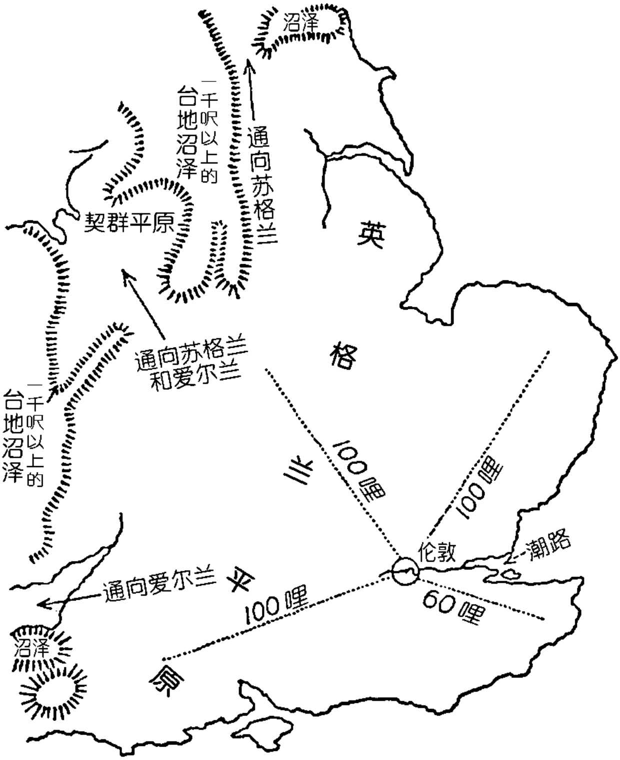


图 11．英格兰平原——丰饶的海上基地。

坏。从诺尔曼（Norman）时代起，到以煤田为基础发展了现代工业时止，英格兰民族的结构几乎是无比地单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同英格兰历史搅混在一起之前，英格兰的历史之成为史诗，原因正在此。在西部和北部的山脉之间是一片肥沃的平原，东面和南面是窄狭的海面，人民务农，只有一个国王，一个国会，一条随潮涨落的河，一座大城作为中央集市和港口——英格兰就是在这些因素上建立起来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英格兰，

在伊丽莎白女王[1]统治时期的一个晚上，当西班牙的无敌舰队驶入英吉利海峡时，英国报警的小山顶上的烽火，从普利茅斯一直燃烧到特威德河上的伯里克（Berwick-on-Tweed）。在较小的范围内，拉秋平原，台伯河，罗马城，上议院和罗马人民，一度也曾具有类似的统一体，类似的行动力量。历史上英国作为海上强国的真正基地是我们的英格兰平原——肥沃而与别处隔绝，后来再加上从平原边缘上发掘出来的煤与铁。以圣乔治的旗作为皇家海军的白色军旗，是有某些历史性的原因的，是和次要的伙伴们有所“区分”的。[2]

从最近三世纪英国历史中可以了解到海上强国的种种特点。但是物产丰富、有安全保障的本土基地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附带的。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每天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英吉利海峡。但是在 1918 这关键性的年头，我远望英格兰平原上一片丰硕的庄稼，我以为，作为以航海为业的人民，对于我们物产丰饶的土地的感恩，应当不下于对海峡的感恩。岛国克里特不得不屈服于从大半岛来的陶里斯人。

在过去的三个世纪中，曾有四次企图从对岸的半岛的沿海一带，来推翻不列颠的海军力量——一次从西班牙，一次从荷兰，两次从法国。到最后，特腊法耳加（Trafalgar）战役[3]之后，英国的海军力量，有了在直布罗陀、马耳他和赫耳果兰岛（Heligoland）基地的辅助，明白确凿地包围了拉丁半岛。尽管有敌

---

① 伊丽莎白女王（Queen Elizabeth），1533—1603，1558 年登基，直到 1603 年。——译者

② 圣乔治约死于 303 年，殉教而死，是“英格兰的守护神”。“次要的伙伴”是指苏格兰和威尔士。——译者

③ 1805 年英国海军于该处战胜法国和西班牙舰队之役。该役奠定了英国在海上的霸权。——译者

人的私掠船，大陆的海岸线实际上成了英国的边界，从而英国能在海上从容备战。英国在西班牙从容进行了“半岛”之战[①]，英军又在荷兰从容登陆，援助它的军事同盟国。它甚至把它的军队从伐耳赫伦岛[②]和拉科鲁尼阿[③]运走，预谋了加里波利（Gallipoli）的行动[④]。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的海军力量围绕着这世界大海角，几乎无敌于天下。这世界海角在英国与日本之间，直伸至好望角。海上的英国商船是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英国资本投资于外国的是不列颠资源的一部分，受伦敦城[⑤]的控制，可以用来维护海上和遍诸四海的霸权。这其是一个踌躇满志、获利丰厚的境遇，以致维多利亚王朝中期的人，认为不列颠岛国之应统治四海，几乎是理所当然的。在世界其他各处，我们可能是不很受欢迎的人。我们那受海峡保护的位置，似乎是一种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是军舰不能航行于山脉之间，自从伯兰泰吉涅(Plantagenet)[⑥]诸王对法国的几次战争以来，我们并未设法永远征服欧洲。因此，整个说来，我们或者可以指望外国的历史学家，在定评 19 世纪我们的英国时，会像那流行的小学生对他的校长的形容那样：“是一头野兽，但是一头讲公道的野兽。”

---

① 半岛指艾比利厄半岛。1808—1814 年，英、西、葡在那里和法军作战。——译者

② 伐耳赫伦岛（Walcheren），荷兰西南部沿海一岛。——译者

③ 拉科鲁尼阿（Corunna），西班牙西北部一海港。——译者

④ 按指 1915 年 4 月英军在该处登陆，企图打开达达尼尔海映，结果被土军击败退出。——译者

⑤ 伦敦城（City of London）是伦敦郡中央的故城，是这大都市早年的核心，占地一平方哩。这里用来代表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力量。——译者。

⑥ 英王朝名，自亨利二世传至李查二世，1154—1399。——译者

英国海军力量最了不得的结果，可能是大战前一个世代内在印度洋取得的地位。在印度的英国统治有赖于来自海上的支援，但是好望角、印度和澳大利亚之间的整个海面上经常没有英国战斗舰，甚至连一等巡洋舰也没有。实质上印度洋是个“内海”。大多数的海岸线不是为英国所有就是受英国“保护”，此外的沿海各地，或则像荷属东印度群岛那样是在岛上，或则是在如葡属莫三鼻给和德属东非洲那样的地区上；这些地区虽然位于大陆，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无法从陆上和欧洲相通的。除却在波斯湾里，别处都没有既有安全保障、又有必要资源的足以争夺海上霸权的基地。而英国的政策中有一条公诸于众的原则，即无论在波斯湾的波斯海岸或土耳其海岸，都不许建立海军基地。表面看来，罗马人的地中海内海，加上来因河边疆上的军团，同印度洋内海加上印度西北边疆上的英国军队之间，有十分相似之处。分别在于，地中海之成为内海有赖于军团，印度的海洋之成为内海，是靠来自本土基地的海军力量本身这条长臂维护的。

*　　　　*　　　　*

在上述海上强国盛衰的简捷考察中，我们没有停下来考虑那独霸四海的陈旧主题。现在人人都知道，由于海洋是相连的和船的机动性，一次决定性的海战有当时的和长远的效果。凯撒在阿克兴打败了安东尼，凯撒的命令就在地中海沿岸各处贯彻执行。英国在特腊法耳加赢得最后的胜利，便能不许敌人的舰队使用所有的海洋，便能把它的军队输送到任何它要送去的海岸，也可以从那里转移，便能从外国把给养送到本土，便能对任何一个有海岸线的、冒犯它的国家在谈判中施加压力。我们这里所关心的，毋宁是关于海上强国的基地及其和陆上强国

的基地的关系。说到最后，这是一个基本问题。尼罗河上战艇成队，而尼罗河又停息了它们间的争斗，因为埃及全境所有肥沃的基地都被同一个陆上强国控制了。克里特岛的基地被较大的希腊半岛基地征服了。马其顿陆上强国把希腊和腓尼基的基地，无分轩轾都剥夺了，从而使希、腓的战船不能进入东地中海。汉尼拔横越大陆进攻海上强国罗马的半岛基地，这个基地由于陆战胜利而保住了。凯撒因取得水上胜利而独霸地中海，罗马又以陆上边界的防卫保持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中世纪时，拉丁基督教国家从其半岛基地在海上保卫本国。但在现代，由于半岛内部争夺雄长的国家纷纷崛起，半岛上有了几个海上力量的基地，就都容易遭受陆上的攻击，海上的霸权便落入一国之手，该国基地并没有半岛的广阔，但位处岛上——很幸运，是个肥沃又产煤的岛。英国的冒险家于是依仗其海军力量，建立了以殖民地、种植园、补给站和保护国组成的海外帝国，并海运部队在印度和埃及建立了当地的陆军力量，英国海上力量的效果如此显赫，也许就会出现一种倾向，它忽视历史上的警告，并笼统地认为：由于海洋是一体的，海上强国在与陆上强国争锋时，无可避免地会取得最后胜利。

*　　　　*　　　　*

从没有比在最近的战争中，以及在引起这次战争的事件中，海上力量起了更大的作用的事例。这些事件开始发生在约 20 年前，英国舰队一枪不发而取得了三次大胜。第一次是在马尼拉，在太平洋上，当时有一支德国舰队气势汹汹地干涉，要保护一支快要被美国舰队打败的西班牙舰队 ①；有一支英国舰队支援了

① 这里所谈的是 1898 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译者

美国人。不用过分强调这一孤立的偶发事件，但可以把这事件认为是西班牙和美国作战时各强国之间关系的典型事件。这次战争使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都有了和别处不连接的土地，使美国进行建筑巴拿马运河，以便美国舰只的动员可以利用岛国的有利条件[①]。因此这是使英美言归于好、同心协力的第一个步骤。此外，对南美而言，门罗主义得到了支持。

英国舰队的第二次胜利是，南非战争时，英国舰队对海洋的控制对英国维护在印度的统治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第三次是英国舰队把日俄战争局限在一个圈圈内，并附带使进入中国的门户洞开。在这三次事件中，如果没有英国舰队的干涉，历史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虽然如此——说不定正因为如此——在海军法则（Navy Laws）的一再作用下德国海军成长了，使得英国的战斗舰队退出远东和地中海，而在这两处海面上和日本的、法国的海军力量合作。

这次大战本身是以老方式开始的，一直等到 1917 年才显出了新的现实的局势。斗争刚开始的头几天，英国舰队已经控制了海洋，并在法国舰队的帮助下包围了整个半岛的陆上战场。驻在德国殖民地的德国军队被隔离了，德国商船在海上不能航行了，英国远征军横渡海峡不折一兵，不失一马，从远洋来的英法给养安全送到。总括一句话，为了战争，英法各地领土已结成一体，两国共同的边界已推进至德国海岸的大炮射程内——差不多抵消了法国有几个县很令人遗憾地暂时失陷。在马恩一战之后，真正欧战形势图上的英法前线，应当是沿着挪威、丹麦、德

① 指由于巴拿马运河的建筑。美国的舰队可以迅速调遣，使用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译者

国、荷兰和比利时的海岸——遇到中立国家的海岸时离开三哩——然后弯弯曲曲通过比利时和法国而至瑞士汝拉（Jura）的边境。该线以西，不论陆海，两种兵力都可以准备好防御敌人的进攻。9 个月之后意大利敢于参加协约国，主要也由于在协约国海军力量保护下它的各个港口能通航无阻。

东线进行的也是老式战争。那里的陆军力量分成两支敌对的军队。外面那一支，尽管它属于不如人意的沙皇俄国，却和民主西方的海上强国结成联盟。简单说来，力量的部署大体上重演了一个世纪以前的情景，那时英国的海军力量在“半岛”上支持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又和东方专制的陆军强国结成同盟。拿破仑则在两线作战。这两条线如果用现在的名词来说，我们应称之为西线和东线。

可是到了 1917 年，由于美国参战，沙皇俄国崩溃，以及接着俄国作战力量被瓦解，大变化发生了。战争的世界战略全改了。从此我们是为了使世界成为民主国家的安全场所而战。我们现在可以这样说，而不得罪我们任何一个盟国。关于理想主义，我说到这分寸为止。但是同样重要的是，我们该记住现实的新面貌。最近，在战争将近结束时期，我们打的是陆上强国和海上强国之间一场倾注全力的决斗，海上强国并且包围了陆上强国。我们得胜了，但是如果是德国对外征服得胜，那它就会在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广阔的基地上，实际上在无可再广阔的基地上建立它的海上力量。现在，欧、亚、非三洲合一的大陆，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质上是个岛。为了防止我们忘记，让我们在下文中经常称之为“世界岛”(World-Island)。

海上人没有很早就领会到“世界岛”这一说法的概括意思，

原因之一是他们未能绕航“世界岛”。横亘达 2,000 哩的冰山浮于北冰洋上，冰山的一边搁置在亚洲之北的浅滩上。因此，就一般的航行目的而言，这个大陆并不是一个岛。近四个世纪的海上人把它当作一个大海角，从情况不明的北方伸展向南，就像一座山峰，从被云雾遮掩的山脚冒出顶来一样。甚至在上一世纪，在开辟了苏伊士运河之后，向东的航行仍然要绕一个海角，不过绕的角是新加坡而不是开普敦。

上述情况，加上它那极其庞大的面积，曾使人认为，这一大陆和其他各岛的不同不仅在于面积大小。我们称它的组成部分为欧洲、亚洲和非洲，完全像我们称洋的组成部分为大西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甚至古代的希腊人也在理论上把它看成一个岛，但是他们称之为“世界”。今天的小学生知道这是“旧世界”，以有别于另外两个半岛合成的“新世界”。海上人则仅称之为“大陆”，一片相连的土地。

让我们思考一下这新近被人认识到的“大岛”(Great Island) [①]的比例和关系。“大岛”就像是扛在地球北极的肩膀上。沿着亚洲的中央子午圈，从北极量到南极，我们首先遇到的是 1,000 哩长冰雪覆盖的海，直达西伯利亚北岸；然后是 5,000 哩长的土地，直到印度的南端，接着是 7,000 哩长的海，到冰天雪地的南极。但是沿着孟加拉湾或者阿拉伯海的子午圈量，亚洲横亘不过约 3,500 哩。从巴黎到海参崴是 6,000 哩，从巴黎到好望角距离相同；但是这些测量是在周长 26,000 哩的地球仪上量的。假如没有冰山作梗而能绕航，求实的海上人老早就会用类似的

① 如果想用地图来帮助理解下文，就会引起误解。只能从地球仪来领会。因此下文是用简图说明；请参阅第 12、第 13 图。

名称来称呼这“大岛”，因为这“大岛”只有他们的海洋 1/5 强那么大。

这“世界岛”东北和东南都以角尖为终点。天气晴朗的日子，你可以在东北岬上眺望白令海峡对岸，有两个长长的半岛由此开始，每一半岛长达地球周长的 1/26，我们称这两个半岛为南、北美洲。表面看来，没有问题，新旧世界有某种对称性的相似，两边都各有两个半岛，一边是非洲和欧—亚，另一边是南、北美洲。但是二者并无真正相像之处。非洲长约 4,000 哩的北海岸和东北海岸，和对岸的欧洲和亚洲关系亲密，倒是撒哈拉在隔离社会的联系上远远超过地中海。在航空时代——这时代正在到来——海上强国只有在陆上强国的允许下，才能使用地中海和红海的水路；当遇到与海上强国争锋时，陆上强国的力量便成了一支新型的两栖骑兵。

但是南、北美洲只在巴拿马一线相连，从实际效果讲，彼此间不是半岛的关系而毋宁说是岛的关系，广阔的海洋围绕着南美，只它的边缘上有一点点地方除外。南美洲不只地处南方，而且大体上是处于北美洲之东。这两处，依军人的说法，形成了梯队。就与亚洲的关系而言，北美的情况也如此，因为它从白令海峡伸展至海洋中，从而从北京到纽约最短的路线，从地球仪上可以看到，是横渡白令海峡。这种情况，将来会有一天对坐火车乘飞机的旅客起重要作用。新大陆中的第三个是澳洲，离开亚洲的东南角有 1,000 哩，面积只有地球表面的 1/65。

因此这三个所说新大陆，以面积而论，只是旧大陆的卫星而已。一个洋就占了地球 9/12，一个大陆——“世界岛”——占了地球 2/12；还有许许多多较小的岛，从实际效果讲，南美和北美

是其中之二，它们同其他的合起来占了地球剩下的 1/12。既然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的现象，也能看到现实，就可以看出，“新世界”这个名词含有一种错误的看法。

正确地看，高瞻远瞩地看，那向南伸展至好望角的世界大海角，同那北美海上基地之间，又在极广大的范围内构成了半岛和岛之间的相对关系，成为希腊半岛和克里特岛、拉丁半岛和不列颠岛之后的第三个相对关系。但是有这极重要的不同之处：这世界大海角，一旦由于现代陆上交通发达而结成一体，事实上便成了“世界岛”，蕴有岛的有利条件以及无可比拟的广大资源的有利条件。

相当时期以来，美国的领袖人物已体会到他们的国家已不再是另一个世界。威尔逊总统已使全体美国人民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已同意投入这次战争。但是北美甚至已经不是大陆了；在这 20 世纪，它正缩小为一个岛。美国人习惯于说他们那 300 万平方哩等于全欧洲的面积，他们认为，有一天会有一个欧洲合众国，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姊妹国。虽然他们可能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一点，但是现在他们已决不能把欧洲和亚、非两洲分开来考虑了。旧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岛，或者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单位，我们地球上无可比拟的、最大的地理单位。

短短的美国历史同较长的英国历史，有异常相似之处。两国现在都同样经过了接踵而至的殖民地时期、大陆时期和岛屿时期。沿不列颠东海岸和南海岸的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定居地，常被认为是沿北美东海岸的 13 个英国殖民地的先驱。而人们不常记得的是，英国历史上有一段大陆时期可以和美国的林肯时期相比。阿尔佛来特一世（Alfred the Great）所进行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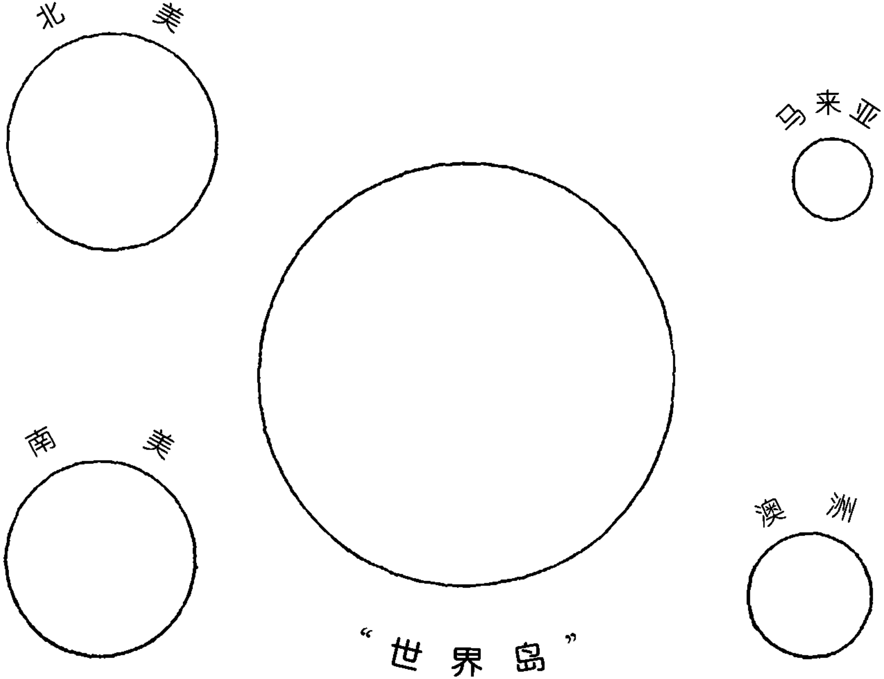


图 12．诸圆圈代表“世界岛”及其卫星的相对面积。

和征服王威廉一世（WIlliam the Conqueror）所进行的战争，在不小的程度上是英格兰各部分之间的斗争；古代挪威人又来干涉；所以英国直到伊丽莎白女王时代才真正成为岛国，因为直到那时英格兰才不和苏格兰敌对，本身才统一，才在它和邻近大陆建立关系时自成一个单位。今天美国是个单位，因为美国人民已经在战争中解决了内部分歧；美国也是个岛国，因为形势逼迫美国人认识到他们所谓的大陆，不过和旧大陆一样，都在这地球上。

我们从世界地图上来看看这次战争在 1918 年的进行情况。这是岛国和大陆国间的一场战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战争是在大陆上打的，主要在半岛的法国的内陆前线进行。参与这一边的是英国、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日本——都是岛国。法国和意大利是半岛国，但是如果没有岛国的支援，它们不会由于这个有利条件而作战到底。印度和中国——中国是就其在满洲前线参战而言——或可视为英、美、日本海上力量的前卫。荷属爪哇是唯一没有参加西方协约国的人口众多的岛，但是甚至爪哇也没有在大陆国那一边。各岛国同心协力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由于俄国革命净化了我们作战的理想，俄国的崩溃澄清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观点。

如果我们考虑到地球的人口，看法亦复如此。全体人类有 14/16 生息在“大大陆”上，差不多 1/16 强在离得很近的不列颠岛和日本岛上。直到今天，在移民四个世纪之后，其他较小的大陆上还只生息着约 1/16 的人类。大概时间也不会使这样的比例起重大变化。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北美的中西部不久可以多养活一亿人口，那么很可能在同一时期亚洲内陆的人口比现在多二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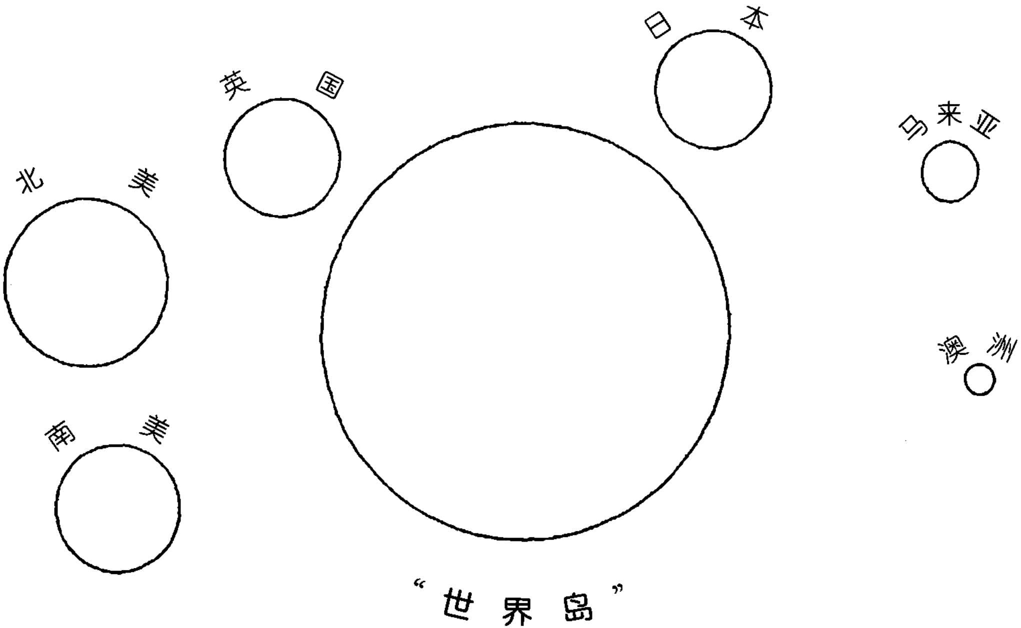


图 13．诸圆圈代表“世界岛”及其卫星的相对人口。

如果南美的热带地区能多养活一亿，那么非洲和东印度的热带地区不是没有可能多养活二亿。单单刚果的林区拓殖农业，而人口密度像爪哇那样，就可以维持约四亿人口，而爪哇的人口也还在增加哩。进一步挽，按照亚洲的气候和历史，我们是否有权认为，亚洲的内陆不能把人民养育得像欧洲、北美或者日本那样的健壮呢?

如果“大大陆”，整个“世界岛”或其大部，在将来某一个时期成为海上强国单一的和统一的基地，那会出现什么情况？其他的岛国基地不就在船只方面造不了这许多船，在海员方面拥有不了这许多人了吗？他们的舰队无疑地会继承其光荣历史传统，英勇作战，但是结局是注定失败的。就是目前这次战争，岛国美利坚不得不来支援岛国不列颠，并不是由于英国舰队在目前不能继续控制海洋了，而是生怕在和会上，或者毋宁说是在停战谈判会议上，答应把一个能造船又有人的基地给德国，而使得不多几年以后英国在造船和人力上无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德国舰队在福思河口（Firth of Forth）的投降是一桩了不得的事件。但是如果我们冷静下来，从长远看，我们不是仍然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出现的局面，即“大大陆”的一大部分可能有一天统一于一个势力之下，可能以之为基地，建成一个无敌的海上强国吗？我们能否在这次战争中消除掉这种危险，并且在我们的解决办法中不留空隙，以免将来被人利用，卷土重来？难道我们不该认识到，就战略而论，这是对世界自由的最重大的威胁，并且在我们新的政治制度中应设法加以防止吗?

让我们从陆上人的观点来看这件事。

第四章　陆上人的观点

四个世纪之前，由于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等伟大先驱者的航行，人类的整个眼界在一代之中变换了。海洋是整体这个概念，以前只是从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潮汐相似来推论到，现在突然成为求实的人们的必备知识。由于现代陆上和空中的交通方式，我们目前这一代正进行着类似的革命，使人迅速认识到大陆是个整体。岛国的人对于正在发生的事认识迟缓。英国参战是为了保卫它的邻国比利时和法国，模模糊糊看到通过它们的危险可能会使它自己受威胁；但只是由于道义上的约束，它对比利时负有责任，才几乎举国一致决心参战。美国是被“露西泰尼亚号”惨案[①]所激动，最后参了战，因为德国潜艇全面侵犯了中立国的权利。这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起初都没有认清这次战争的战略意义。它们只看到大陆的外貌，就像命名几内亚（Guinea）、马拉巴尔（Malabar）、科罗曼德耳（coromandel）和摩尔曼（Murman）“海岸”的那个航海家的见识。无论是在伦敦还是在纽约，都不像在欧洲大陆的咖啡馆里那样，普遍地讨论国际政治。因此，为了理解大陆的观点，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立足点从“海岸”的大圈圈外面移到里面。

让我们先把我们的数据编成“旅”，因为只有这样做了，我们才能够灵活理解这片大陆在战略思想中的现实意义。当你思考

① “露西泰尼亚号”(Lusitania)，英轮名，1915 年 5 月被德国潜艇击沉于北大西洋，死 1,000 多人，其中有 128 个美国人——译者

大事，你必须想得宽广。一个营的校官以连来考虑问题，一个师的将官则以旅来考虑问题。为了编组我们的旅，开始时有必要谈一下地理的具体情况。

*　　　　*　　　　*

亚洲的北方边沿是不能通航的海岸，除了一条窄窄的水道外到处是冰；冬季搁浅的浮冰同海岸冻成了一片，但在短短的夏季里融化了，所以出现了这条水道——沿岸出现，并无定所。意外的是，有三条世界上最大的河流，勒拿河、叶尼塞河和鄂毕河，通过西伯利亚向北流到这海岸，但是在实际效用上，这三条河同总的水上（海、河）运输系统不衔接。①西伯利亚之南是至少和西伯利亚同等面积的地区，这些地区的水都流入不通海洋的盐湖。



图 14．图示亚洲和欧洲大部分地区的河流，不是流向冰天雪地的北方，就流入不通海的盐湖；并示面向欧亚的非洲之部长达 4,000 哩。（等积投影）

① 到目前为止情况如此。但是有了破冰船的帮助，现在正在努力——尤其是

例如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流域的都流入里海，又例如阿姆河（Oxus）和锡尔河（Jaxartes）流域的流入咸海。[①]地理学家把这些内陆盆地称为“大陆化的”(Continental）盆地。合起来算，北冰洋地区和内陆流域的总面积几乎占了半个亚洲和四分之一的欧洲，并且在大陆的北部和中部连绵不断，结成一片。这整个一片，从西伯利亚冰冻的、平坦的海岸，一直伸展到俾路支斯坦（Baluchistan）和波斯的酷热的、陡立的海岸，从海上不能到达那里。用铁路来使它和外界相通——因为以前几乎什么路都没有——和在不久将来建立航空线，将造成人同世界巨大地理现实的关系的革命。让我们把这一大区域称为“大陆的心脏地带”（the Heartland of the Continent)。

“心脏地带”的北、中、西都是平原，拔海最多不过几百呎。在这片地球上最大的低地上，包括有西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欧洲的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山脉虽然长，却高得有限，沿伸到里海以北约300哩处就停止了，为西伯利亚进入欧洲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通道。让我们把这片大平原称为“大低地”（Great Lowland)。

“大低地”向南伸至台地之麓。台地的平均高度的为半哩，其上峰峦起伏，有高达一哩半的。台地的宽脊上背着三个国家：波斯、阿富汗和俾路支斯坦。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整个一片称

太恩薩特（Tyneside）的企业的努力——开辟一条航道，直通鄂毕河口和叶尼塞河口，这样，说不定会建立起一条夏季通向西西伯利亚的海上航道。(太恩薩特是指英国太恩河沿岸。当时是英国造船、机器制造业的中心之一，也是煤业中心之一。——译者)

① Oxus 和 Jaxartes 乃古名，现分别称为阿姆河和锡尔河。——译者



图 15. “大低地”向西延伸到欧洲，超出“心脏地带”的范围。“心脏地带”的东段边界上有从地势高耸的高原上流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河流。

为伊朗高原。作为北冰洋和内陆流域区域的“心脏地带”，包括“大低地”的绝大部分和伊朗高原的绝大部分。因此它一直伸展到波斯山脉的又高又长、弯弯曲曲的边缘上，山脉外边就是幼发拉底河谷和波斯湾所在的洼地。

现在让我们在想像中到非洲西部旅行。那里，在卡内里群岛和佛得角群岛所处纬度间，有一片沙漠海岸。要记住，正是这一片海岸具有的特点，才使中世纪的航海家久久不能启航南行，绕航非洲。撒哈拉广达 1,000 哩，从那里的大西洋岸横贯非洲北部，一直铺展到尼罗河谷。撒哈拉并非到处一片黄沙，也有许多绿洲——深陷下去的山谷，谷中有井，井底的地下冒出水来；也有丘陵地带，小山顶上有时结集着云层——但是这些小而分散的绿洲，只是这片同欧洲差不多大小的没有河流的不毛之地上的例外。撒哈拉是世界上最绵延不断的天然疆界；它有史以来都是白人与黑人间的障碍。

在撒哈拉和“心脏地带”之间有一宽阔的空档，它被阿拉伯占有了。尼罗河谷两岸，西边的叫利比亚，东边的叫阿拉伯。离此而到幼发拉底河下游的那边，到波斯山脉之麓，被称为阿拉伯斯坦（Arabistan），亦即阿拉伯人的故乡。同当地的习惯看法完全相符，阿拉伯可以看成是从尼罗河伸到幼发拉底河以东，共长 800 哩。而从阿勒颇（Aleppo）之北、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之麓到亚丁湾，全长不下 1,800 哩。阿拉伯的一半是沙漠，另一半基本上是干草原。它所处纬度虽然和撒哈拉相同，出产却较丰富，也养活了人口多得多的游牧人贝都印（Bedouin）民族。此外，它的绿洲较大，因此城市也较大。可是使阿拉伯和“心脏地带”以及撒哈拉不同的，最主要的在于有三条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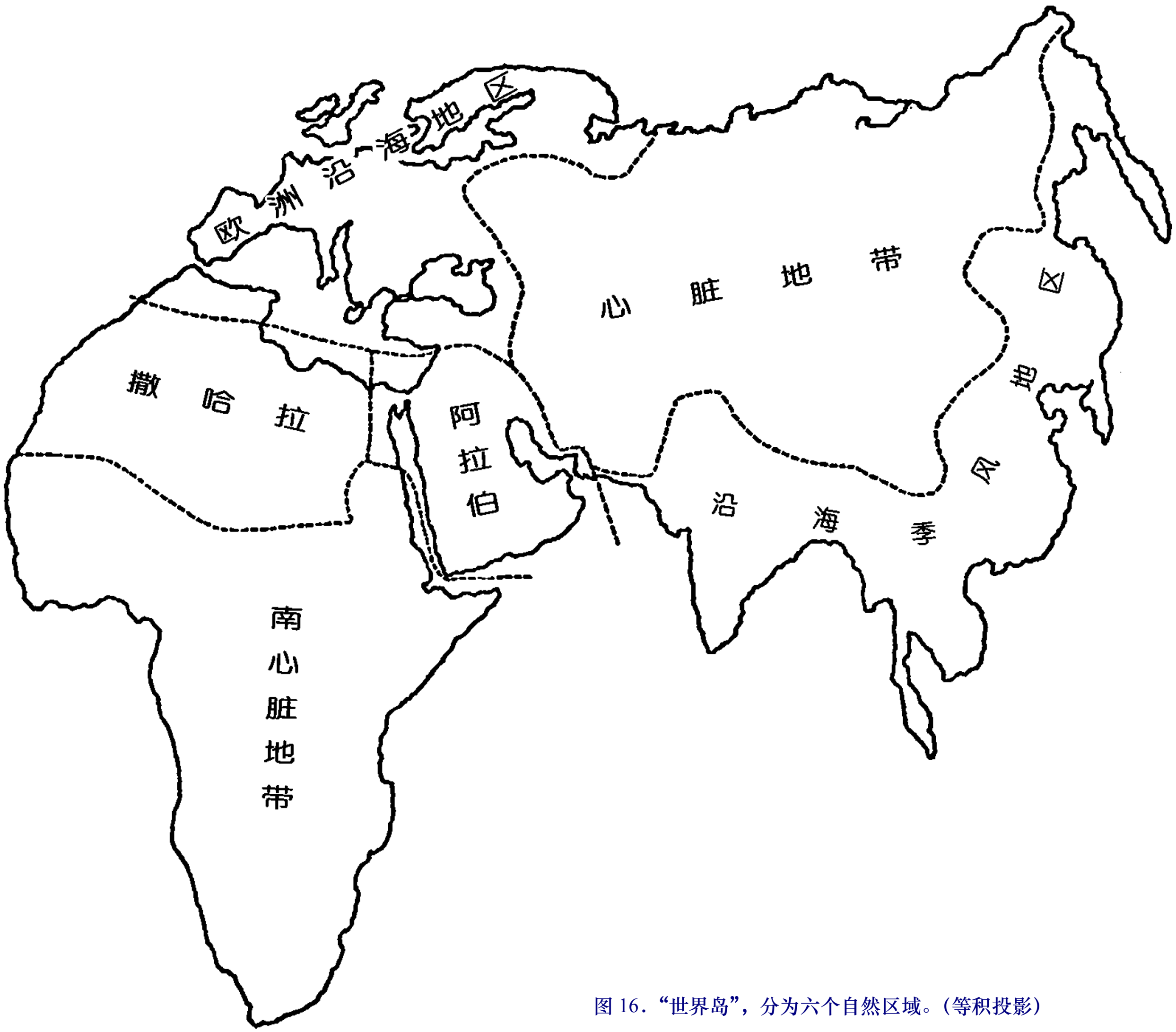


图 16.“世界岛”，分为六个自然区域。(等积投影)

海的大水道贯流其间——尼罗河、红海以及幼发拉底河-波斯湾。可是这三条水道，依其自然情况，都没有贯通这整个干燥地带。尼罗河从地中海启航，只通航到第一瀑布址，走了沙漠的一半路程，虽然现在已在阿斯旺建造水闸，将可以通航到第二瀑布址。幼发拉底河的通航，也只能上溯到离地中海 100 哩处。不错，今天苏伊士运河已使地中海和红海相通了。但是不仅是那地峡以前妨碍着这条路线上的交通，那贸易风流的恒定的北风直吹红海的北端，红海中礁石林立，也使得帆船不肯北航至运河。因此，如果没有汽轮航行，运河便没有多大用处。以前从红海到地中海的通道，是从红海西岸的库塞尔（Kosseir）横渡沙漠，到克纳（Keneh）附近的尼罗河，然后在尼罗河上顺流而下。100 多年以前，当拿破仑侵犯埃及和巴勒斯坦时，从印度派到埃及的英军走的就是这条道。

从以上的述叙可以顺理成章地看到，“心脏地带”、阿拉伯和撒哈拉总起来合成一条宽阔、弯曲的地带，除了那三条阿拉伯水道，都是航海为业的人所无法到达的。这条地带从北冰洋横贯这整个广大的大陆，直抵大西洋岸。在阿拉伯，它滨临了印度洋，结果把大陆上本地带以外的其余部分分成三个隔离的区域，这些区域的河流流入不冻的海洋。这些区域是：亚洲的太平洋斜面和印度洋斜面，欧洲和地中海的半岛和岛屿，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海角。最后提到的那一处和其他两处有极其重要的不同。它那较大的河流尼日尔河（Niger R.）、赞比西河（Zambesi R.）、刚果河，以及较小的河如奥伦治河（Orange R.）和林波波河(Limpopo R.)，从内陆高原横流而来，到了高原边缘上陡然落到沿海较窄的低地上，流了比较短的一段路便入了海。这许多

河的在台地上的长长水道可以通航数千哩，但是从实际效用来讲和西伯利亚的河流一样，它们是和海洋整个脱节的。当然，在瀑布上游的尼罗河，情况亦复如此。因此我们或可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陆看成是第二个心脏地带。让我们称之为“南心脏地带”，以有别于欧亚的“北心脏地带”。

尽管这两个心脏地带所处的纬度迥然不同，其他方面却十分相似。从德国北部和波罗的海岸到满洲，是一大片森林地带，主要是常绿的松和枞，一段较窄的林带把欧洲的森林和太平洋岸的森林连接了起来。这森林地区之南是一片空旷的“心脏地带”，只有在河边、在山上才有树木。这片广大的开阔地，是沿着森林南缘的、水草丰美的大草原、春日繁花似锦。但是向南去土地就渐渐干燥了，牧草又粗又少。这一整片草地，肥美的和贫瘠的，大家图方便而称之为大草原，虽然这名称应当属于围绕土耳其斯坦和蒙古的沙漠这个不甚肥沃的南方地带。大草原大概是马的原始生息地，草原的南部大概是双峰骆驼原始生息地（参阅第18图）。

“南心脏地带”也有广阔的草地，它起自撒哈拉的边缘，在苏丹境内土地渐渐肥沃，一直伸展到几内亚海岸和刚果河畔的热带森林区。这里的森林并非以一片林海直达印度洋，而是豁出一条有草的台地，于是两边各和苏丹的草地、南非的草地相连。从苏丹绵延至佛得角的这片辽阔空旷的土地，是羚羊、斑马和其他大型四蹄兽之家，就像“北心脏地带”是野马和野驴之家一样。虽然驯化斑马并未成功，南非当地人民没有驮畜，但是阿拉伯的马和单峰骆驼很早就引进到苏丹。所以两个心脏地带都有牲口帮助人们行动（虽然这在北带要比在南带更广泛些），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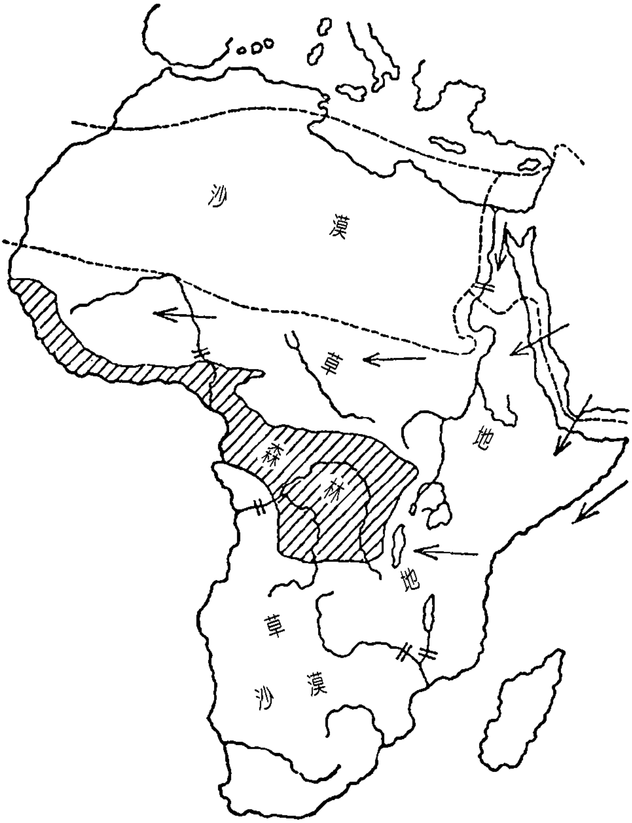


图 17．南心脏地带。＝河流的瀑布，←阿拉伯人入侵路线。

大西洋和太平洋海岸带沿河沿海用船来行动。

我们已经看到，“北心脏地带”和阿拉伯的邻接处，伊朗高原陡落到幼发拉底河谷，长达数百哩；而“南心脏地带”在阿比西尼亚和索马里兰的东北角上，隔海紧扼阿拉伯南方人们称之为也门的一角肥土。所以中间包着沙漠的阿拉伯的草原，可以作为

“南、北心脏地带”的通路。此外沿尼罗河两岸通过努比亚（Nubia）也有一条路相通。由此可见，“北心脏地带”、阿拉伯和“南心脏地带”为骑马的人、骑骆驼的人提供了一条广阔的有草的路，从西伯利亚通过波斯、阿拉伯、埃及而进入苏丹，如果没有萃萃蝇[①]和其他疫症，人们很可能早就骑在马背上和骆驼背上向南深入，差不多直抵好望角。

除开阿拉伯、撒哈拉和两个心脏地带，“世界岛”上只剩下两个较小的区域，但是它们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区域。在地中海周围以及在欧洲的半岛和岛上，住着四亿人民，在亚洲南部和东部沿海地区，或者用历史的名称，在东印度，住着八亿人民。因此，在这两个区域内，住着世界人口的 3/4。从我们目前的观点来看，这件大事最妥当的说明是：“大大陆”亦即“世界岛”的 4/6 的人口，生活在总共只占其面积 1/5 的两个区域内。

这两个区域，在其他某些极重要的方面有相似之处。首先，它们的河流的绝大部分都是可以和海洋通航无阻的。在东印度，我们有这一系列的大河奔流入公海：印度河、恒河、布拉马普特拉河、伊洛瓦底江、萨尔温江、湄南河、湄公河、红河、西江[②]、长江、黄河、白河[③]、辽河、黑龙江。其中大多数可以从河口上溯通航数百哩。曾有一艘英国兵舰上驶长江至汉口，离海达 500 哩。在半岛的欧洲，没有这样大的地方来容纳这样的大河，但是多瑙河、来因河和易北河和海直接通航，交通频繁。来因河上游 300 哩处的曼海姆（Mannheim），战前是欧洲主要港口之一。长 100 码、

① 萃萃蝇（tsetse-fly）是睡病虫的中间寄主，为害性极大。——译者
② 原文为 sikiang，实应为珠江。——译者
③ 原文为 peiho，应为海河。——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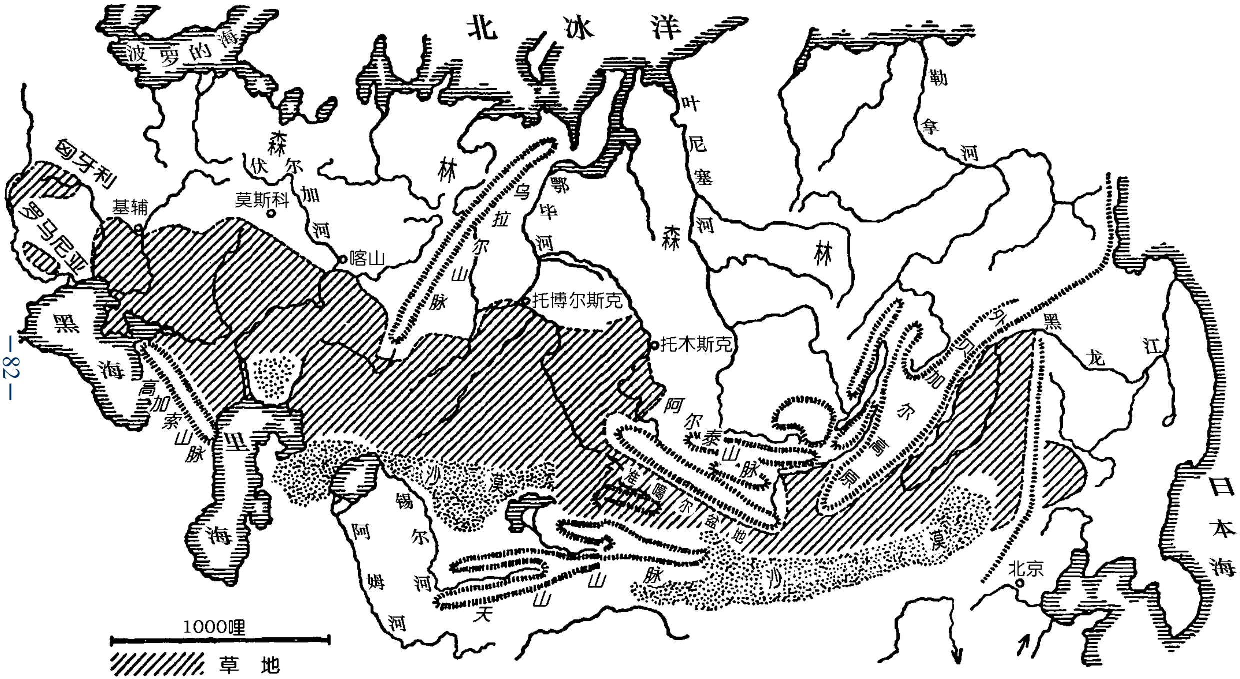

北冰洋
波罗的海
匈牙利
罗马尼亚
基辅
森
伏尔加河
莫斯科
喀山
林
乌拉尔山脉
鄂毕河
托博尔斯克
托木斯克
叶尼塞河
森
林
勒拿河
黑海
高加索山脉
里海
锡尔河
阿姆河
沙漠
天山山脉
准噶尔盆地
阿尔泰山脉
外兴安岭
大兴安岭
黑龙江
沙漠
北京
日本海
1000哩
草地

图 18．大草原。

载重 1,000 吨的驳船停泊在它的码头旁。在欧洲其他各地，欧洲之为半岛限制了河流的发展,但也因此使它在水上的行动更其方便。

这两个“沿海地区”相似之处不仅在河流通航的情况方面。如果我们在“世界岛”雨量图上把比较干燥地区的若干由于山峦丛聚而产生地方性雨的标志抹去，我们可以发现，沿海地带由于山区和平原上有广阔的雨带，它突出地显得肥沃。夏季风带着海洋的湿气，从西南吹到印度，从东南吹到中国。从大西洋来的西风一年四季挟着雨吹到欧洲，冬季时吹到地中海。这两处沿海地区因此都有很多耕地，从而能养活极多的人口。所以欧洲和东印度是耕地人和驾船人的区域；而“北心脏地带”、阿拉伯和“南心脏地带”，绝大部分的土地没有耕种，是航行海上的船舶所到达不了的。另一方面，它们也天然适合于骑马跨骆驼的人赶着牛群羊群到处流动游牧。甚至在热带非洲的热带草原上，那里没有马和骆驼，当地人民的主要财富还是牛羊。当然，这些说法都是大体如此，有许多个别地区是例外。尽管如此，这样的说法还是真实地、充分地概述了极大的地理现实[①]。

* * *

现在我们来请求历史给以帮助，因为切实可行的思想、激动人去行动的思想，都不能在静止状态中领会的。我们必须以我们本身经验或者种族历史提供的思想的动量，来掌握这些思想。东方的绿洲，在诗词中称颂为世界的花园，只是因为绿洲是从沙漠上看过去的！

---

① 也就是曾影响历史、从而促成现在人口分布和文化的现实。由于较肥沃的草地上食品生产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些现实今天已开始出现新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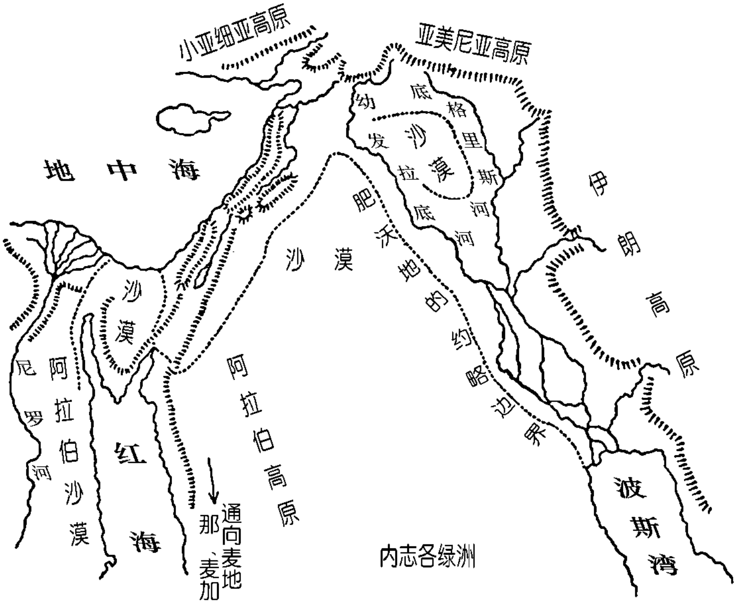


图 19．北阿拉伯。

有记载的历史始于阿拉伯北部的各大绿洲。我们所确实知道的第一次国际政治，是关于崛兴于幼发拉底河下游和尼罗河下游冲积平原上的两国间的交往。维修许多堰堤来排水，又维修许多渠道供灌溉，无可避免地推动了社会秩序和纪律的建立。两种文明中有某种不同，这种不同很可以成为两国交流的基础。在埃及，比较狭窄的河谷的岩崖提供了用作建筑的石料，又有纸草可以制成写字的材料；而在巴比伦那广阔的平原上，建筑是用砖的，楔形文字是印刻在泥板上的。两国之间的大路是从幼发拉底河向西，横穿阿拉伯沙漠的叙利亚一角，经过帕尔米腊（Palmyra）各井而至大马士革。大马士革是建筑在源自前黎巴

嫩山脉（Anti-Lebanon Mt.）和赫尔蒙山（Hermon Mt.）的两条小河阿巴纳河（Abana R.）和法伯河（Pharpar R.）所成的绿洲中的。从大马士革有两条路可通埃及，下边一条路沿海岸，上边一条路沿约旦河谷东面沙漠高原的边缘。在这两条路之间，高耸在犹太（Judea）岭脊上的，便是山城耶路撒冷。

在一张十字军时期僧侣用的而至今仍然挂在赫里福教堂(Hereford Cathedral）中的地图上，耶路撒冷画在世界几何图形的中心，是世界的脐窝，在耶路撒冷圣墓教堂的地面上，今天他们还会指给你看它正好是世界中心之点。假如我们研究地理现实而导致我们取得的结论是正确的，我们现在就洞悉了地理的各种现实，从而可以说，中古时期的教徒们并无大错。如果“世界岛”不可避免地成为人类在地球上的主要生息之地，又如果阿拉伯作为从欧洲到东印度、从“北心脏地带”到“南心脏地带”的交通地带，是处于这“世界岛”的中央，那么从世界现实讲，山城耶路撒冷所处的战略地位，并不十分不同于它在中世纪的眼光中所处的理想地位，或者是它在上古的巴比伦和埃及之间所处的战略地位。从这次战争可以看出，苏伊士运河把东印度和欧洲之间的频繁交通推进到以巴勒斯坦为基地的军队的打击范围内，并且正在建筑一条铁路干线，通过雅法附近的沿海平原，将来要把“南心脏地带”和“北心脏地带”连接起来。再者，谁占有大马士革，谁就有旁门通向另一条路——在两洋之间沿幼发拉底河谷而下之路。这同一个区域，既是历史的发祥地，又是现代最重要的交通大道的交叉点，不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

我们知道，在历史黎明时期，有闪族子孙即犹太人，征服了阿拉伯沙漠边缘上的开垦了的土地。他们沿着沙漠之海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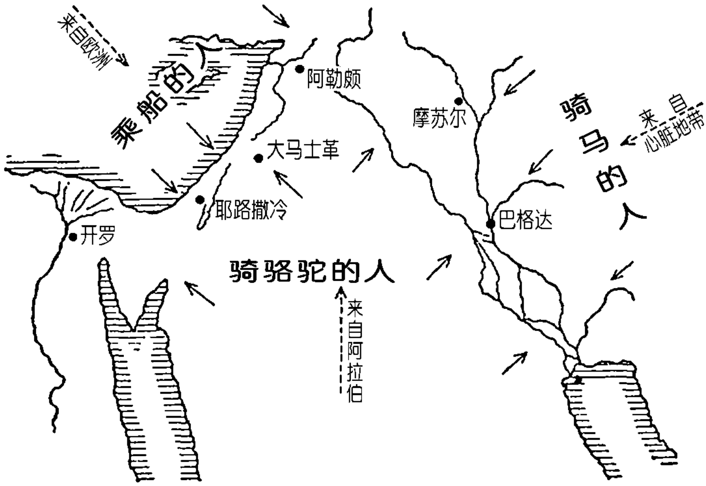


图 20．已耕地上流动性的征服者。

希腊人沿着爱琴海定居，两者之间相同之处不少。以色列的子孙贝尼以色列（Beni-Irael）从约旦那边侵犯“天国”(Promised Land）[①]大概是贝都印人这样的多次入侵中的一次。恰尔提人（Chaldees）——他们那沙漠边缘上的乌尔城（Ur），是阿伯拉罕[②]沿着熟路移居巴勒斯坦的出发点——是犹太人，他们在土地上排挤了非犹太阿加德人（Accadians），成立了巴比伦；而埃及锡伯德（Shepherd）王朝[③]各君主也显然是犹太人的后裔。因此，其结果是，阿拉伯所有的民族——阿拉伯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叙利亚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说的方言同属

① 即 Canaan，指死海和地中海之间的一片地区，耶路撒冷是它的中心。——译者

② 阿伯拉罕（Abraham）是希伯来族传说中的始祖。——译者

③ 又名 Hyksos，公元前 2200 年前后。——译者

于犹太语系。今天，阿拉伯语是从托罗斯山到亚丁湾、从波斯山脉到尼罗河以西撒哈拉的绿洲所通行的语言。

阿拉伯台地从各个方向陡落至各处海岸，只有一处例外。在东北方面它逐渐低落，落到为幼发拉底河和波斯湾所占的洼地。这洼地长达 1,800 哩，从亚美尼亚高原上幼发拉底河发源的峡谷起，直达波斯湾口的霍木兹海峡（strait of Ormuz），全程的岸边都耸立着波斯山脉，就是“心脏地带”伊朗边缘上的高地。古典历史中重大事件之一是，高地上的波斯人在国主塞勒斯（Cyrus）率领下，进攻幼发拉底平原，在征服巴比伦之后，又沿着去叙利亚的大路，经过大马士革征服了埃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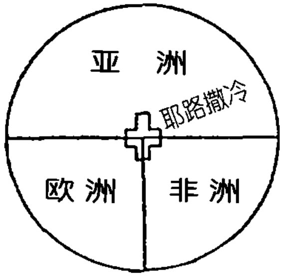


图 21．中世纪的轮形图。

亚美尼亚高原上幼发拉底河发源的峡谷，离开河口的直线距离长达 800 余哩，离开阿勒颇附近的地中海东北角却只有 100 哩多一点。就在这峡谷之西，平均高度约达一哩半的高耸的亚美尼亚高原，陡落到低得多的小亚细亚的半岛高原。古典历史中第二重大事件是，马其顿人在国王亚历山大率领下，横渡达达尼尔海峡，越过小亚细亚的中央开阔地顺托罗斯山的隘口进入西利西亚（Cilicia），通过叙利亚攻入埃及，又从埃及回师，通过叙利亚到幼发拉底河，然后顺河而下到巴比伦。不错，亚历山大就这样率领马其顿人横越大陆攻入埃及，但是他们的进攻实际上是依靠海上力量，这从流行希腊语的两个大港亚历山大和安塔基亚[①]后来迅速兴起可以得到证

① 原文是 Antioch，就是 Antakiya，现属土耳其。——译者

明；这两港也可以既是进入内地的海上人的临海首府。

如果以地理的眼光来考虑这许多事实，就可以看到有一条肥沃的地带沿幼发拉底河向西北而上，又沿叙利亚集雨的山脉折而向南，然后向西至埃及为止。这是一条人烟稠密的地带，因为住的都是定居的耕地人。除了有两处是不毛之地外，古代的大道横穿着这地带的玉米田，从巴比伦直到孟菲斯①。要理解古代历史中较大的事件，关键就在于：这一条农业地带上的人民，这时被这个、那时又被那个邻近的行动快速的种族所征服。骑骆驼的人以整个阿拉伯的深广内地为后盾，从南向东北进犯美索不达米亚，向西北进犯叙利亚，向西进犯埃及。骑马的人以整个“心脏地带”的深广内地为后盾，从东北自伊朗高原下来，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乘船的人从西北来，或者通过小亚细亚半岛，或者直接到地中海东部沿海诸国的海岸，进攻叙利亚和埃及，他们有欧洲整个的水路作他们的后盾。（参阅第 20 图）

罗马人并没有接管马其顿人所征服的亚洲西部。就像由罗马军团防守的来因河和多瑙河，标志着罗马从地中海北进的限度，另由军团防守的、从北流向南（还没有转向东南流）的幼发拉底河上游，标志着他们从地中海东进的限度。从广处看，罗马帝国事实上是个地方性的帝国，它整个属于大西洋沿海地区。从前在马其顿统治下的较远省份，在罗马时代落入了波斯人的继承人帕西亚人（Parthians）手里，这些帕西亚人在他们的时机到来时，从伊朗下来占了美索不达米亚。

骑骆驼的人又遇到了时机。在穆罕默德宣教的鼓舞下，内志(Nejd）中央绿洲的阿拉伯人，以及在赫贾兹（Hedjaz，麦加和

① 孟菲斯是尼罗河畔的埃及故都，现已成废墟。——译者

麦地那都在赫贾兹境内）绿洲西延部分的阿拉伯人，组成撒拉逊人军队[①]出击，把帕西亚人从美索不达米亚赶走，把罗马人从叙利亚和埃及赶走，然后在古代肥沃的交通发达的地带上，建立了一连串的内陆首府——开罗、大马士革和巴格达。从这肥沃的基地出发，撒拉逊人的力量扩充至周围各地，其声势之大，俨然要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帝国。穆罕默德教徒们从巴格达向东北，沿着帕西亚人和波斯人下来的道路北上进入伊朗。他们甚至远及北印度。他们向南从阿拉伯的也门岬渡海，到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海岸，骑马跨骆驼地深入苏丹全境。因此，这个陆上强国的帝国像一头巨鹰，从阿拉伯中央地区伸展两翼，一翼覆盖“北心脏地带”，远达亚洲内陆，另一翼覆盖“南心脏地带”，对等地远达非洲内陆。

但是撒拉逊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同他们的草原和沙漠的行动工具相适应的版图；和他们的前人腓尼基人和舍巴人（Shebans）一样，他们向海上发展。他们海陆并进，沿非洲的北海岸西进，直到巴伯利（Barbary）和西班牙两国。这两国的广阔高原，既不像撒哈拉那样荒瘠不毛，也不像欧洲半岛绝大部分那样遍布森林，而在某种程度上和他们本土的情况相似。在另一方面，他们从红海口上的也门，从波斯湾口上的阿曼，乘着夏季风东驶至印度的马拉巴海岸，甚至远达马来群岛，然后乘着冬季风返航。阿拉伯的独桅船就此勾划出一个海上帝国，从直布罗陀海峡伸展至马六甲海峡，从大西洋的大门伸展到太平洋的大门。

向北向南由骑骆驼的人统治，向西向东由乘船的人统治，二

① 即伊斯兰教阿拉伯人军队。——译者

者相互交叉，但是撒拉逊人的这番宏图由于一致命伤而失败。这就是他们的阿拉伯基地缺乏实现这番宏图的必不可少的人力。但是尊重这些现实的人——任何想当世界强国的政府的战略思想一定要顾及这些现实——没有一个能够忽视历史提供的这种警告。

*　　　　　*　　　　　*

撒拉逊帝国并不是由欧洲、也不是由东印度来推翻的，而是由北方的“心脏地带”来推翻的——这是件富有意义的事。阿拉伯在任何一个方向，除了对“心脏地带”的方向，都是被海围住或者是被沙漠围住的。阿拉伯人在西方的海上力量无疑受到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抵抗，在东方的海上力量在葡萄牙人绕航好望角后被葡萄牙人打败了，但是在阿拉伯本土撒拉逊人的灭亡，是由于土耳其的陆军力量。我们必须进一步考虑广大的“北心脏地带”的特点，首先要考虑那长长的有草的区域的特点。这区域在森林区以南，横贯整个“北心脏地带”，西段和东段，同两个沿海地区接壤的部分，都有若干部分互相重叠。

大草原起自欧洲中部；在欧洲中部，匈牙利平原被一圈长着森林的山脉——东阿尔卑斯山、喀尔巴阡山——整个地包围了（参阅第 18 图）。今天，原来的草地大部分已成为小麦地和玉米地，但在 100 年前，在铁路使市场处于人们能到达的范围内之前，多瑙河以东海一般的匈牙利平地是一片草原，匈牙利人的财富几乎全是牛马。在长着森林的喀尔巴阡山的屏障以东，大草原的主要地带开始了，它向东伸展，黑海的海岸在其南，俄罗斯森林的边缘在其北。森林的边缘弯弯曲曲地斜横过俄罗斯平原，从纬度 50 度的喀尔巴阡山北端开始，到纬度 56 度的乌拉尔山麓。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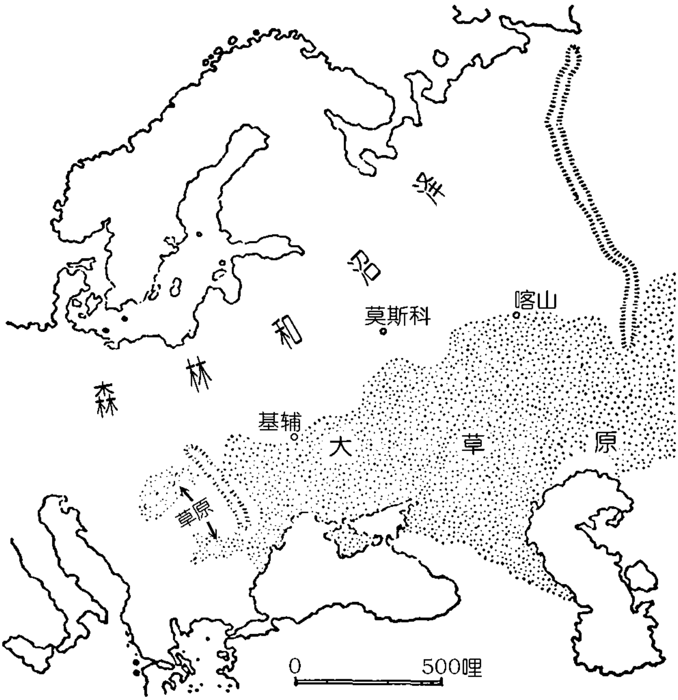


图 22．东欧的森林和大草原。(根据 1904 年《地理杂志》中我的一篇论文《历史的地理枢要》附图改绘。)

斯科就位在森林内离边缘不远之处，那里有许多开阔的空地。在最近开垦南边的大草原以前，所有的俄罗斯人都居住在那里。远至伏尔加河和顿河，以前的草原现在也大体上已变成小麦地。但是在 100 年前，俄罗斯的哥萨克前哨站仍然以第聂伯河和顿河为根据地。划破风吹草动、或是白雪皑皑的广大平原的单调景色的，只是沿这两条河岸的树木而已。

覆盖乌拉尔山尾间的森林，成为向南楔入开阔大草原的一

角，它和里海北端夹持成平原的出入口，出入口上草仍然连绵不绝，经过这个出入口，草原从欧洲一直伸到亚洲。过了这门户，大草原伸展得更广了，比在欧洲还要广。大草原之北仍然是森林，南面现在却是土耳其斯坦的沙漠和半干旱的草原了。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道起自车里雅宾斯克，穿过草地，到达伊尔库次克。车里雅宾斯克是乌拉尔山东麓的一个站，从彼得格勒和莫斯科来的铁道到此会合。伊尔库次克在安加拉河上，离贝加尔湖水出口处不远。铁路沿线的草地，大体上正在变成小麦地。但是一路上定居的人仍然稀少，只是窄窄一条线；骑马的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还是广阔地面上的游牧人。

森林的边缘沿着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之间的界线折而向南，因为东西伯利亚遍布着林山林丘。山丘的高度从外贝加尔高原起渐减，成为向着白令海峡的亚洲东北海角。草原也就随着森林折而向南，横过蒙古高原的较低平原向东伸展。从“大低地”上升到蒙古的斜坡通过准噶尔“旱峡”。准噶尔处于两大山脉之间，南面是天山山脉，北面是阿尔泰山山脉。出了准噶尔，高平原上的大草原便继续沿有森林的阿尔泰山山脉和外贝加尔山脉的南缘伸延——戈壁荒漠就在它的南面——一直伸到黑龙江上游的支流处。兴安岭外侧有一条林带向东迤行，蒙古高原随着这条林带下落到满洲低地。但是在满洲最后还有一片和别处不连的草地，同远在5,000哩外、大草原地带西端匈牙利的和别处不连的草地相似。满洲的草地却不是延绵不断直抵太平洋岸；因为沿海有一列山脉，森林十分茂密，把开阔地框住了，又使向东流的黑龙江转向，使其河口向北。

让我们在想像中把这长条的大草原上的现代铁路和玉米地

都抹掉，还使骑马的鞑靼人、亦即土耳其人生息其间。据说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语言，今天勒拿河口北冰洋地区的民族还听得懂。由于某种时常出现的原由——可能由于一连串的荒年——这些流动的鞑靼游牧民族在历史上时常集中他们全部力量，以雷霆万钧之力猛击在中国或者欧洲的定居的、从事农业的人民。在西方，我们第一次听说时他们是叫做匈奴人。他们在耶稣降生后第五世纪中叶，在一位伟大而又恐怖的首领阿铁拉（Attila）率领下，驰入匈牙利。他们又从匈牙利分三路进袭——西北、西、西南。他们向西北进袭，在日耳曼人中引起了极大的惊恐，使得最靠近海的种族，即盎格鲁人和萨克逊人，有一部分被逐越海而到不列颠岛上另觅新居。他们向西深入至高鲁，但在夏龙（Chalons）一场大战中被击败了。那里的法兰克人、哥特人和罗马省人，肩并肩站在一起抵抗从东方来的共同敌人，从而他们开始融合，产生了现代的法兰西人。阿铁拉向西南远征直至米兰，一路把阿魁利亚（Aquileia）和帕杜亚（Padua）两处罗马重要城市毁了，两城的人民逃到靠海的珊瑚礁上，在那里建立了威尼斯。在米兰，阿铁拉遇到了罗马的大主教李奥（Leo），不知由于什么理由，从此他不再向前进军了，罗马教皇因此威望大增。所以可以有根有据地说，在沿海人民对这从“心脏地带”来的猛击的反应中，产生了英格兰和法兰西民族、威尼斯海上强国和成为中世纪最高统治的教皇政治。谁敢说，由于我们现代的匈奴人的猛击而被迫引起的反应中，不会产生伟大的和（但愿是）有利的事情?

匈奴人的袭击几年后停止了，大概作为他们后盾的人力不怎样多；这一打击的力量之大，原由可能既是打得猛，又是打得

快。但是可能有一些零星的匈奴人，流落在匈牙利平原的荒无人烟的草地上，后来被西进中的另一骑马的民族吸收了。这民族是阿瓦尔人（Avars），查理曼大帝曾和他们打过仗，也就是现在的马扎儿人（Magyars）。公元 1000 年，前一世纪曾在日耳曼大肆蹂躏的马扎儿族的土耳其人，皈依了罗马传来的基督教，从此成为拉丁基督教国家的某种堡垒，使以后再没有鞑靼人侵入匈牙利。但是马扎儿人的经济生活，大体上仍然是草原上的经济生活，直到不到 100 年前才改变。

黑暗时代的几个世纪中，异教徒的古代挪威人乘船在北方海面上行劫，邪教徒的撒拉逊人和摩尔人乘船在地中海上抢掠，骑马的土耳其人又这样从亚洲远袭至这信奉基督教的半岛的中心地带，这半岛当时还正受敌对的海上力量的箝制——当回想这许多事情时，我们便能约略领会，现代欧洲是捶出来的，像是放在一个臼里，用杵捶出来的。杵，就是从“心脏地带”来的陆上力量。

*　　　　　　*　　　　　　*

如果我们在地图上研究这些历史事件，显露出来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事实是：“大低地”的接连不断的平原，从“心脏地带”的大陆和北冰洋流域起，一直铺展到欧洲半岛以东。没有障碍来阻挡骑马的人长驱西进，进到诸如第聂伯河、多瑙河等完全是欧洲河流的流域。和从“心脏地带”进入欧洲这条无遮拦的通道大不相同的是，沿“心脏地带”的东面和东南面的边界，一系列雄伟的屏障把这地带和东印度隔开了。中国本部和印度人口稠密的地区，是在这地球上最巍峨广阔的高原的东坡和南坡上。喜马拉雅山的南坡在印度之北蜿蜒 1,500 哩，从最多不过拔海

1,000 呎的平地上升到 28,000 呎和 29,000 呎的高峰。但是喜马拉雅山只是西藏高原的边缘，这高原和法国、德国以及奥匈帝国的面积总和一般大，平均拔海 15,000 呎，亦即阿尔卑斯山勃朗峰（Mont Blanc）的高度。和这样的事实相比，低高原和低地之间的分别，伊朗高原和此如“大低地”之间的分别，完全不足道了。西藏及其附属的喜马拉雅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兴都库什山、天山——总称之为西藏高原——在高度和面积上，或可用一个字来概括：大，其大是举世无匹的。将来撒哈拉会每天有人以近代交通工具东横西渡，而这世界的屋脊西藏，仍然使人绕道两侧而行，把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远远隔离，这两国的西北边界，也因此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西藏北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内陆流域，因此也包括在“心脏地带”内，其北是一片蒙古高原，大部分也属于“心脏地带”。蒙古高原此西藏低得多，实质上在高度上和伊朗高原近似。有两条天然道路从蒙古的旱地下来，通到中国的肥沃低地：一条经过西藏东北角附近的甘肃省，抵达人口百万的大城西安[①]；另一条从贝加尔湖东南行，直到人口也约百万的北京。刚处于中国低地范围内的西安和北京，是从“心脏地带”来的征服者所建立的都城。

横越伊朗高原进入印度也有两条天然通道。其一是翻越兴都库什山高耸而窄狭的山脊，沿喀布尔谷（Cabul Valley）下来，穿过尽头的开伯尔山口（Kaibar Pass)，在阿托克（Attock）渡印度河。其二是经过赫拉特和坎大哈（Kandahar)，绕过阿富汗

① 原文为“Sinan”（“西南”或“新安”），显然是作者之误。——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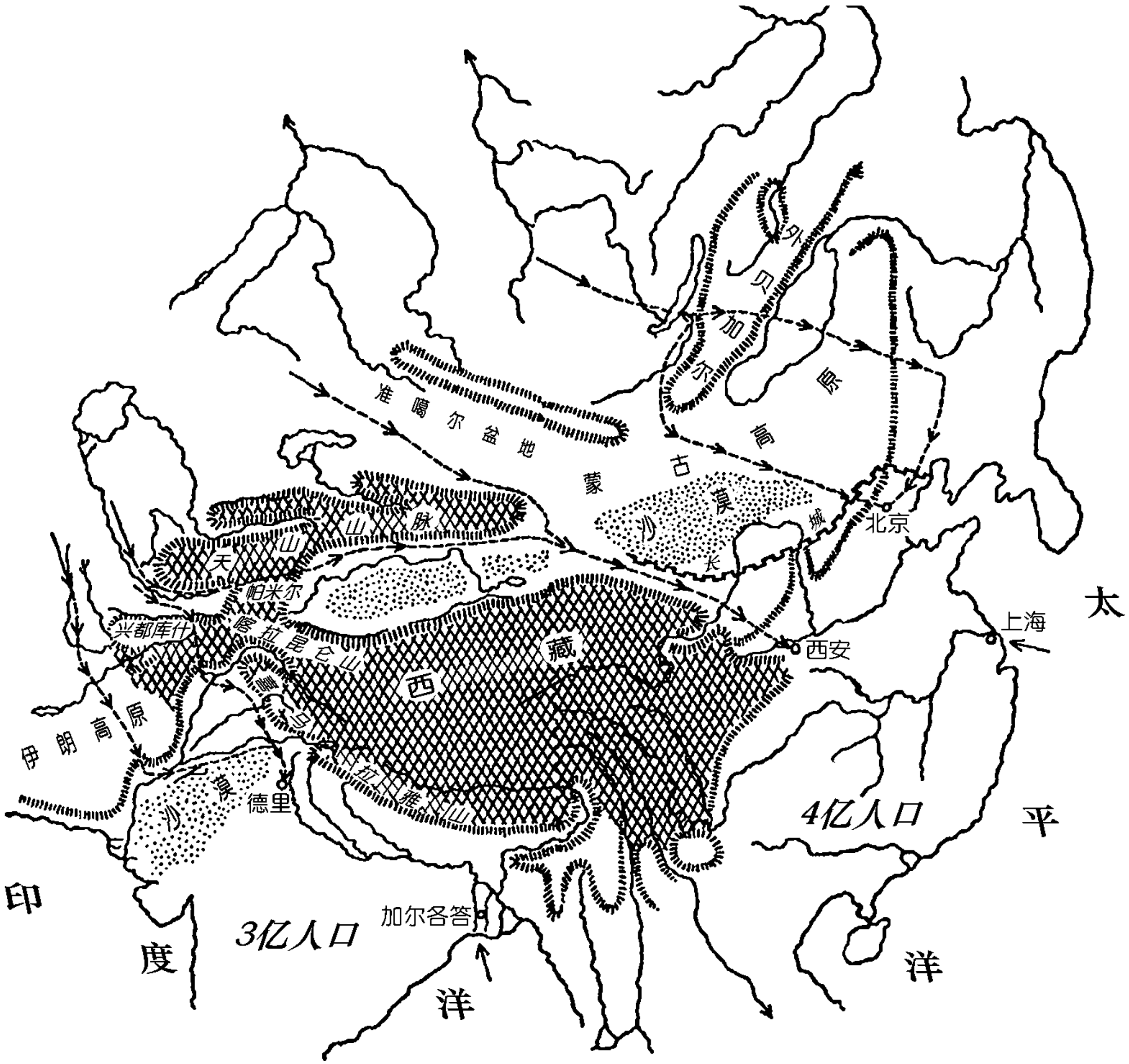


图 23．西藏高原以及自“心脏地带”进入中国和印度的通道。

山尾，沿博朗峡（Bolan Gorge）而下至印度河。紧靠印度河东面的是印度沙漠，沙漠从海边一直伸展到离喜马拉雅山不远的地方。所以博朗的路线和开伯尔路线在旁遮普的前厅会合成一条路线，再登堂入室，深入印度。在沙漠和山脉之间留出来的正是这条路。路的尽头屹立着德里，德里位于朱木拿河（Jumna）和恒河通航的起点。同中国的西安和北京一样，德里也是从“心脏地带”来的征服者所建造的都城。通过这些狭窄难行的通道，中国和印度曾一再遭受“心脏地带”的人侵犯。但是由此而建立的帝国，往往不久便摆脱了草原人的统治。举个例，印度的莫卧儿王朝便是如此。莫卧儿是从内地的蒙古人那里来的。

* * *

这次讨论得到的结论是：“心脏地带”，尤其是更开阔的伊朗、土耳其斯坦和西伯利亚等西部地区，和欧洲以及阿拉伯的关系，比和中国以及印度的关系更密切；甚至比和非洲的“南心脏地带”也较密切。像撒哈拉沙漠和西藏高原这样坚强的天然边疆，在“北心脏地带”、阿拉伯、欧洲的接合处是没有的。这三个区域紧密相连的关系，很可以用这地理公式——目前正想要用这公式，来澄清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某些重要史实——来表明：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种地人总是挡不住而遭受来自“心脏地带”的骑马人、来自阿拉伯的骑骆驼的和来自欧洲的乘船的人的侵袭。虽然如此——而正是由于其多变的性格——以“心脏地带”为一方，以阿拉伯和欧洲为另一方，两者之间那条界线仍然值得仔细研究。

绵延的波斯山脉绕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北端折而向西，成为

托罗斯山脉，就是小亚细亚半岛高原南部高耸的边缘。小亚细亚的地面是一片片的草原，中央是沙漠，草原围在沙漠四周，那里有盐湖，托罗斯山上淌下来若干小溪流入湖中；但是较大的河流都向北流入黑海。爱琴海断裂的那边，还有也注流入黑海的那广阔的多瑙河流域。多瑙河支流上游的小溪，发源于几乎看得见亚得里亚海的地方，不过高高在伊律利亚高原（Illyrian Uplands）上。这高原外侧的陡峭的边缘，成为美丽的达尔马戚亚（Dalmatia）海岸上的屏障。我们称这屏障为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Dinaric Alps）。

托罗斯山脉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就这样陡立在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面前，使浩荡的大河流注黑海。要不是有爱琴海



图 24．“心脏地带”，黑海流域和波罗的海流域，中国和印度的最高（高原）河谷。

切断了向黑海沿伸的高原，要不是有了达达尼尔海峡，峡中的海流挟着所有流入黑海的河流的水奔腾向南，托罗斯山脉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造成的高高的向外突出的前沿，就会是单一的弯弯的山脉，就会是连绵不断的陆上屏障的边缘，把里面的黑海和外面的地中海、亚得里亚海隔离。要不是有了达达尼尔海峡，这边缘会成为“心脏地带”的边界，黑海及其所有的河流都会加入“大陆”的流域系统。一当达达尼尔被陆上强国封锁，不准地中海的海上国家使用，像在这次大战中发生的那样，那么就人的行动而论，上述这种隔离情况实质上是实现了的。

罗马的皇帝把他们的东都放在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原著编者)，即多瑙河疆域和幼发拉底河疆域之间。但是对他们说来，君士坦丁堡不仅是从欧洲进入亚洲的桥头堡。罗马是地中海强国，并没有并吞黑海的北岸，因此黑海本身便成了帝国边疆的一部分。草原留给了息西安人（Scythians，当时土耳其人的名称)，至多只有几个海上人建立的贸易站点缀在克里米亚沿海。因此君士坦丁堡是个据点，地中海的海上强国用它来把守中部的海上边疆，就像陆上强国的军团把守沿河的西方和东方的边疆那样。如果从广义讲和从战略上讲，“心脏地带”这名称是包括小亚细亚和巴尔干半岛在内的话，那么，在罗马的统治下，海上强国就是曾经如上所述那样深入“心脏地带”。

其后历史的基本地理事实也不稍模糊，但是方向相反。中亚细亚的某些土耳其人不南下阿拉伯，而驰经梅迪亚（Media）和亚美尼亚高原进入小亚细亚的开阔草原，在那里定居下来，就像只在一两个世纪以前，马扎儿族的土耳其人骑马绕过黑海北端，进入匈牙利草原一样。在奥图曼王朝的伟大的骑兵领袖们



图 25．“心脏地带”的疆界：1）当地中海的海上强国进入黑海时的疆界（＋＋＋＋＋）；2）当陆上强国从草原进入托罗斯山脉和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时的疆界（虚线）。

的率领下，这些土耳其人横渡达达尼尔，然后顺着马里乍河的河谷和莫腊伐河的河谷所形成的“走廊”，通过巴尔干山脉征服了马扎儿族的匈牙利本部。自从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那一刻起，黑海就不让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上人通行了。在罗马统治下，海上人的领域曾进至黑海的北岸。在奥图曼土耳其人统治下，作为骑马人的领域的“心脏地带”，进至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和托罗斯山脉。由于土耳其的统治超越“心脏地带”，把阿拉伯也包括进去，曾使人认识不清这一重要事实。但在今天，英国为了阿拉伯人而征服了阿拉伯，这一事实又清楚了。在“心脏地带”之内，我们的敌人德国近来曾在战略上打算把黑海当作东进的途径。

我们原来是依照江河的流域划定“心脏地带”的。但是在这样重温历史之后，从战略思想上考虑，是否应当把它的范围多少扩大一些？从人类能动性的观点看，又从能动性的不同方式看，既然陆上强国今天能封锁黑海，那么这海的整个流域显然一定要看作属于“心脏地带”。只有极少航运价值的巴伐利亚·多瑙河区（Bavarian Danube），可以看作在“心脏地带”之外。

还要追加一个情况，然后从地理和历史的事实中显露出来的“心脏地带”的整个概念，才会陈现在我们面前。波罗的海现在是一个可由陆上强国“封锁”的海。基尔的德国舰队布水雷、派潜艇，使协约国的舰队不能驶入波罗的海。这一事实当然并不在任何方面有损于封锁是由陆上强国执行的这一说法。在法国的协约国军队，是由于海上力量才能立足的；而德国对波罗的海的海上防御，是由于陆上力量才保住的。我们应该承认，在今天的情况下，正如负责的大臣们在下院中所承认的那样，岛国的舰队

已经不再能驶入波罗的海，就像不能驶入黑海一样；在保证我们将来不打仗的任何和平条件中，这个情况居于极端重要的地位。

为了从战略思想上考虑，“心脏地带”应包括波罗的海、多瑙河可以航行的中游和下游、黑海、小亚细亚、亚美尼亚、波斯、西藏和蒙古。因此，“心脏地带”内有俄罗斯、布兰登堡-普鲁士(Brandenburg-Prussia）和奥匈帝国三处合一的广大的人力基地，这是历史上骑马的人所没有过的。在现代条件下，“心脏地带”仍是海上力量进不去的区域，虽然它的西部位于北冰洋和内陆流域之外。一个突出的自然现象生动地把这地带连在一起：整个“心脏地带”，甚至直到俯视酷热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波斯山脉边缘，冬季都覆盖在白雪之下。表明一月月平均温度在冰点以下的一条线，从挪威的北角（North Cape）向南，沿着挪威海岸沿海岛屿的“警卫”圈内，经过丹麦，横越德国中部而抵阿尔卑斯山，又从阿尔卑斯山沿巴尔干山脉向东。敖德萨湾和亚速海每年都上冻，波罗的海的大部分也上冻。隆冬时节从月球上下望，就会看到白茫茫一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心脏地带”的含义。

当俄罗斯的哥萨克人在中世纪末初次在大草原上执行绥靖任务时，一场大革命被引起来了；鞑靼人和阿拉伯人一样，缺乏必需的人力来建立一个持久的帝国，而哥萨克人有俄罗斯种田人作后盾，以致今天在黑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一片沃野上，俄罗斯种田人已繁衍到上亿人。19 世纪时，俄罗斯沙皇帝国的势力在广大的“心脏地带”中蒸蒸日上，像是要威胁欧亚边缘上所有的地区。可是到了 19 世纪末，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决心要制服斯拉夫人，利用他们来占领“心脏地带”，通过“心脏地带”的陆路，进入中国、印度、阿拉伯和非洲的“心脏地带”。德国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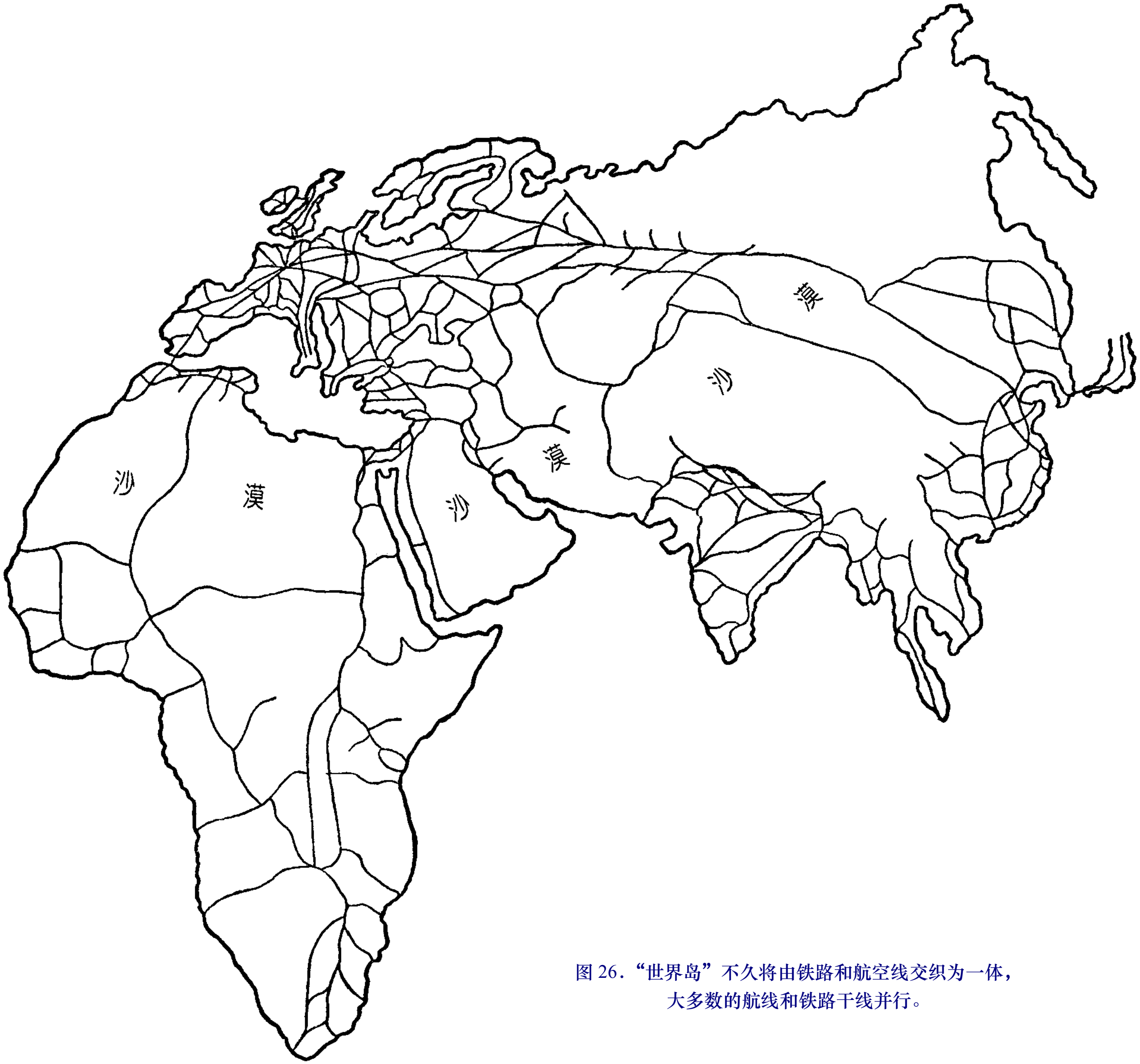


图 26. “世界岛”不久将由铁路和航空线交织为一体，
大多数的航线和铁路干线并行。

胶州和东非洲所建立的军事殖民地，是用来当作这计划中的陆路的终点的。

今天，陆军所掌握的不但有横贯大陆的铁路，而也有汽车。他们还有飞机。飞机具有一种往返飞行的性能，是陆上强国可以用来对付海上强国的一种武器。此外，现代的大炮对付船只是很厉害的武器。简单说来，据有“心脏地带”和阿拉伯的强大军事国家，能够很容易拿下在苏伊士的世界十字路口。如果有一队潜艇在战争刚开始时便以黑海为基地，海上强国就很不容易把守苏伊士运河。这一次我们是消灭了这种危险。但是地理上的事实依然俱在，为陆上强国反对海上强国提供越来越多的战略机会。

很清楚，在“世界岛”内的“心脏地带”，尽管它的边界没有很清楚划定，却和“世界岛”本身之在大洋中一样，是具体存在的事实。可是直到约 100 年之前，才有一个人力充足的基地，足以从“世界岛”这一堡垒内部，开始威胁世界的自由。在目前情况下，单凭一纸具文，即使它是国际联盟的成文宪法，都不足以保证这“心脏地带”将来不再成为世界战争的中心。现在正是乘各国还未定型之际来考虑问题的时候：根据地理和经济的现实，能为人类未来的安全作出什么保证？记住这一点，再来看风暴如何结集于“心脏地带”而酿成目前的局面，便不致错过我们的时机。

第五章　各帝国互争雄长

从西欧来的航海人在大洋上鼓浪前进，同时代的俄罗斯哥萨克人横越“心脏地带”的草原前进，二者可以作极有趣味的比较。哥萨克人叶尔马克纵马越乌拉尔山脉入西伯利亚是在 1533 年，也就是在麦哲伦周航世界后十来年内。在我们目前这时代，也可能有这样的比较。1900 年，英国能在远渡重洋 6,000 哩的地方维持 25 万人和布尔人打仗，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但在 1904 年，俄国在乘火车要走 4,000 哩之遥的满洲，放一支 25 万多人的军队和日本人打仗，同样也是了不得的武功。我们思考时有这习惯，往往认为海上行动远远胜过陆上行动，过去有一段时期确是这样。但是应当记住，50 年前世界航运 90%是靠帆船，而那时第一条横贯北美的铁路已经通车了。

我们一般认识不到哥萨克人在草原上执行绥靖任务的重要性，其原因之一是：我们模模糊糊地认为，俄国从德国和奥地利的边疆起向东伸展数千哩，定居的人口密度渐远渐稀，遍布各地，这些地方在地图上是用一种颜色标明的，是属于一个国家的，最远到白令海峡。事实上，俄国——在这次战争的头三年中为俄国军队提供 80%以上的新兵的真正俄国——比地图上简单的标志所表明的要小得很多。俄罗斯人民本乡本土的俄国全部在欧洲，所占的地区只有我们一般称为俄属欧洲的一半。这个意义上的俄国陆上疆界，在许多地方和法国或者西班牙的海岸一样明确。顺着地图上一根线，从彼得格勒（列宁格勒——原

著编者）向东，沿伏尔加河上游到这条河大转弯的叫喀山的地方，然后沿伏尔加河中游向南，到这条河第二个大转弯的叫察里津的地方，最后沿顿河下游向西南到罗斯托夫和亚速海。在这条线内，即在线之南和线之西，有一亿多俄罗斯人民。他们是俄国的主要民族，居住在伏尔加河和喀尔巴阡山脉之间以及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平原上，人口密度平均约达每平方哩 150 人。这一片延绵不断的人口一伸展到上面指出的这条线，便几乎沿着线突然打住了。

彼得格勒和喀山以北是北俄罗斯，一片广阔的、黑黝黝的森林地带，偶尔有些沼泽地，比刚才划出来的俄罗斯人本土大一倍半有余。北俄罗斯人口不到 200 万，每平方哩不到三人。伏尔加河和顿河以东，直到乌拉尔山脉和里海，是东俄罗斯，它和北俄罗斯差不多大小，人口也将近 200 万。但在北俄罗斯和东俄罗斯之间的卡马河谷，有一条人们定居的地带，从喀山和萨马拉[①]向东到乌拉尔山脉，又越过这条山脉，经过叶卡德林堡[②]矿区进入西伯利亚，又横越西西伯利亚到伊尔库次克，在将到贝加尔湖处终止了。伏尔加河之东这一条地带上的人口约 2,000 万。从喀山和萨马拉到伊尔库次克整个这一段，就居住的是种田人而不是游牧的骑马人来看，应是新近的定居地带。从喀山南流到察里津的伏尔加河中游，不仅是俄国、也是欧洲的出色的护城河。它那被称为丘陵河岸的西岸，同对岸的牧场河岸隔水相望，西岸陡立的丘陵高约 100 呎，耸立河边长达 700 哩。这是人烟稠密的平原的边缘，这里稍高于海平面。站在这边缘之颠，放眼东望脚

① 现名古比雪夫。——译者
② 现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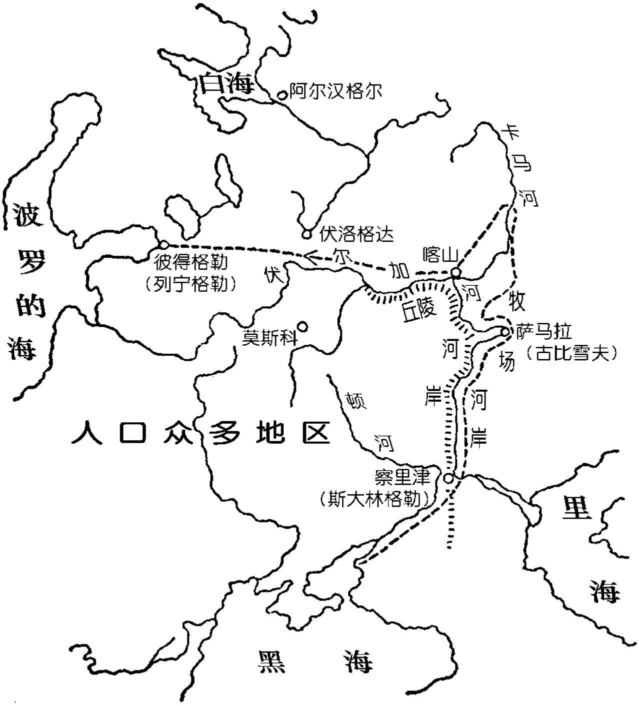


图 27．俄罗斯人口较密地区的界限（虚线）。

下大河的对岸，你就会感到，在你的背后是人烟稠密的欧洲，而在你的面前，低低的牧场远远伸去，渐渐化为水草稀少、较干燥的草原绵延向东，成为中亚细亚真空地带的起点。

最近几个月俄国内战的情况，对这些天然的和社会的大差别，作了突出的实际的说明。在整个北俄罗斯，比村庄大的镇市不过两三处。由于布尔什维克是依靠城市居民的，布尔什维主义在伏尔加河以北影响就很小。还有，乡村里定居的人少，主要是依

林为生的人，定居后生活情况简单，没有对土地发生政治感觉的根基，因此，那里没有农民对布尔什维克的同情心。其结果，沿北德维纳河从阿尔汉格尔（Archangel）[①]到沃洛格达的铁路，在长时间内仍然和海洋及西欧通车。西伯利亚大铁道从彼得格勒来，经过沃洛格达；还有一条直线从莫斯科到沃洛格达，这条线于雅罗斯拉夫（Jaroslav）经过伏尔加河上的桥。路线越过这座桥，或可认为是离开了俄罗斯本部而进入北俄罗斯。正由于这些理由，协约国的大使们退出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后，就在沃洛格达住下，因为除了有交通上的便利——既可以去阿尔汉格尔，又可以去海参崴——他们已身在布尔什维克的俄罗斯境外了。

具有更重要意义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在西伯利亚大铁道莫斯科支线上的行动。在乌拉尔哥萨克人的支援下，他们从乌拉尔山脉进军，拿下了铁路通至牧场河岸处的萨马拉，又占了在司兹兰（Syzran）的伏尔加河上大桥。他们甚至沿着到奔萨（Penza）的线浅浅地插入真正的俄罗斯，但是经过的地带人烟稀少。他们还溯河而上，攻至喀山。他们实质上是徘徊于真正俄罗斯的边缘上，从外面威胁真正俄罗斯。英国远征军从阿尔汉格尔乘船上溯德维纳河至科特拉斯（Kotlas），又从那里沿铁路到西伯利亚大铁道上的维亚特卡（Vyatka）[②]，用诸现实的眼光来看，这些并非太蛮干的行动。

真正俄罗斯这个定义，不仅对俄国，而且对19世纪的欧洲，也都有新的意义。我们借助地图来研究一下这个欧洲。斯堪的纳维亚、芬兰和俄罗斯北部的区域，以及南至高加索的东俄罗斯，

---

① 现名阿尔汉格尔斯克。——译者

② 现名基洛夫。——译者

都作为不足道的真空地带而不能算在欧洲内，跟它们一起不算在内的还有土耳其在巴尔干半岛上的领土。要记住金莱克[①]在1844年写的《艾奥森》（Eöthen）中所说，当他渡过萨瓦河（Saye R.）到贝尔格莱德时，他进入了东方。由1739年贝尔格莱德条约规定的奥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之间的疆界，直到1878年还没有变动。因此真正的欧洲，欧洲人民的欧洲，有海外殖民地的基督教国家的欧洲，在社会的概念中是十分明确的。它的陆上疆界从彼得格勒直到喀山，然后沿着一条弧形线从喀山顺伏尔加河和顿河到黑海，又顺着土耳其边疆到亚得里亚海北头。这欧洲的一个尽头是伸到海中的圣维森提角；另一头是在喀山的伏尔加河套所造成的地角。柏林差不多正好在圣维森提角到喀山的中途。如果普鲁士打赢了这次战争，它的意图就是要把从圣维森提到喀山的大陆欧洲，加上亚洲"心脏地带"，变成海军基地，在下一次战争中用来和英美作战。

现在我们从亚得里亚海到北海划条线，把我们的欧洲分成东西两部。要把威尼斯和荷兰划在西边，从欧洲历史启蒙时代起就是日耳曼人的一部分的德国也划在西边；柏林和维也纳划在东边，因为普鲁士和奥地利是日耳曼人所征服的国家，多少是被强迫条顿化的。在这样划分的地图上，让我们来"通盘回顾"近四代的历史，历史就将呈现新的条理。

*　　　　　*　　　　　*

英国革命限制了君主的权力，法国的革命伸张了人民的权利。由于法国国内混乱，并遭外来侵略，组织者拿破仑被拥立

① 金莱克（Kinglake），1809—1891，英国历史学者、旅行家。——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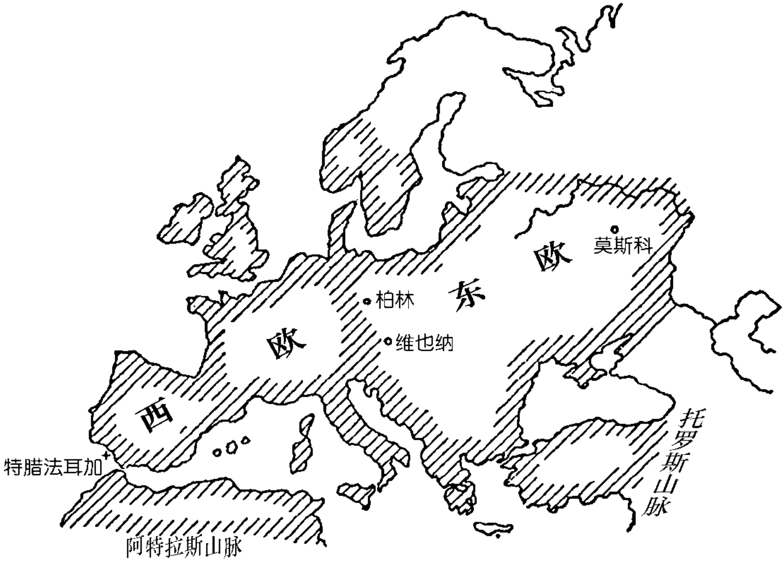


图 28．真正的欧洲（东欧和西欧），再加上巴伯利、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

了，拿破仑征服了比利时和瑞士，在自己周围的西班牙、意大利和荷兰安置了俯首贴耳的国王，安置了低声下气的来因联邦，也即和老日耳曼结成了联盟。拿破仑就这样把整个西欧联合起来了，只有岛国不列颠除外。然后他进军攻击东欧，打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却没有并吞，虽然他在后来出兵征俄时强迫它们当他的盟国。我们常常听到，莫斯科的后方土地广阔，足供俄国后撤。但是事实上，拿破仑在莫斯科战役中，几乎就横扫了他那时候的俄国有人烟的地区。[①]拿破仑被撵下来，部分的原因是法国人力

① 也就是横扫了能为作战的军队提供给养的地区。

枯竭，但主要是由于他在西欧的领域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所包围。因为英国能从欧洲之外把给养运回本国，并切断西欧，使它得不到同样的给养。它理所当然地和东欧的强国联盟，但和东欧强国的有效交通只能通过一条路：通过波罗的海。这说明了为什么英国在哥本哈根进行了两次海战。由于控制了海洋，英国便能派军队在荷兰、西班牙和意大利登陆，消耗拿破仑在后方的力量。看来饶有趣味的是：取得最后胜利的特腊法耳加，战争转折点的莫斯科，十分靠近我们真正的欧洲的两个极端。拿破仑战争是西欧和东欧的决斗，双方的面积和人口的略相等。但是西欧由于文化较高而取得的优势，被英国的海上力量抵消掉了。

滑铁卢战役后，东欧由三国——俄、奥、普——神圣同盟联合起来了。三国每国都向西占了一席之地，好像有磁石向这方向吸引似的。俄国得了波兰的大部分，从而在地理上的欧洲半岛的中心占了一个政治半岛。奥地利拿了达耳马戚亚海岸，又拿了意大利北部大陆上的威尼斯和米兰。普鲁士拿了在西欧的老日耳曼一片“不与别处牵连”的领土，这片领土分成两省，来因兰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普鲁士这次并吞日耳曼人，比俄国并吞波兰人，奥地利并吞意大利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来因兰是古老的文化之邦，位置极靠西方，因此接受拿破仑法典为其国法，直到今天还如此。从普鲁士这样硬闯进西欧的时刻起，自由主义的来因兰和保守主义的柏林的布兰登堡之间，无可避免地要有一场斗争。但是这场斗争，由于欧洲精疲力竭而暂时推迟了。

这期间，英国的海军力量仍然从赫耳果兰岛、朴次茅斯、普利茅斯、直布罗陀和马耳他包围西欧。由于在 1830 年至 1832 年

间形成的变化，西欧临时性的反动统治结束，中产阶级在英、法和比利时都取得了政权。从 1848 年至 1850 年，民主运动发展至来因河以东，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思想风行于中欧。但是从我们的观点来看，有两件事，也只有这两件事，是具有决定意义的。1849 年，俄国军队入匈牙利，使马扎儿人重新听命于维也纳，从而使奥地利人得以再次统治意大利人和波希米亚人。1850 年在奥姆茨（Olmütz）举行了那注定要发生严重后果的会议，俄国和奥国不让普鲁士王接受西欧法兰克福奉献给他的统治日耳曼全境的王冠，因此维护了东欧的联合，而从来因兰传布出去的自由主义运动肯定受到了阻碍。

1860 年，曾经在法兰克福逗留过的、也曾在巴黎和彼得格勒当过大使的俾斯麦奉召在柏林掌握大权。他决定不把日耳曼的统一建筑在法兰克福的和西方的理想主义上，而是建筑在柏林和东欧的组织上。1864 年和 1866 年，柏林横扫西日耳曼，并吞了哈诺威（Hanover），从而为容克军国主义进入来因兰开辟了道路。同时柏林帮助马扎儿人建立奥-匈联合政府，剥夺了奥国的威尼斯来削弱和它竞争的奥国。在这之前，法国已使米兰重归西欧。1866 年普奥之间的一场战争，实质上只是一场内战。这一点在 1872 年就一目了然了。那时候，普鲁士继在对法战争中显示了它的力量不可抗拒之后，又建立了三帝联盟，因此在一段时期内重建了东欧的神圣同盟。东欧力量的中心，现在却是普鲁士而不再是俄罗斯了。东欧建筑了来因式的“护堡斜堤”来抗击西欧。

普法战争后，在的 15 年间，俾斯麦统治了东欧和西欧。他统治西欧，是用离间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三个罗曼斯语

系[1]国家的手法。他是在三国同巴伯利这个阿拉伯人的“西方之岛”的关系上做到这一点的。法国占了被称为阿尔及利亚的巴伯利中央部分。俾斯麦鼓励法国东入突尼斯，西入摩洛哥来扩大其版图，使法国的利益和意大利、西班牙的利益发生冲突。在东欧，俄奥在巴尔干半岛上也有类似的争锋，但在这方面，俾斯麦致力于使他的两个盟国不要吵翻，仍然团结。因此，俾斯麦在1878 年和奥国缔结两国同盟后，同俄国秘密谈判，签订了再保险条约（Reinsurance Treaty）。他要有一个在普鲁士控制下的团结一致的东欧，却要一个四分五裂的西欧。

*　　　　*　　　　*

我们约略回忆的这些事件，并非只是已经过去的不起作用的历史。这些事件能明东欧和西欧基本上的对立，当我们记起，通过德国的那条线——历史表明是东欧和西欧间的疆界线——就是我们在别的场合中认为从战略意义讲是划分“心脏地带”和沿海地区的那根线时，这种对立便具有世界性的重要意义。

西欧有两大组成部分：罗曼斯语系的和条顿语系的。就英法两个主要国家而论，在现代并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一国征服另一国的问题。两国之间横亘着英吉利海峡。远在中世纪，不错，有三个世纪法国的骑士统治英国，也有一个世纪英国想统治法国。但是这种关系在玛丽女王失去加来（Calais）时便永远结束了。两国在 18 世纪打的几次大战，主要是为了阻止法兰西帝国独霸欧洲大陆。其他的战争都是争夺殖民地、抢做生意的战争。就沿来因河的条顿族人而论，在过去也肯定对法国人没有

① 即拉丁语。——译者

根深蒂固的敌意。阿尔萨斯人，虽然说的是德语，内心是法国人——这是历史上至今仍有影响的许多大事中之一。甚至在今天，我们都看得到，普鲁士的来因省施行拿破仑法典。

东欧也有两大组成部分：条顿语系的和斯拉夫语系的，但是并不像西欧的罗曼斯语系和条顿语系的组成部分那样，二者不是处于平衡状态。东欧整个局势的关键——这是一件在眼前不能很清楚记取的事实——在于日耳曼人硬要压倒斯拉夫人。刚在西欧界外的维也纳和柏林，就处在中世纪初期属于斯拉夫的区域内；这两处代表了日耳曼人作为东进的征服者跨出其本土的第一步。在查理曼大帝时期，萨尔河（Saale R.）和易北河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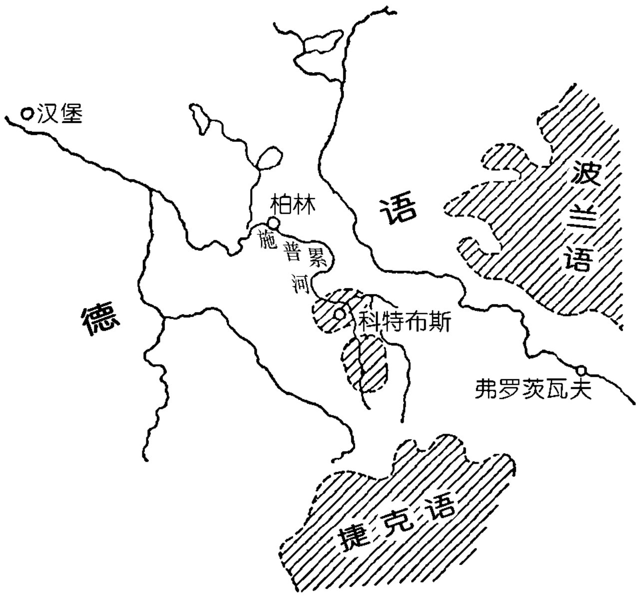


图 29．使用温德语（斯拉夫语）的残存孤岛科特布斯，
四周是说德语的汪洋大海。

斯拉夫人同日耳曼人隔开了。柏林之南不远便是科特布斯圈（Circle of Kottbus），那里农民说的还是温德语（Wendish），也就是几世纪前那里整个区域都说的斯拉夫语。在这少数温德孑遗之外，斯拉夫农民把在大庄园中统治他们的日耳曼贵族的语言，当作自己的语言。在德国南部，那里的农民是真正日耳曼人，土地是由小地主占有的。

毫无问题，奥地利贵族和普鲁士贵族给予外国人的印象是不同的。这种不同，无疑问是由于：奥地利人是从南方的日耳曼家乡向东进的，而普鲁士人来自生活较艰苦的北方。但是在普鲁士和在奥地利一样，战前的大地主都是专制的主子，虽然我们一般认为容克只是属于普鲁士的。直到较不久以前，两国的农民都处于农奴状态。

普鲁士向东北和东南方向伸出去的领土，对于结合地图来研究历史的人来说，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正是结合地图的历史，构成了在我们的重新建设中必须考虑到的一桩伟大的现实。在这方面，表明语言分布情况的地图，比政治地图更能说明问题，因为语言分布图上表明日耳曼语言有三种而不是只有两种。第一种是在东北方向上沿着波罗的海海岸，这代表中世纪后期日耳曼的征服和强迫条顿化。律贝克（Lübeck）的汉萨同盟[①]的商人和条顿贵族，不再忙于十字军东征，沿着那靠海岸的水道征服了所有的沿海地带，直到目前彼得格勒矗立之处。在后一段历史时期，这段“德意志国粹”（“Deutschthum”）地带的一半并入柏林君主国版图，另一半成为俄罗斯沙皇帝国的波罗的海

① 日耳曼北部都市的政治性和商业性同盟。——译者

诸行省。但是直到我们今天，波罗的海行省仍然在里加有其日耳曼商人社团，在塔尔土（Dorpat）[①]有其日耳曼大学，还有其日耳曼贵族当地主。根据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条约（Treaty of Brest-Litovsk）的规定，日耳曼人在库尔兰德（Courland）和利沃尼亚（Livonia）这些土地上，又要实施统治了。

日耳曼人的第二条通道是上溯奥得河（Oder River），到源头处的摩拉维亚山口。摩拉维亚山口的一边是波希米亚山脉，另一边和喀尔巴阡山脉，二者之间是从波兰通向维也纳的深谷。沿奥得河上游的日耳曼人定居地成为西里西亚，该处大部是被腓德烈大帝统治时期的普鲁士从奥国手里拿过来的。这两条伸向东北和东南的说日耳曼语的突出地带，由于说波兰话的普鲁士行省波森（Posen）以相反的方向角状楔入两带之间，就更突出了。

日耳曼人第三条向东去的通道是顺多瑙河而下，并通过向南的山口，进入东阿尔卑斯山区。这一支成了维也纳周围的奥地利大公国和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说日耳曼语的卡临西亚大公国（Carinthian Duchy）。在西里西亚日耳曼人和奥地利日耳曼人之间，向西突出着波希米亚行省，基本上是说斯拉夫语的。我们不要忘记了，波森和波希米亚保存了他们本民族的语言，而那说日耳曼语的三个突出地带是代表三条征服的水流。

甚至在德意志国粹这三次大规模侵略所占地区的最靠边缘的地点之外，还有许多散在各处的日耳曼农人和矿工的定居地，其中有的是最近才定居下来的。在匈牙利，这样的定居地有好

① “Dorpat”是“Tartu”的德语名，现在苏联爱沙尼亚加盟共和国。——译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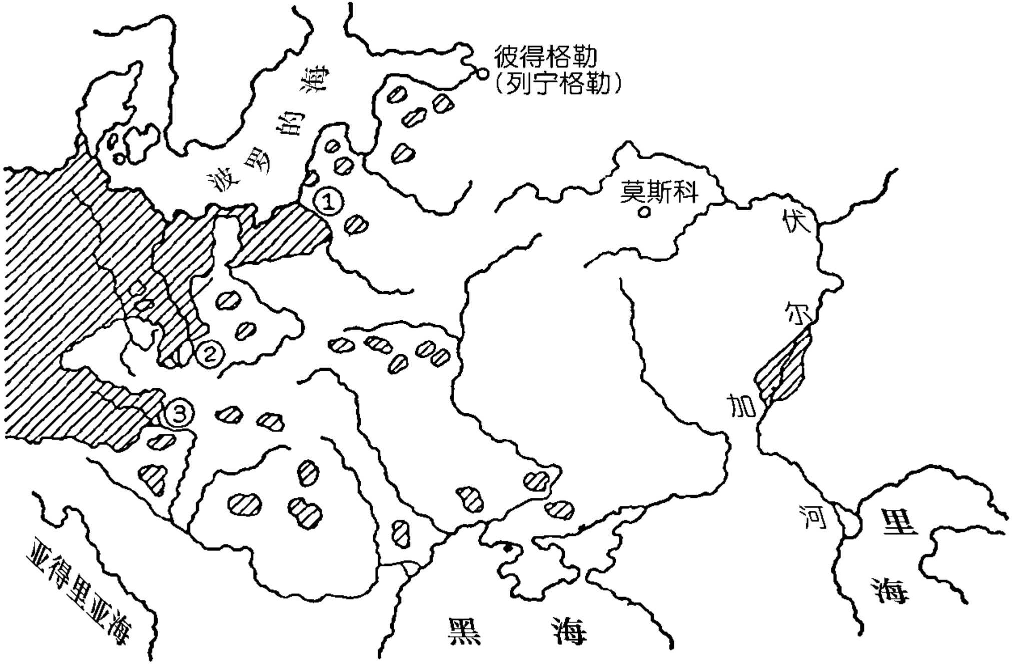


图 30．讲德语的三个向东突出地带，以及远至伏尔加河的日尔曼人定居地。
①——普鲁士；②——西里西亚；③——奥地利。

几处，虽然为了政治上的原因，那里的日耳曼人现在在很大程度上与马扎儿人的残暴统治沆瀣一气。在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的撒克逊人，和这一地区的马扎儿人，在被压迫的罗马尼亚农民当中，共同处于特权地位。[①]在俄国，有一连串的日耳曼人定居地，靠东，从乌克兰北部几乎直到基辅。只有在伏尔加河中游萨拉托夫附近，我们才算把这些日耳曼定居人所占的地区数尽了。

我们却决不能认为，日耳曼人在斯拉夫人中的影响只限于说日耳曼语的这些范围，尽管这些范围是极有力量的因素——因为凡是日耳曼语言进入的地方，日耳曼文化也进去了。斯拉夫的波希米亚王国完全被并入日耳曼帝国系统。按宪法规定，波希米亚国王是皇帝的推选人之一，这部宪法直到 1806 年沃斯特腊伐（Austerlitz）战役[②]之后才归无效。波兰人、捷克人、克罗地亚的南斯拉夫人以及马扎儿人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也就是说，他们都属于天主教的拉丁或西方分支，意味着日耳曼影响的扩大和对于俄国希腊教的抵抗。在 1683 年维也纳被围之后，奥地利日耳曼人在 18 世纪时期内一步又一步地前进，赶着土耳其人离开匈牙利，直到他们根据 1739 年的贝尔格莱德条约规定，划定了一条线为止；在以后 100 多年中，这条线是土耳其势力和基督教国家的定界。毫无疑问，奥地利人因此对欧洲做了一件大好事。但附带而来的影响，就克罗地亚人、马扎儿人、斯洛伐克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而论，只是把土耳其主

① 这里是仍然按照战前情况说的，未作更动，因为记住这些情况，要比至今仍然模糊的在将来的重新安排，更有用处。

② 指拿破仑击败俄奥联军之役。——译者

人换成日耳曼主人而已。当俄国的彼得大帝于18世纪初叶从莫斯科迁都彼得格勒时,他是从一斯拉夫语的环境迁入一日耳曼语的环境。这一事实可由圣彼得堡这一日耳曼名称中看出来。其结果,18和19整整两世纪中,俄国政府中的日耳曼影响始终很大。沙皇帝国所依赖的俄罗斯官僚,大体上都是从波罗的海行省日耳曼贵族家庭的子弟中选拔而来的。

因此东欧不像西欧那样,并不是由许多各自独立的民族组成的;也不像在阿尔萨斯被普鲁士拿去以前的西欧那样,彼此并非没有严重的疆界问题。东欧是日耳曼人对主要是斯拉夫语居民的大规模的三重组织,虽然日耳曼力量的范围毫无疑问地因地而异。由此我们就能了解1895年转向的意义;在那一年,民主和专制两个格格不入的政制——法俄——结成了联盟。俄国和法国结盟反对日耳曼人,不仅是欧洲牌桌上的牌重新分派,其含意要多得多。从柏林的观点看,东欧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有重要意义的大事件发生之前,俄奥政府之间由于在巴尔干争雄,长时期在吵嘴,但这是属于家庭内部争吵性质,和1866年普奥之间的一场为时短暂的战争相仿佛。当俄国于1853年进军至多瑙河打土耳其,而奥国结集兵力从喀尔巴阡山脉威胁俄国时,从1815年一直保持下来的神圣同盟的友谊无疑中断了,直到俾斯麦通过1872年他那三帝同盟的缔结,才又把这三个专制国家联合在一起。但是碰巧在这段时期内,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受损失,无力再度进攻土耳其人,因此俄奥之间接着并没有发生无可弥补的裂痕。但是在1878年奥国占领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斯拉夫省份,表明了它对巴尔干的野心之后,三帝同盟便维持不久了。接着几年的情势使人不安,这期间日耳曼

人力量大增，当时俄国还没有认清：它面前只有两条路，不是和法兰西共和国人联盟，便是接受附属于德国的地位，就像奥地利被降到附属于德国的地位那样。

*　　　　*　　　　*

维多利亚时代西欧和东欧的历史，叙述到此为止。但是与此同期有一段“并非欧洲”(Not-Europe）的历史，我们目前必须加以研究。以特腊法耳加战役为顶点的海战所造成的影响是：在约一个世纪内，世界历史的潮流被分成两个支流。英国以其海上力量包围欧洲；但是，除了有时由于与它在东印度的利益攸关，有必要在东地中海一带进行干涉之外，它并不积极参与欧洲半岛的政治。英国的海上力量也包围以好望角为终点的世界大海角，并且从东印度沿海出动，同俄罗斯哥萨克的力量互争雄长。俄罗斯哥萨克那时正在逐渐完成对“心脏地带”的控制。在遥远的北方，俄国人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前，沿滚滚巨流的黑龙江下到太平洋沿岸。一般的说法是：日本的门户开放，是 1853 年美国海军准将彼利（Perry）行动的结果。但是俄国人之出现于库页岛，甚至南下深入到虾夷（Yesso）[①]的函馆，是曾在这方面做了些准备工作的。就英国方面而论，俄国当时最突出的威胁，自然是在印度西北边疆开外。

19 世纪时期英国得在海上为所欲为，是因为那时美国还没有强盛，欧洲全部时间忙于战争。在曼彻斯特政治思想学派的统治下，店老板之国[②]的目标是航运和市场。当时最主要的新市场，是东印度广大人口所提供的市场。因为非洲尚未开发，极

① 虾夷即北海道。——译者

② 即英国。——译者

大部分地区的人赤条条地，南、北美洲人口还没有兴旺。因此，尽管英国有可能兼并除美国的大西洋沿岸外的全部非欧洲海岸，它却只占领了往东印度去的沿海航道上的船只停泊港，在非占领地区内则只做一些发展殖民地的工作;这种工作是它本国的冒险家所强加于它的，是它企图予以制止而未遂的。但是它被迫在印度不断进展，就是古代罗马所熟识的那种进展：新的省份一个接一个地兼并了，目的是剥夺敌人的基地，使他们不能为害于已经占领了的土地。

地图立刻显示了19世纪时期俄英争雄的战略的主要方面。俄国几乎控制了整个“心脏地带”，在叩东印度陆上之门。另一方面，英国在叩中国海上之门，并从印度海上之门进入内陆，来抗击从西北来的威胁。俄国在“心脏地带”的统治是建筑在它在东欧的人力上的,并通过哥萨克骑兵的运动,扩张到东印度的门前。英国在东印度沿海的力量是建筑在远在西欧的海岛的人力上，并通过英国舰只的运动活跃于东方。从西方到东方的两条不同航道中，显然有两处紧要地点，即我们今天称之为“角”和“运河”的两个地点。在整个19世纪时期，好望角远离着一切来自陆上的威胁；南非实质上是个岛。苏伊士运河直到1869年才通航，但是它的建造早就是发生影响的一件事。使埃及，从而也使巴勒斯坦具有现代重要性的，是法国人拿破仑。就像在18世纪表明有可能从海岸推向内陆，在莫卧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印度帝国的，也是法国人，杜伯里克斯。[①]莫卧儿帝国原来是从德里向外建立起来的。这两个见解，拿破仑的和杜伯里克斯的，基本上是海

① 杜伯里克斯（Dupleix），1697—1763，法国在印度的殖民地总督（1742—1754）。——译者

上强国的见解，它们出之于西欧半岛上的法国，是不足为奇的。拿破仑以其远征埃及，把英国舰队吸引到地中海内，进行尼罗河之战，又吸引英国军队，使他们破题儿第一遭，从印度远涉重洋到尼罗河谷。因此，当俄国在“心脏地带”的力量增长时，英法两国的目光就必须注视苏伊士。英国的注视，很显然有实际原因。法国的注视，一部分由于伟大的拿破仑传统所形成的感情，但也由于地中海的自由对法国能否安枕于西半岛有很大关系。

但是在当时人的眼光看来，俄国的陆上力量并没有发展到威胁阿拉伯的程度。从“心脏地带”通向欧洲的天然出口，是通过君士坦丁堡海峡的海道。我们已经看到了罗马是怎样在黑海上确定其边疆线的，怎样就地以君士坦丁堡为其地中海海上力量的基地，来抵抗草原上的息西安人。俄国在尼古拉沙皇统治下，想把这政策倒过来。俄国想要控制黑海及其向南出口，扩展其陆上力量到达达尼尔海峡。结果不可避免地使西欧联合起来反对它。因此当俄国施展阴谋，把英国卷入 1839 年的第一次阿富汗战争中时，为了保卫苏丹，使不遭受埃及的叛乱总督麦海梅特 · 阿里（Mehemet Ali）从叙利亚进攻，对于俄国陈兵博斯普鲁斯海峡，就不能泰然处之。于是英法自己动手处理麦海梅特，于 1840 年在叙利亚对他发动攻击。

1854 年，英法又被卷入同俄国动兵。法国已以保护近东的基督徒为己任，它在这方面的声望，由于俄国对耶路撒冷的圣地的阴谋而受到损害。因此当俄军出师多瑙河对付土耳其人时，法英便被卷入支援土耳其人。萨里斯勃雷勋爵（Lord Salisbury）在逝世前不久说，支援土耳其，我们是买马票选错了马。在上一世纪中叶，这样说很有把握吗？时机是国际政策中的要

素，政治上的权变有时就是机会主义。就非原则性的事物而论，在日常社交中，不是认为说的话很对而有可能时机不对吗？1854年时，东欧的组织中心是俄国力量而还不是日耳曼力量，俄国正由“心脏地带”迫近东印度，并在设法通过君士坦丁堡海峡，由“心脏地带”涌入西方，普鲁士又支持俄罗斯。

1876 年土耳其又陷于窘境，又得到英国的支援，尽管有必要没有法国的支援。结果是挡开了俄国的力量，使它碰不到君士坦丁堡，但是付了代价：把一向属于土耳其的、斯拉夫人聚居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省改归奥地利所有，因而让日耳曼人对巴尔干走廊跨出第一步。就在这时候，英国舰队得到土耳其的允许，驶经达达尼尔海峡直抵君士坦丁堡看得见清真寺尖塔的地方。俄国政策的方向的大变化还没有出现。俄英都没有预见到积蓄人力的经济方法，而柏林正要使用这种方法。

当我们回顾法国革命后 100 年间事件的动向，并认为东欧大体上是世界大事中单独一股力量的基础时，我们不是认识到，虽然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往往认为欧洲的政治和外面“并非欧洲”的政治是分开的，而事实上并没有这种分开吗？东欧控制着“心脏地带”，而遭到英国海上力量的抵抗；英国的海上力量从中国经过印度到君士坦丁堡，分布在“心脏地带”3/4 强的边缘上。有关君士坦丁堡的事，法英往往联合行动。当 1840 年由于埃及总督和苏丹之间的争吵而欧洲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时，大家就都本能地注目来因河，普鲁士已在来因河上建立了前哨行省。日耳曼歌曲《守望在来因河上》（Wacht am Rhein）正是那时候写的！但是威胁法国的战争并非由于阿尔萨斯和洛林，而是为了支援俄国。换句话说，是东欧和西欧之间发生争吵。

1870 年英国并没有支援法国反抗普鲁士。事后看事清楚，我们不是有理由问：在这一事件中，我们是否马选对了而没有买马票，但是岛国人民的目光，仍然因特腊法耳加的胜利而视而不见。他仍知道拥有海上力量是什么滋味，享受海上自由是什么滋味，但是他们忘了，在很大程度上，海上力量是依靠它所依托的基地的生产力，而东欧和“心脏地带”可以成为一强有力的海上基地。此外，在俾斯麦时代，当东欧的重心正从彼得格勒移至柏林时，当时的人没有认识到三个专制国家的争吵是次要性质的，而普法之间的战争是基本性质的，大概不是不合情理的事。

最近的大战是由于斯拉夫人反抗日耳曼人而在欧洲掀起的。导致战争发生的事件，起源于 1878 年奥地利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两个斯拉夫省，以及 1895 年的俄法联盟。1904 年的英法协约并不是有同等重要性的事件，我们两国在 19 世纪曾经常合作。但是法国比英国先看到，柏林已替代彼得格勒成为东欧的危险中心。结果是，我们两国政策在不多几年内曾从不同的角度来制定。既是岛又是半岛的西欧，有必要一定要反对企图组织东欧和“心脏地带”的富源的任何强国。从这个概念来看，过去 100 年间英法政策大体上前后一贯。我们反对半日耳曼性质的俄罗斯沙皇国家，因为俄国在半个世纪内是东欧和“心脏地带”占有优势、带有威胁性的力量。我们反对整个是日耳曼性质的德帝国，因为德国从沙皇国家手里把东欧的领导权抢过来了，接下去就要粉碎反抗的斯拉夫人而控制东欧和“心脏地带”。日耳曼文化及其在组织方面的一切含义，会使日耳曼的控制比之俄罗斯的鞭打，像是蝎尾鞭的惩罚。[①]

① 意谓日耳曼的统治要比俄国的厉害得多。——译者

*　　　　　　*　　　　　　*

以上我们是从战略机会的观点来考虑帝国之间的互争雄长。我们得到的结论是:“世界岛”和“心脏地带”，对于海上强国和陆上强国，是终极的地理现实，东欧基本上是“心脏地带”的一部分。但是还待考虑人力的经济现实。我们已经看到基地的问题，不但要安全，也要有生产力，这对海上强国关系极端重大。具有生产力的基地需要人的支援，不仅是为船只配备人员，也为有关航运的一切陆上劳务配备人员。这一事实，今天在英国已经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认识得更清楚。关于陆上强国，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历史中的骑骆驼和骑马的人，由于缺乏足够的人力不能保持帝国的长期统治，而俄国是“心脏地带”具有真正可怕的人力的首要居住者。

但是人力并不意味着只是数数多少人头，虽然在其他方面条件相等时，数目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力也不只是依靠高效率的人数，虽然健康和技术是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人力——人的力量——在现代的日子里，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组织，换句话说，有赖于“进行中的事业”，亦即是社会的有机体。日耳曼文化，“手段和方法”的哲学，对外面的世界是有危害性的，因为日耳曼文化认识到两种现实，地理的和经济的现实，并且只从这两种现实来考虑问题。

英国的“政治”经济和德国的“国家”经济来自同一源泉——亚当·斯密那本书。两国都以劳动分工和竞争确定劳动产品的交换价格为基础。因此两国经济都可以说是同19世纪达尔文所提出的、盛行于当时的思潮相协调的。它们的差别，只在于竞争的单位。在政治经济中，单位是个人或厂家；在国家经济中，单

位倾向于相当联邦中的邦国。这是日耳曼国家经济奠基人李斯特（List）所重视的事实。在李斯特的推动下，普鲁士的“Zollverein”——关税同盟——扩大了，到后来把德国的大部分都包括进去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欢迎关税同盟，把它认作自己的自由贸易的一部分。事实是，国家经济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把竞争移到外面，目的在于以大规模的国家组织的竞争，来替代只是个人间的竞争。一句话，国家经济学家是生气勃勃地考虑问题，而政治经济学家主要是静止地考虑问题。

日耳曼文化同民主在思想上的这种显著差别，起初并不某有很大的实际意义。上一世纪的五十和六十年代，日耳曼人在打仗。英国的厂主不可一世。正像俾斯麦有一次说过的那样，自由贸易是强者的政策。直到 1878 年，亦即科学化的关税第一次出现的那一年，日耳曼的经济利刃才出鞘。这一年大致上也是运输的技术有极大改变的一年。对这方面人们常是注意不够的。直到那时候，在美国的英国造铁路和在大西洋上的英国制钢船才开始载运散货。

如果我们想一想，今天在加拿大西部，有 100 万人的一个社会种了够 2,000 万人吃的谷物，另外那 1,900 万人都在远处——在加拿大东部、美国东部和欧洲，我们便能理解载运散货——小麦、煤、铁砂、煤油——这件新事的意义。在 1878 年以前，比较轻的货，例如棉花、木材和煤等商品，由帆船载运过海。但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全世界用帆船载运的货物数量是无足轻重的。德国懂得这一点：在新的情况下，有可能以进口的食品和原料，在你选定的地方发展人力，因此就有可能在德国本土发展人力，作战略上的使用。

直到这时候，日耳曼人和英国人一样，可以自由移居到外国。但是日耳曼人都要购买英国的制造品，这方面并不亚于在新国家的英国人，因此英国人的人数，既在殖民地和美国增长，又在本国增长。科勃顿[①]和布顿特[②]曾预见到这一点。他们确是想要以廉价的食品和廉价的原料制成廉价的出口商品。但是世界其他各处把我们的自由贸易看成是帝国的而不是自由的方法。他们看到的是问题的另一面。他们是要当为了大不列颠的利益而劈柴挑水干苦活的人。不幸的是，不列颠岛上的人犯了错误，把他们的繁荣主要归功于他们的自由进口，而实际上主要是由于他们那伟大的“进行中的事业”，并且由于在有竞争对手以前就已经着手进行了。正是由于在 1846 年他们是“强者”，他们才能采取自由贸易而立刻就有好处，而没有立刻出现严重的坏处。

从 1878 年起，德国就开始以刺激国内就业来逐步积蓄人力。其方法之一就是科学化的关税，进口货都要过一过这面筛，使进口货所包含的劳力、尤其是熟练的劳力越少越好。但是也采用了提高“进行中的事业”的其他办法，来大大增加国内的生产。铁路由国家收买了，并规定了特惠价格。银行改归国家管理——通过掌握彼此关联的股票的一种制度来管理。信用贷款组织起来了，可以供工业借贷。卡特尔和协作减低了生产和分配的费用。结果，约当 1900 年，人数一直在下降的德国向外移民完全停止了，即使还有移出去的，也被移进来的抵消了。

① 科勃顿（Cobden），1804—1865，英国工业家、商人、经济学者和政客。——译者

② 布赖特（Bright），1811—1889，英国演说家和政客。——译者

经济上的攻势，通过向海外渗入的方法而加强了。轮船公司有了津贴，银行被当作在外国城市中的贸易前哨。国际联合企业在德国的控制下组织起来了，这极大地取助于法兰克福的犹太人。1905 年，一套商务条约强加给了七个邻国，条件之苛刻，等于是要这七个国家在经济上屈从德国。其中一国是俄国，当时因为战争和革命而国力衰弱。这些条约据说是花了十年功夫想出来的——日耳曼文化的一个特有的开花期！

德国的迅速发展是组织的胜利，换句话说，是战略的、“手段和方法”的精神状态的胜利。其基本的科学思想绝大部分是进口来的，自吹自擂的日耳曼专门教育只不过是一种组织的方式。整个制度是建筑在对于“进行中的事业”的现实——组织起来的人力——的清楚理解上。

但是“进行中的事业”是一冷酷无情的事实，因为动物的人的第一个政治特质是饥饿。战前十年中，死亡与出生抵消后，德国人口每年净增 100 万。这意味着那有生产力的“进行中的事业”不仅一定要保住，而且必须加速“进行”。在 40 年的期间内，德国对市场的饥饿已成为世界上最恐怖的现实之一。同俄国签订的商务条约要在 1916 年重订这件事，可能和硬要打这次仗不无关系。德国不论要付出多少代价，都需要有一个屈从的斯拉夫国，来为它生产食物，买它的东西。

1914 年在柏林拉开闸栓、放出积蓄起来的德国人力的洪流的那批人，是有责任的。不得不进行这一场恶斗的不幸的一代人，根据我们至今所掌握的情况，曾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并确定了这批人的责任。但在历史面前，这批人的罪责，要由过去多年中使这事业进行的人来分担。就这件事而论，英国政治

家和英国人民不是完全无可指责的。

自由贸易的理论是:世界各个不同的地区应跟据其自然条件来发展，不同地点的人应当有所专门，并自由交换产品来相互帮助。人们坚决相信，自由贸易因此是有利于和平的，有利于人类相亲相善的。在亚当·斯密时期以及其后一二代中，这或许言之成理、持之有效。但在现代情况下,“进行中的事业”，换句话说,积累起来的经济的和工业的力量,能够压倒极大多数的天然条件。兰开夏棉纺织工业的“进行中的事业”，是这方面一个大规模的例证。出口的廉价商品的价格的极小差别,会保住或者失去一处市场;那大规模的“进行中的事业”最经受得住减价。因此兰开夏一个世纪来保住了棉纺织工业，击退了一切竞争对手，尽管原料的来源和制成品的主要市场都在世界上遥远的地方。煤和潮湿的气候是它唯一的天然条件,而这些条件别处也可能有。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业是由于动量而继续存在的。

但是，一切专门化的结果便是成长、出现偏畸的现象。自从1878 年后发生偏畸现象以来，英国的工业虽然继续增长，农业却衰落了。但是不久，偏畸的现象甚至在英国工业内部也出现了:棉纺织和造船工业仍然增长，化学和电气部门却没有按比例增长。这不仅是由于德国蓄意渗入我们关键性的工业,因为在英国之外的、工业正在积极发展的世界上,专门化的正常活动的结果，肯定要产生某些这种显著差别。英国大规模发展一些工业，渐渐地它的力量集中在这几门工业上。因此它便发生了“市场饥饿”，其程度不在德国之下；就它专门的几种工业来说，只有整个世界才够做它的市场，小了不行。

英国并无关税作为讨价还价的基础。就这方面而论，它在

世界面前是赤手空拳的。因此，当它的几处极端重要的市场遭受威胁时，它只能以其海上力量回敬。科勃顿在他老年时可能预见到这一点，当时他主张英国有必要拥有一支强大海军。但是曼彻斯特学派的一般群众迷于该派主张，满以为自由贸易是有利于和平的，很少想到发展工业特别要有海军作后盾。从他们眼光看来，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交易买卖都一样好。但是当英国舰队维护门罗主义，在马尼拉事件中反德时，英国是在为它的南美市场而战，在南非战争中英国舰队迫使德国不敢动，是为了它的印度市场而战，英国舰队在日俄战争中支援日本，是为了使通向中国市场的门户开放而战。兰开夏是否理解到，棉花之自由输入，是用武力强加于印度的？毫无疑问，由于英国的统治，总的说来印度是得到很大好处的，在这方面兰开夏的良心上毋需负有重疚。但是事实仍然是：在帝国内外，进行自由贸易和爱好和平的兰开夏，一再受到帝国力量的支援。德国注意到了这事实，便建造了自己的舰队。这支现有的舰队——到这次战争结束这支舰队还在——牵制住了英国很大一部分力量；否则这部分力量是可以用在别处，支援我们在法国的军队的。

“进行中的事业”的动量，在民主国家中是极难改变的。将来的一个希望是：由于这次战争的教训，甚至民主国家也可能学会高瞻远瞩了。在一个经济上偏畸发展的社会里，大多数人是站在偏畸发展的一边的，而在一个民主国家里，选举统治者的是大多数人。结果既得利益者便会得寸进尺，工人以特殊方法挣得工资、购买物品，资本家以同样的方法赚钱，双方的利益都是越滚越大。在这些方面，平均而论，工人和资本家没有什么不同。双方都目光浅短。

但是在专制国家里改变“进行中的事业”同样也有困难，尽管对困难的感觉不同。民主国家的大多数人不肯改变其经济常规，但是专制国家往往不敢这样做。德国在皇帝统治下想要建立一个世界帝国，为此采用了相应的经济上的权宜措施来积蓄人力。不久它便不敢改变它那十分成功的政策，即使这政策逼迫它去打仗，因为一改变就要发生革命。和法来根斯坦（Frankenstein）一样，德国造成了一头无法控制的巨兽。[①]

我相信，无论是放任式的自由贸易还是掠夺式的保护贸易，都是帝国的政策，都要引起战争。英国人和德国人是在同一条铁道上驾驶快车，但是方向相反。大概从1908年起，撞车已不可避免；到后来连扳闸煞车都来不及了。英国和德国责任方面的不同或者可以这样讲：英国司机先开车，开得心不在焉，不管信号乱开；而德国的司机是故意把他的火车加强了，配上装甲，使它经得起一撞，然后把火车开上有来车的轨道，到最后一刻，松开了节汽闸。

在目前这时代，“进行中的事业”是伟大的经济的现实。德国人居心叵测地用了它。英国人盲目地用了它。布尔什维克们准是根本忘了有这回事。

① Frankenstein是雪莱（Mary Shelley）写的一部小说的名称。小说中有一学生，造了一头巨兽，连他自己也无法控制。——译者

第六章　国家的自由

协约国在这次战争中胜利了。但是我们是怎样取得胜利的？过程中充满了警告。我们之得救，首先归功于英国舰队的处于备战状态，并决定令舰队出海，英国和法国的交通因此安全了。这种戒备和决定，是英国习惯于能在许多乱七八糟东西之中抓住要领的结果。这是一种能干而不是内行的人的做法。我们之得救，其次归功于法国天才在马恩取得的辉煌胜利，这是伟大的法国军事学院多年来深思熟虑准备的结果。其他方面，法军并没有处于应有的戒备状态，勇气除外。我们之得救，第三归功于老练的英国职业军队在伊伯尔——在历史上可以和色莫帕里[①]媲美——不亚于法军的牺牲。简单说来，由于我们一般人都不肯从长远看问题，不肯早作准备，我们是被异常的天才、异常的英雄主义救出来的。这正既是民主国家的力量，也是它的弱点的最好证明。

接着有两年战局稳定了，在陆上成了堑壕战，在海上成了潜艇战，是一场在时间上证明对英国有利，对俄国却不利的消耗战。1917 年俄国顶不住了，接着就垮了。德国在东线胜利了，但是没有立刻使斯拉夫人彻底屈服，为的是要先打倒它那西线的敌人。西欧不得不求援于美国，因为西欧单独是无力扭转东线的决定性失败的。又必须要有时间。因为第三个大民主国家美

① 色莫帕里（Thermopylae），希腊东部一要隘名，公元前 480 年，斯巴达人于此英勇抵抗波斯人。——译者

国来参战，比其他两国更是缺乏准备。时间是买到了，是以英国海员的英雄主义、英国商船的损失、英法军队的坚忍，抵挡住了几乎把他们压倒的在法国的一场攻势，这样才买到的。简单说来，我们又一次以我们的特性和能掌握要点来和德国的组织相斗，好不容易刚刚打赢。到了最后一刻，英国才接受战略统一指挥的原则，又一次给法国军事学院以发挥才能的机会。

但是西线和海上战争的全部记录，如此辉煌而又如此屈辱，对于国际的重新安排很少有直接关系。东欧和西欧之间并不会立刻发生事吵，法国要攻德国以收复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时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决不要忘记，战争是由德国人想要制服反抗柏林的斯拉夫人而引起的。我们都知道，奥地利（日耳曼）大公爵在斯拉夫的波斯尼亚被暗杀是一个借口，奥地利（日耳曼）对斯拉夫族的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是逼迫开战的方法。但是再多说也不为过的是，这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基本冲突的结果，日耳曼人要当东欧的主人，斯拉夫人拒不屈从。如果德国当初决定在它对法的短短边界上采取守势，而以其主力对付俄国，那并非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今天的世界名义上是和平的，但遭到控制“心脏地带”全境的日耳曼人之东欧的威胁。英美两国岛国人民不会认识到这战略上的危险，等到认识到，已经太晚了。

除非你是要为将来制造麻烦，否则现在你就不能接受任何没有最后解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在东欧的问题的战争结果。你必须在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保有一种平衡，两方面都有真正的独立。你不能使东欧和“心脏地带”的事态处于一种可使将来的野心家有机可乘的状态，因为你是千钧一发，好不容易才逃过最近这次危险。

一位得胜归来的罗马将军正在入城，处身于万头攒动争欲一睹英姿的“凯旋式”中，在战车里他的身后有个奴隶，低声在他耳朵边说，他是个凡人。当我们的政治家在和被打败的敌人谈话时，应当有飞腾的小天使对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叮嘱这样的话：

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
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
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

* * *

格雷子爵[①]把最近事件的整个悲剧过程归因于欧洲公法的破坏，即1908年奥地利撕毁柏林条约，并吞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毫无疑问，这应是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是正是按这柏林条约，奥地利于1878年占领了土耳其的这两个斯拉夫省，这或许更接近于战争的源头。它意味着，在斯拉夫人看来，奥地利的日耳曼人进据这片地，有普鲁士的日耳曼人作后盾，而斯拉夫人曾为这片地和土耳其人打过仗。必须记住，后来导致召开柏林会议的1876年的战争，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人起义反抗土耳其引起的；邻近的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的斯拉夫人为同情心所驱，他们也和土耳其人作战了，以致变成了欧洲的战争。1878年后，有几年俄国踟蹰不前，而德国开始积蓄人力。然后于1895年沙皇俄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结成同盟。法国需要一个盟国，因为它的腰部阿尔萨斯伤口未合。俄国需要一个盟国，因为它身旁有个日耳曼暴徒。俄国和法国并

① 格雷子爵（Viscount Grey），1862—1933，英国政客。——译者

非紧邻，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格格不相入这一点，在当时情况下却并没有形成足以使双方不能结合的障碍。尽管如此，俄国是由于迫切需要才出此策的。

1905 年，俄国经过日俄之战和第一次革命而国力孱弱，德国把苛刻的关税强加于它。结果俄国在 1907 年政策大变，甚至和英国，它的两代世仇又是它最近的敌人日本的盟国，取得了谅解。我们由此有了俄国所受压力的再一次证明；如果我们记得俄国朝廷中和官僚中日耳曼的影响，便更能证明这一点。

因此，当奥地利于 1908 年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采取这进一步行动时——格雷子爵对这行动如此重视——奥地利是在已有伤痛的地方又施打击。小小的邻居塞尔维亚抗议了，大姊姊俄罗斯帮助它。因为这意味着塞尔维亚民族独立的历史的希望之门真的闭上了；这种历史的愿望，自从 14 世纪在科索伏（Kossovo）大败以来，塞尔维亚民族始终很自豪地保持着。但是柏林的德国皇帝在维也纳穿上了“金光闪闪的盔甲”，举起他那“武装了的拳头”，在彼得格勒的沙皇面前晃摇。接着又是令人不安的几年，随后于 1912 年发生了第一次巴尔干战争，联合起来的巴尔干斯拉夫人打倒了德国训练的土耳其军队。1913 年，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不按巴尔干同盟条约的规定，未把分配从土耳其手里夺回的土地的纠纷交由沙皇仲裁，却中了德国的阴谋向塞尔维尔的斯拉夫人进攻。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发生了，由于罗马尼亚人的干涉，保加利亚人被打败了。从而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大大遏制了德国的野心，并使受奥国压制的斯拉夫人产生了新希望。

布加勒斯特条约签前后三个月，法国大使冈朋（Jules

Cambon）先生从柏林发到巴黎的十分出色的报告，说明了德国那时已决定，一旦时机到来，便要用它自己的刀来取得它通过别人未能取得的地位。积累起来的事实证明，在斐迪南大公爵（Archduke Franz Ferdinand）被刺后一周内，德国已决定抓住这个借口，非要解决这问题不可。奥地利故意以自由国家无法接受的惩戒条件强加于塞尔维亚，硬说它共谋暗杀。而当塞尔维亚作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后，甚至连奥国也踌躇了的时候，德国赶快和所有斯拉夫国家的最后靠山俄国争吵。如果俄国像在1908年那样屈服了，它就必须要和德国在1916年重订关税条约，屈膝投降，成为经济上的奴隶而别无他途可循。这一切情况大家都熟悉，但是如果我们认识到重新安排的关键在东，尽管决定性的战斗发生在西，那就有必要把这一切情况记得清清楚楚。

德国怎会犯了双重错误，既侵犯法国而又是从比利时去侵犯法国呢？德国知道俄国的弱点，并不认为俄国的攻势会像是“压路机”，把德国压瘪。它之所以选定进行较为困难的攻势，一定是根据这样的假投：从它的观点看，英国这民主国家大概是睡着了，美国这民主国家准是睡着了。德国打定主意：日耳曼超人要统治世界。它以为自己看到了一条达到这目的的捷径，不走通过“心脏地带”的较长道路，只要剥夺了岛国人在法国的“桥头堡”，“心脏地带”便必然归它控制。但是它这样做另有一个更有力的原因：它听任经济命运的支配。它倾力对付斯拉夫人，为的是市场，为的是原料，为的是更广大的可以耕种的田地。它那住在家里、吃喝在家里的大家庭每年要增加100万人。但是为了要发展这强有力的“进行中的事业”的人力——如果它能这样发展下去——便可以强盛到东征西讨，然而又永远也吃不饱地饿

着——它把汉堡建设起来了，充分发挥汉堡在向海外冒险和国内工业方面的作用。汉堡有其本身动量，这动量并不向东。因此德国的战略由于政治上的必需而发生偏差。

结果是柏林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它在两线作战，而没有完全打定主意在哪一线一定要打胜仗。你可以攻击敌人的两翼，左翼和右翼。除非你的力量足以消灭敌人，否则你必须事先决定，哪一边是佯攻，哪一边是真正进攻。柏林并没有确定其政治目标——汉堡和海外统治呢，还是巴格达和“心脏地带”——因此它的战略目的也是举棋不定的。

* * *

为命运所迫，德国人犯了大错，使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应该集中力量，想出一个重新安排东欧和“心脏地带”事务的稳妥办法来。这是当务之急。如果我们所同意的办法，并不能够全面解决在最广的意义上的东欧问题，那么我们所得的只是喘息而已，我们的后代便有必要重新调集力量，去围困“心脏地带”。重新安排的重点一定是在领土方面；因为在东欧，我们要分配经济发展还刚开始的区域，在“心脏地带”的其他部分更是如此。如果你不向前看，各区域人民的发展会逐渐使你的安排失去平衡。

没有问题会有人强调说，德国人的精神状态会因德国的失败而有变化。谁把世界的未来和平的信念寄托在任何国家的精神状态的变更上，谁就算得是个乐天派。回头看看老福劳萨尔[①]，或者看看莎士比亚，你就会发现你那英格兰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以及法兰西人的一切主要的民族性格都已经固定了。

---

① 老福劳萨尔（Froissard），大致生于1337年。死于1410年，法国的历史学家和诗人。——译者

普鲁士人是人类的一种固定式样的人，有其优点也有其劣点。我们行事还是放聪明些，要假定他们的后代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是一个模子里印出来的。不管我们到最后能打败我们的大敌到多么惨重的程度，如果我们不认识到北日耳曼人是人类最富有生命的三四个种族之一，那我们只能使我们的胜利成功大打折扣。

即便德国发生革命，我们对它的最后影响也不能过于泰然。1848 年的日耳曼革命一事无成，几乎成了个喜剧。俾斯麦之后，只有过一个日耳曼首相有政治远见。他——封·布洛（Von Bülow）——在他所写的《帝国日耳曼》（Imperial Germany）的书中说道：“德国人总是在有力的、稳健的、坚定的指导下完成其最伟大的事业的。”目前的混乱到最后可能只是出现一个新的、残酷无情的组织；而残酷无情的组织者，在达到前人早已规定的目标的过程中是不会停步的。

当然，有人可以回答说：虽然普鲁士的精神状态始终不变，虽然真正的、稳健的普鲁士民主国家发展起来是很慢的，但是无论如何德国已经穷困不堪，在未来大半个世纪中它是害不了人的。可是，这样的说法，对现代情况下财富和贫穷的真正性质的认识，是否有错误之处，是否现在关系重大的是生产力而非死的财富？我们大家不都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也是——把死的资本都花光了吗？我们，包括德国人在内，大家不是都要真正地白手起家，再次开始生产竞赛吗？法国从它的 1870 年惨败中恢复过来，恢复之速震惊了全世界。但是那时候的工业生产力量，比起目前来简直微不足道。对英国作清醒的估计得到的结论是：它那由于战争的需要经过改组和采用了新方法

而增长了的生产力，甚至应当远远超过它那巨额战债的利息和偿债基金。没有问题，你有巴黎决议在手，可以不把原料给倔强的德国，使它没有原料来和你竞争。如果你使用这样的办法，那你便推迟了你那国际联盟，你仍然是协约国联盟。再者，你是否有把握在一场经济战争中得胜？无疑你可能遏制德国，但是遏制可能使德国更加发奋图强。耶拿战役以后，拿破仑不是把普鲁士的军队数额限为 42,000 人吗？而普鲁士努力战胜了这种限制，不就首创了国家军队短期服役的现代制度吗？经济战争中要是让德国剥削斯拉夫人，不久又剥削“心脏地带”，长此以往，只能使大陆与岛之间以及陆上强国与海上强国之间的分别更其显著；凡是郑重思考了在现代铁路的条件下“大大陆”的统一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对准备进行的世界大战（这是无可避免的）以及世界大战的最终结果漠不关心。

我们西方国家在这次冲突中已经作了如此重大牺牲，我们不能够相信任何*可能*在柏林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安全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解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问题，我们必须做得彻底，使东欧和西欧一样，分成为若干独立自足的国家。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那我们不仅使日耳曼人民退到他们在这世界上的应有地位——这地位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是够重大的——而且也为国际联盟创造先决条件。

你抗辩说，如果我们将一决定性的和平强加于人，我们就会造成许多怨恨，使得将来的国际联盟一事无成。当然，你说话时想的是 1871 年并吞阿尔萨斯的结果。但是历史的教训不能根据一件事来取得。美国大规模的南北战争是打到底的。今天南方人对美国的忠诚和北方人一样，黑奴问题和某一州脱离联邦的

权利问题都最后解决了，不再成为争吵的根源。布尔（南非）战争是打到底的。而今天，史末资将军是英内阁中受尊敬的一位阁员。1866 年普奥之间的战争是打到底的。而在十来年内，奥国与普鲁士结成了两国联盟。如果你不在现在牢牢掌握胜利的全部成果，不解决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问题，那你就会造成怨恨，这种怨恨不会来自越来越淡忘的打败仗的记忆，而来自千百万有自豪感的人民的日常刺激。

*　　　　*　　　　*

东欧领土重新安排的稳定条件，是要把东欧分成三个而不是两个国家系统。极有必要在德国和俄国之间有一层列的独立国家[1]。在一代，说不定在两代的时间内，俄国如果不是成为一个军事专制国家，便不可能希望在任何其他的基础上抗住德国的渗入，除非他们有掩护，遭受不到直接攻击。俄国农民不识字，他们和城市里的革命者站在一边，已经取得了他们所希望的唯一报酬。目前他们成了小有产者，就不知道怎样才能把他们自己的乡村管好。中产阶级遭到极大的苦难，他们甚至准备接受可恨的日耳曼人的命令。至于城市里的工人，他们只占俄国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但是由于他们比较起来受了些教育，并且控制着交通中心，成为今天国家的统治者——日耳曼文化很知道如何“影响”他们。最熟悉俄国情况的人认为，如果俄国想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对付德国，某种方式的专制统治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① 下文将提到的讨论领土重新安排的具体内容，在和平会议的决议宣布后自然大体上没有什么用处了。我的目的却并不在辩驳摆在我们面前的若干问题的某些解决办法，而是把我努力逐步形成的整个概念作一具体说明。如果大家记住，我对这些问题所写的主张代表 1918 年圣诞节时的看法，那么我的目的仍然达到了。

住居于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的边疆地带的斯拉夫族及其兄弟民族，却是才具大不相同的人。以捷克人为例，在俄国的非常情况下，他们不是证明能抗住布尔什维主义，表明他们具有自己成立国家的能力吗？他们重新创立了、保住了斯拉夫波希米亚（尽管斯拉夫波希米亚三面受德国包围，一面受匈牙利包围），不是证明他们具有非凡的政治才能吗？他们不是也把波希米亚发展成为现代工业丛集之所、现代知识学习之地吗？无论如何他们是并不缺乏要求秩序井然、要求独立的意志力的。

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有这七个非日耳曼人的民族，每一民族的规模都相当于欧洲的一个二等国——波兰人、波希米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匈牙利人（马扎儿人）、南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罗马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这里面有两个是我们目前的敌人——马扎儿人和保加利亚人。但是马扎儿人和保加利亚人被其他五个民族围绕住了，如果没有普鲁士支持，他们谁也无力为害。

我们来计算一下这七个民族。我们先算波兰人，它约有2,000万人，有维斯拉河作为他们的水上动脉，还有克拉科夫和华沙两座历史名城。波兰人大体上是比俄国人更有文化的人，甚至在同俄国相连的那部分波兰地区也如此。在普鲁士省波森，他们享受到日耳曼文化的利益，而没有日耳曼文化带到当主子的日耳曼人中的某些劣质。毫无疑问，波兰人之中党派斗争激烈。可是现在，加利西亚（Galicia）的波兰贵族已不再受贿而支持哈布斯堡王朝，听任它压迫东加利西亚的吕腾人（Ruthenians）[①]了；因此党争的一个动机，一个既得利益，将渐渐消失。

① “Ruthenians”是“俄罗斯”古名“罗斯”的拉丁文名称，但并非今俄罗斯民族，

必须设法使新的波兰有通波罗的海的出口。这不仅对它的经济独立有必要，而且也因为有波兰船只行驶在波罗的海上是有好处的。从战略上讲，波罗的海是“心脏地带”的内海。此外，也因为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必须有一完整的缓冲地带。不幸的是，无论波兰通过什么地段伸展到海，基本上说德国话、情绪上又受容克贵族支配的东普鲁士省，总要和德国隔断。为什么我们不能考虑把人对调一下，以维斯拉河以东的普鲁士人交换波森的波兰人呢？[①]这次战争中我们曾做过许多规模大得多的事情，既有只是运输方面的，也有组织方面的。在过去，为了解决这样的困难，外交家们使用了专理土地事务的律师们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地役权”。但是在别人的产业上行施通行权往往是不便的，会引起争论的。在这件事情上，付出代价，采取非常的解决办法，在各方面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甚至于慷慨的方法，是否对人类有利？每个有产业的人都应该自己决定：交换财产保留国籍呢，还是保留财产更改国籍。如果他选择了后者，那他便不能保留在学校方面的或者其他方面的社会特权。美国在它的学校里严格要求移民都学英语。由于旧时的征服者对这类工作进行得毫不留情，像法国、英国这样的国家今天就是融成一体的，而让局面的自由混杂则给人类带来了一个包藏祸害的近东。为什么我

而是指“小俄罗斯人”。“小俄罗斯”是1654年乌克兰重新合并于俄罗斯后的名称。本世纪初叶时它分布在乌克兰以及接壤处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匈帝国等处，所以是当时西方人士对这些地区斯拉夫人的泛称。——编者

[①] 我写了这一段文章后，维尼齐洛斯先生（Venizelos，1864—1936，曾任希腊首相多年。——译者）于1919年1月14日在巴黎和一泰晤士报纪者的谈话中，曾说了这样的话：“这样仍然会使成千上万的希腊人在小亚细亚中部受土耳其的统治。对这样的事只有一种解决办法，这便是鼓励进行一次全面的人口相互交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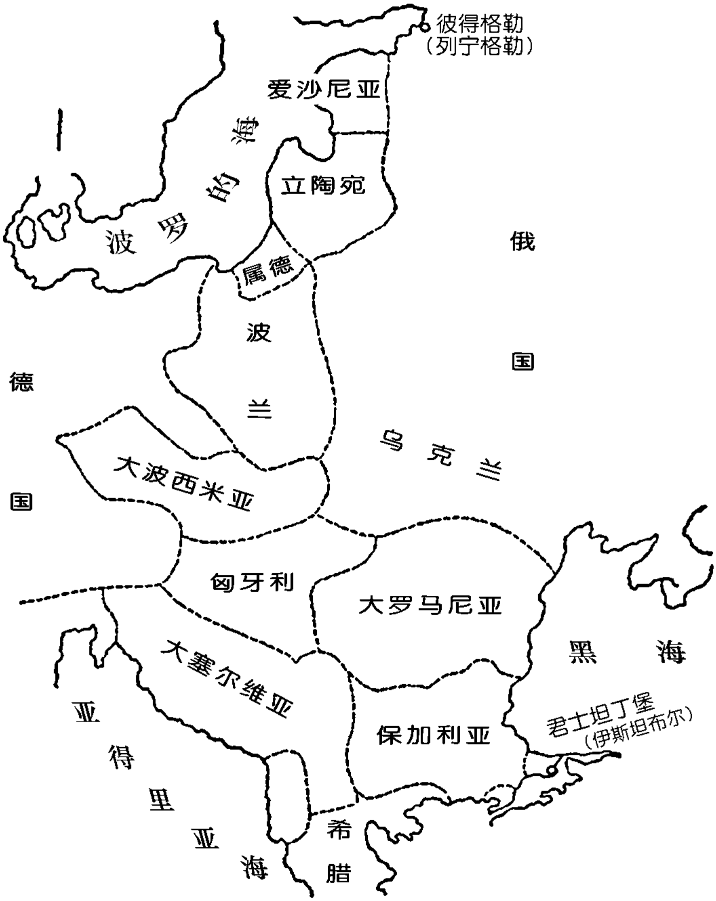


图 31．德俄之间的中间层列各国。许多疆界问题仍待解决。

们不应该使用现代运输和组织的力量，公平地、慷慨地完成同样的皆大欢喜的事情呢？这事该这样做的理由是有深远意义的：波兰人的波森会是深入德国东部边疆一个极含威胁性的海湾，

而日耳曼人的东普鲁士会是德国入侵俄国的踏脚石。[①]

我们其次的“边疆”民族是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直到最近之前，他们还是被划分奥、匈的线割裂了，就像波兰人被划分俄国、普鲁士和奥国的国境线割裂了一样。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算在一起约达 900 万人。他们可以成为欧洲最富有生命力的少数民族之一。他们拥有的国家十分富饶，提供煤、金属、木材、水力、五谷和葡萄酒，并且集中在从波罗的海和华沙到维也纳和亚得里亚海的铁路干线上。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南斯拉夫人——“巨哥”(Jugo）是“南”的意思——他们共分成三族：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总数约为 1,200 万人。他们也被划分奥地利和匈牙利的疆界线割开了。此外，他们分别信奉拉丁教和希腊教，两教是对立的。在任何熟悉巴尔干情况的人看来，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居然要和信奉希腊正教的塞尔维亚人签订科孚（Corfu）协定，雄辩而确凿的证明了它是奥匈帝国残暴统治的结果。南斯拉夫人须有通道，通向亚得里亚海上的达耳马戚亚沿岸诸港口。世界上铁路干线之一要通过萨瓦河谷，南下至贝尔格莱德，然后经过莫腊伐和马里乍“走廊”到君士坦丁堡。

罗马尼亚是欧洲这中东地带的下一个国家。罗马尼亚的天然焦点是喀尔巴阡山的特兰西瓦尼亚的大片陵谷起伏地带，其中有肥沃的山谷，蕴藏金属的山脉，油田和郁郁苍苍的森林。特

[①] 会遇到这个意见，即“根据对方的感情来论证”(argumentum ad hominem)，我要说：爱尔兰的情况里我看没有真正类似的战略必要。(爱尔兰人于 1918 年宣布独立，英国以武力镇压，战争于 1919 年 1 月开始，至 1921 年 5 月方止。作者可能是就此发表意见。——译者)

兰西瓦尼亚的农民是罗马尼亚人，但有少数马扎儿人和“撒克逊人”特权阶级在那里当统治者。在这件事情上，政治家也并非不可能作出安排，对等交换住所，或者完全接受罗马尼亚国籍；虽然必须承认，撒克逊人和罗马尼亚人之间的敌意，并不像普鲁士人和波兰人之间那样尖锐。

罗马尼亚的其余部分，即目前的罗马尼亚王国，是特兰西瓦尼亚向东向南的一片缓坡，特兰西瓦尼亚的许多河流灌溉其间。这片富饶的缓坡是欧洲石油、小麦和玉米的主要产地。1,200 万罗马尼亚人将是富裕的人民。黑海上他们拥有加拉兹（Galatz）、布勒伊拉（Braila）和康斯坦察（Constanza）诸港口。应当有罗马尼亚船只在黑海上行驶，这对全体自由人民都有极大好处，因为黑海天然是“心脏地带”的内海。国际联盟可以不必关心波罗的海和黑海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因为“心脏地带”是可以成为强大无比的军国主义的基地的。文明是靠对自然的控制和我们对自己的控制建立起来的。作为联合起来的人类的最高机构，国际联盟必须紧紧看住“心脏地带”及其可能的组织者。这和伦敦和巴黎的警察的控制，被认为是全国性的而不只是城市性质的事，是一个道理。

希腊人民是我们那中间层列七个民族中第一个在这次战争中从德国的控制下得到解放的民族。原因简单，因为他们处于“心脏地带”之外，可以和海上强国联系得上。但是在目前潜艇和飞机的时代，一个极强大的“心脏地带”国家占领了希腊，可能跟着就控制了“世界岛”。马其顿的历史要重演。

现在来看看马扎儿人和保加利亚人。事实是，这两个民族虽然没有向普鲁士人屈服，却被普鲁士人剥削。熟悉布达佩斯

的人都知道，马扎儿人深恨普鲁士人。最近双方联盟纯粹是一时权宜，不是心心相印。为数约 100 万人的马扎儿统治阶层，对其本民族其他 900 万人的压迫，不下于对被征服民族的压迫。和普鲁士的联盟——因为实际上是和普鲁士联盟而不是和奥地利联盟——纯粹是为了取得普鲁士人对马扎儿人寡头统治的支持。毫无疑问，马扎儿人在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中间招惹了深深的怨恨。但是，如果日耳曼人不能再从种地的斯拉夫人那里得到利益，一个民主的匈牙利迟早会使自己适应新的坏境。我们要记得，保加利亚人是塞尔维亚人对土耳其人作战时的盟友。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分歧目前虽然严重，却是一场家庭纠纷。这是一场最近发生的纠纷，大体上是最近成立的宗教组织间的争夺所引起的。决不能允许保加利亚人利用他仍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的阴谋。但是，如果协约国以命令规定一项平等的解决办法，对战争都深恶痛绝了的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两个民族，大概都会欣然接受。20 年来只有一个意志即日耳曼沙皇斐迪南的意志，在保加利亚决定一切。

东欧这些中间国家在战略意义上最重要之点是，各国中文化最先进的波兰和波希米亚处于北方，最容易遭受普鲁士的侵略。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的国家，除非作为从亚得里亚海和黑海一直伸展到波罗的海一大片楔入的独立国家的尖顶，否则便不能确保独立。七个独立国家总人口达 6,000 多万，铁道纵横，彼此连接紧凑，又能通过亚得里亚海、黑海、波罗的海和海洋相通，所以将共同有效地与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日耳曼人相抗衡，但是少了便不能满足要求。尽管如此，国际联盟仍然应该有权根据国际法派遣舰队驶入黑海和波罗的海。

*　　　　　　*　　　　　　*

国际政治家风度所完成的这一伟大事业，将显示出实现民主的理想并非没有可能性，国际联盟的海市蜃楼，在遥远的战争沙漠上空蛊惑我们西方人民。如果你要建立一个真正的、强有力的国际联盟，需要满足些什么必要条件？格雷子爵在他最近发表的小册子里提出了两项这样的条件。第一条是“这一理想必须为各国执政首脑热忱而坚定地采纳”。第二条是“各国政府和人民乐以觉察并清楚了解，这对每一国家的国家行动都将有某种限制性以至引起若干不便的义务。较强大的国家必须放弃用武力对付较弱国家以取得利益的权利”。

这是很好很必要的主题，但是真解决了我们的问题没有？在你承担任何一般的义务之前，不该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意味着什么吗？你那国联必须要考虑某些现实。战前曾有一个雏型的国际联盟，它的会员国是服从一整套国际法的国家。我们之不得不打这次战争，不是由于两个较强大的国家，起初对一个后来又对一个较小的国家逞凶，破坏了国际法吗？这两个较强大的国家不是差一点打败了维护法律、出面干涉、很有力量的国际联盟吗？面对着这种事实，说较强大的国家必须“放弃”用武力对付较弱国家以取得利益的权利，是否十分妥当呢？总而言之，除非我们考虑现实，否则我们的理想不是使我们作茧自缚吗？

如果你那国联要长期存在下去，便不能有一国强大到能够反抗人类的共同意志，这一点不是很清楚吗？或者，从另一方面来看这问题：在你那国联中，决不能有一个占有优势的会员国，连占有优势的会员国集团也决不能有。有没有成功的联盟而其一员是占有优势的呢？在美国，你有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

诺斯等大州，但是每一州都不过是全美国的一小部分。在加拿大，你有魁北克和安大略两相平衡，因此该自治领的较小的省大概决不会遭受这两大省的欺侮。在澳大利亚联邦，你有大致相等的新南威尔士州和维多利亚州。在瑞士，甚至伯尔尼这样的大州也没有占有优势。由于普鲁士的优势，日耳曼联邦不是只虚装门面吗？不列颠岛上权力转让的主要困难，即便爱尔兰人彼此间也同意这点，不是在于英格兰的占有优势吗？这次战争的产生，不是由于你允许一个几乎占有优势的德国在欧洲崛起吗？欧洲以往的几次大战，不是由于欧洲系统中有一国，在拿破仑、路易十四或是菲力浦二世的统治下变得太强大了？如果你那国际联盟要有什么成功的机会，难道没有必要正视这许多积累起来的事实，而含糊过去吗？

另外不是还有一个现实，“进行中的事业”的现实，也是你一定要考虑的吗？如果参加你那国联的各国要安居而过平静日子，照我看来，你一定要从两条不同途径正视“进行中的事业”的现实，一条关于现在的，一是关于将来的。关于现在的现实究竟指的什么，最好的了解办法是对现在可以作为联盟成员的国家作具体研究。

英帝国是个“进行中的事业”。你无法说服大多数的英国人，在帝国体系上去冒险——在这次战争中帝国体系胜利地经受住了考验——而拥护世界联盟的纸上计划。因此可以推论，英帝国各统治单位只能逐步地长入作为你那国联的成员的位置。实际上英帝国中六国的关系已经是平等的关系；在其不列颠联盟中，已经是彼此独立的关系。这方面的最后决定还是去年作出的。各自治领的总理从此和联合王国的首相直接联系，不用再

通过低一级的殖民部大臣。西敏寺的国会不再称为帝国国会，改称为只是联合王国的国会。唯一尚待解决的一点是：国王不该再称为联合王国以及海外各自治领的国王，而是应当承认各自治领一律平等，通过国王改称为英帝国全体成员国的国王之类的称号，表达了这平等之意。即就现实而论——虽然在一些事情中名称已成了现实——我们现在不是可以肯定，联合王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各有本国舰队和陆军，只在发生战争时才置于统一的战略指挥之下吗？就人口而论，不也只是几年时间的问题，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现在就能和母国力量相当吗？那时我们那三个次要的自治领——新西兰、南非和纽芬兰——由于三个主要的自治领彼此平衡，地位就更重要了。

法国和意大利是“进行中的事业”。它们是否会参加英帝国为其一员的国联？幸运的是，大战后期我们做到了统一战略的指挥，从而凡尔赛这个名字现在增添了历史意义。联合王国、法国和意大利已习惯于在一起商议，不再是通过大使们，而是由各国首相和总理本人商议。西欧这三个国家，不会由于其国家大小显然不等，而不适于同为一个国联的会员国。在时机到来时，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总理，不是可能会被请来和联合王国、法国、意大利的首相和总理举行会议吗？如果你承认今天的“进行中的事业”，而不想只在纸面上求进展，那么这种时机会具有更大的价值。要记住，是有了1918年德国攻势所带来的危局，才做到了战略上的统一指挥。[①]

美国又怎样，虚假地认为美国各州可以在你那国联里各自

① 在写了这段文章之后，巴黎和会把英帝国看作是个混合体——抱有某种目的的单位。

成为一个单位是没有好处的。在这次大战以前，美国打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为的是要把各州结成一体。但是比起西欧的各自分散的盟国来，美国却成为很像是占有优势的伙伴。美国必须参加你那国联，而这意味着，为了顺利地工作，大不列颠帝国的六个国家必须结合起来以作对应的抗衡。幸运的是，北美 3,000 哩不设防的疆界[①]是个好兆头，虽然可以很坦白地说，如果这条疆界所划分的两国彼此相差不很悬殊，就会更有意义，就会是一个更严格的考验。

但是，国联中需要相当数量的会员国在力量上保持合理的平衡，以便在未来的危机中——危机是会发生的——国联不会遭到被任何方面占优势的危险，这一点对于岛国会员不像对于大陆国家会员那样迫切。海上国家有其明显的限度。任何一个岛国的力量的基地，有天然疆界限定其地盘；甚至半岛也如此。国联的考验是在大陆的"心脏地带"。那里的自然界提供了最终称霸世界的先决条件。一定要有人，要有具有远见并且采取切实保证措施的人，来阻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尽管日耳曼人民和俄罗斯人民进行了革命，他们仍然是"进行中的事业"，每一民族都有其历史性的强大的动量。

既然许多国家现在都纳入世界的统一体系，那么让那些在国际联盟是唯一救世之道上见地正确的理想主义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东欧的适当划分上。德国和俄国之间有了真正独立的中间层列国家，他们就会达到目的，否则不行。日耳曼人的强国和俄国之间如果只有一条堑壕为界，像诺门（Naumann）在他写

① 指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疆界。——译者

的《中欧》(Central Europe)中所打算的那样，就会使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仍然对峙，以后也不会形成持久的稳定局面。但是中间层列各国得到世界联盟中其他区域的国家的支援，就能够达到把东欧分成两个以上的国家体系的目的。此外，这些层列国家力量大致相等，本身就是国联发展会员国的很可取的对象。

建立世界帝国的诱惑和可乘之隙一旦都消灭了，谁又能说在德国和俄国的人民本身之中会发生什么事呢？已经有些迹象：和英法不同的、只是一个空架子的普鲁士，要分裂成为若干相联合的邦。由于历史原因，普鲁士人在一个区域内属于东欧，在另一个区域内又属于西欧。俄罗斯人没有可能会分成许多州，各州结成某种松散的联盟吗？德国和俄国，是由于彼此互相反对而成长为强大帝国的。但是中间层列的国家的人民——波兰人、波希米亚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除了自卫，极不可能有任何目的使他们结成联邦。同时他们和日耳曼人、俄罗斯人都不大相同，可以相信他们会抵抗其两个强大邻国中任何一国为了建造东欧帝国而进行的任何新的组织。

“心脏地带”和阿拉伯有某些战略要地，一定要看作具有世界重要性；因为占有这些要地，可以促成也可以阻止世界霸权的形成。但是，不能因此推论，把这些要地交由未经考验的国际机构来管理是明智的。在这里，也极有必要记得“进行中的事业”的真相。一般说来，共管一向没有成功过；原因是共同实施保护的各强国的管理人员，对于当地诸民族或政党几乎无可避免地要有所偏袒。国际管理最有效的方法，似乎是委托某一强国作为人类的托管国——当然，在不同的要地要委托不同的强国。

这个方法曾试用过，柏林会议规定委托奥匈帝国负责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行政管理，就被保护的两省的物质进步而论，这方法是成功的。这新的原则和“进行中的事业”的事实，在巴拿马、直布罗陀、马耳他、苏伊士、亚丁和新加坡没有理由不能取得协调，以便美国和英帝国作为世界的托管国，来维护海洋的和平以及连接海洋盆地的海峡的和平。这样做只是把存在着的事实合法化而已。这原则的试验，和大多数其他的世界原则一样，是和“心脏地带”以及阿拉伯有关。世界上的岛国人，无论对于哥本哈根的还是君士坦丁堡的命运，都不能漠不关心，就是对基尔运河也不能漠不关心，因为处在“心脏地带”和东欧的一个大强国，可以在波罗的海和黑海内准备大洋上的战争。在现在这场大战中，使用了协约国的全部海军力量才把住了北海和东地中海。战争开始时以黑海为基地的、经过充分准备后进行的潜艇战，大概能够保证从陆上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军队的安全。因此，可以说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波罗的海的各个出口，必须国际化，不论方式如何。至于巴勒斯坦、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据了解英、法要负起国际托管的责任。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君士坦丁堡变成国际联盟的华盛顿，来解决这座历史名城的问题呢？一旦铁路网遍布“世界岛”，君士坦丁堡就成为世界上铁路、汽车和飞机交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西方的领导国家可以从君士坦丁堡发射光芒，正好照亮这很多世纪以来受压迫的许多区域；从人类大多数的观点来看，这些地区内光明是最需要的东西。我们可能以君士坦丁堡为依托，把西方和东方结合在一起，使海洋的自由永远渗入“心脏地带”。

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的基地，是这次战争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现在可以说实话了。犹太人多少世纪来被关在犹太人区内，得不到绝大多数的受人尊重的社会地位，是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发展起来的；并且由于他们杰出的品质，也由于他们有欠缺的品质，遭到一般基督徒的憎恶。德国人渗入世界大商业中心，在不小的程度上是通过犹太代理人进行的。同样，德国是通过马扎儿人和土耳其人，又有犹太人的帮助，在东南欧取得了优势地位的。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中有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很有头脑的犹太人使自己干上这种国际主义者的工作，基督教国家并无多大的权利对此表示惊讶。但是在你那由独立和友好的国家组成的国联里，并无进行这类活动的余地。因此，在世界的实际的和历史的中心有一个民族之家，就能使犹太人“洁身自爱”。应当产生由犹太人施诸于犹太人的审判标准；就是在巴勒斯坦之外仍然作为“进行中的事业”的犹太人大聚居区内，也应当有这种审判标准。这意味着要坦白接受一个民族的地位，而有些犹太人在设法遗忘这种民族地位。有人想要区别犹太教和希伯来族，但是一般人认为这两者大致是一回事，这样的看法肯定没有多大错误。

在大沙漠和大高原的边缘外，亚洲和非洲的地广人众的区域里有“进行中的事业”，例如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如果你想要放弃这种统治，以求在匆忙之间使你那国际联盟形成一种世界对称局面，那是再愚蠢不过的事。但是要紧的是，无论是胶州还是东非，都不该重归德国。德国当年占据这些地方是带有敏锐的战略眼光的，预计到在陆上推进的军队，有朝一日到了这两个地方，就到了准备齐全的堡垒。德国占领这两个地方还有其明

显目的：要使用中国人和黑人作为补充的人力，帮助德国征服“世界岛”。居住在“东印度”的一半人类最终将起什么作用，现在无人能够预言。但是保护印度人和中国人，使他们免遭“心脏地带”的征服，显然是岛国人民的责任。

德国的西南非洲和德国的澳洲的殖民地决不可交还德国。国联内各国独立的原则包含有这个意思：除却少数几处十分紧要的地点由国际托管外，每一国家一定都是自己家里的主人；这一原则对南非和澳洲也适用。任何其他原则都会成为未来争吵的祸根，会阻碍裁减军备。

* * *

关于国联的创办和目前的“进行中的事业”，说到这里为止。我们还要谈谈将来的“进行中的事业”。格雷子爵已经提到了我们处理这一国际大问题时所需要的想法。对于这件事，不是也有些更明确的话可以说吗?

我已经表明我的信念，放任式的自由贸易和德国式的掠夺保护政策都是帝国的原则，都是引向战争的。幸运的是，较年轻的各英国自治领，拒绝接受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它们利用了母国赐给它们的财政独立权，去追逐美国大政治家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早已提出的经济理想——真正独立的国家各方面平衡发展的理想。这一点也不意味着不该进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而是说贸易应加管制，其影响所及始终要有助于我们想要达到的平衡状态，而不是逐步使经济单方面发展，到达无可救药的地步。

照我看来，如果允许任何一国进行商业“渗入”，国际联盟便不可能稳定，因为这渗入的目的是在剥夺别的国家的应得权利，

使它们较熟练的工人不能就业，而如果渗入成功，便无可避免地要引起普遍不满。非常坦率地说，下述情形的结果大体就会如此，比如如果别的国家在漫无限制的科勃顿主义政制下工业上的专门化，而使有的国家意识到自己沦落到了劈柴挑水干苦活的地步。凡是一个国家的一项工业，发展到非以全世界为市场才得解决产品推销问题的地步时，那么其他国家的经济平衡便要被打乱。在这次战争后，每一重要国家都不允许本国被剥夺拥有任何“关键性的”和“紧要的”工业。[①]到了你的这两个范畴内的工业已经发展到顶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与其只是为了招架而被迫采取一个又一个的权宜措施，不如接受有吸引力的、积极的、整个经济独立的理想。如果你打算维持带有例外的、消极的科勃顿主义，那么在陈展我们面前的世界情况下，你会很快建立起一套庞大、笨重、只是关于这方面的机器。整个一套低关税和奖励金制度，会使你能迅速又轻松地应付过去每一次困难，因为你手里掌握着相应的控制机器。但是我不是要在这里详细讨论关于机器的问题，我是要讨论理想和目的的问题。科勃顿主义者相信国际贸易本身是好的，各国的专门化发展如果是由自然的原因盲目引起的，就不应该加以阻止。在另一方面，柏林人也鼓励各国经济专门化，但是他的活动很科学化，在他本国内积累的工业，都是可以使最多数的人、技术最熟练的人就业的工业。

① 这两个名词的区别一般是不注意的。关键性的工业是指本身规模虽然较小、但却是别的规模大得多的工业所必需的工业。此如在战前的英国，年产价值达二亿英镑的纺织和造纸工业，每年要用价值200万英镑的苯胺染料。二者的关系，很像开门的钥匙和门的关系。紧要的工业并不像一把小钥匙，比如在这20世纪紧要的工业是钢铁工业。保持这种区别是有好处的，因为在这两个范畴内，可能需要采取不同的防御办法。

这两种情况的结果是一样的。工业的发展中的事业控制了这个国家，剥夺了这个国家以及其他国家的真正独立。结果发生的分歧逐渐发展到争吵和冲突的地步。

关于“进行中的事业”，有三种看法要导致悲剧。第一是放任主义，亦即是投降和宿命论。这种看法所产生的情况，可以和自己不当心而得的病相比。人的身体是一进行中的事业，当其功能变得不平衡时，器官便受了感染，以致到最后，医生的告诫、甚至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也无济于事，因为要阻止病情发展意味着生命本身的终止。在上一世纪中叶的温暖太阳里，英国比较明智的政治哲学看来无疑是过一天算一天，听天由命。幸运的是，当我们在 1914 年 8 月躺在外科医生手术台上时，病情还没有发展到不可挽救的阶段。但是 100 万适龄男子不适宜服兵役构成了一种症状，使得在战争来到时人们几乎只能去感恩上帝，而战争终于来了。

和“进行中的事业”有关的第二种想法是恐慌。这是普鲁士的看法，虽然它隐藏在动听的超人哲学之中；在它还行之有效的时候，比起放任主义的过舒服日子的想法来，同样使人喜爱。但是，说实话，日耳曼文化的意思是：普鲁士人固执地抱有物竞天择的观念——这种观念最终表达于达尔文主义中——同时又包含恐怖，认为如果到最后人必须吃人才能生存，那么，普鲁士人决心无论如何要成为食人者！因此他们勤勤恳恳培养拳击选手的力气和效率。他们把自己国家“进行中的事业”发展成为一头越来越饿的怪兽，到最后他们就让它吃东西。这个世界所发生的残酷和自私的事情，有一半是由于饥慌而产生的。

第三种看法是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看法——

毫无疑问，他们相互之间自以为是不一样的，但是，你是打碎“进行中的事业”，还是把它拆碎，实际上没有多大区别。这种看法等于社会自杀。不论布尔什维主义可能在东欧以至中欧滋生什么事，在西方民主国家中应当维持纪律，这是极端重要的。西方国家的人是战胜者，只有他们才能够使全世界不像在个别国家里一再发生的情况那样，陷入理想主义、混乱、饥饿、残暴统治的循环。倘若我们不急于拆散运行中的社会机器，而是想以一个接一个的社会纪律的行动来达到我们的理想，我们就能保持生产的不断出货；也就是说，我们就能够保持目前——从前不像现在那样关系重大——文明所依托的基本现实。我们不要忘记了，整个世界的混乱意味着没有保存下什么国家基地，可以作为恢复秩序的支点，因此便使无政府状态和残暴统治无限期拖延下去。罗马的古老世界解体时曾达到的文明程度，是花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重新达到的。

但是，听任“进行中的事业”摆布就会使国家生病，我们也决不陷入恐慌，因为恐慌的结果是犯罪，也不能听任叛乱发生，因为结果是自杀，那么我们面前还有什么路呢？当然有，走控制的路，这在民主国家里就是自我克制。如果这次战争证明了什么的话，那就是证明了这些现代生产的强大力量是可以控制的。在以前，许多人认为世界大战会使经济全面崩溃，因此各国不会——不可能会——让战争发生。但是，一旦战争真的发生了，英国和德国的信贷体系多么容易就拆了伙，办法简单，用国家的信贷来继续培植从敌人的土壤中拔出来的个人信贷的根。

如果你一旦承认你的目的是要控制“进行中的事业”，那么你那国联的理想的成员国一定要是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原料

在世界上的分配是不平均的，但是人类的主要追求目标是，每个区域内要生长适合于本区的主要食品，此外，在现在来说，只需要追求整个工业中比较小的一部分了。矿物须从矿里开采，热带产品只能在热带生长，但是现在矿物和热带产品都容易运输了，因此较高级的工业可以根据人类的选择和意志来分布。我们是职业所造成的人，每一个成熟的人都带着其职业特征的烙印。国家也如此，以后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国家会同意被剥夺它应有的一份较高级工业。但是这种工业彼此息息相关，不是彼此平衡便不能发展。因此可以推论，每一国家将致力于发展工业活动的每一个大的方面；并且应该准许该国达其目的。

我深信，这是导致和平的理想。在普通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贫富十分悬殊的人是极难真正成为朋友的。这种美好的关系是和庇护以及仰仗不相容的。毫无疑问，文明有赖于劳务的交换，但应当是平等的交换。从劳务所产生的工业就业的质量观点而论，我们的金钱经济学，把价值很不相等的劳务看作是同等的劳务。要使各国心满意足，我们必须设法使国家的发展多少能够机会均等。

第七章　人的自由

考虑到我们地球上地理所带来的各种现实，我们获得了结论：如果要保全各国的自由，必须指望若干较大国家在资源的平均分配上采取一种合理的处理办法。我们也看到了，由于“进行中的事业”的现实就是横行霸道，各国的经济发展就有必要受到控制，使它们不致于不能驾御而引起冲突。但是这些原则和男男女女的自由有什么关系呢？参加国联的自由国家是否能给它们的公民以更多的自由？曾打过仗的人，冒危险在海上驾驶我们船只的人，在家工作着、盼望亲人归来和哀悼失去的亲人的母亲们和妻子们，当然不只是希望把威胁的危险击退而已。他们抱有积极的想法，希望在自己一生中，或者在他们的亲人的一生中，可以有更大的幸福。

我们来从这个观点分析一下民主理想主义的接连几个阶段，在本书最初几页中曾提到这几个阶段。美国的独立宣言说，凡是人都有权追求幸福。法国革命把这句话结晶成为一个名词：自由，又加上平等，平等是包含着控制的意思，再加上博爱，那包含着自我克制的意思。博爱是成功的民主国家的精华，是政府的各种形式中最高级也是最困难的形式，因为它对普通公民的要求最高。这是民主思想的首次循环，很直接、很显然和人的自由有关。

第二次循环开始于19世纪中叶，目标是要取得民族的自由。民族独立的要求是要求当地的人们有权共同追求幸福，由他们以自己的方法来控制，使他们之间彼此平等。博爱的情感是不容

易具有的，除非你们是在一起长大的，因此历史在民族感情中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光是民族主义，所要求的只是共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已。一直等到后来我们有了国际联盟，我们才进了一步，创造了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境界可以和法国革命的伟大的三个口号的境界媲美。大家都承认，要使各国在法律面前平等，便有必要有某种程度的控制。我还相信，各国平衡发展的理想是具有包含在博爱意义中的自我克制的。不作平衡发展，各国就肯定会发生特种饥馑，不管这种饥馑是不小心还是存心犯罪得来的，而要想使空肚子填饱，只能牺牲别的国家。换句话说，我们想要在各国之间获致永久的平等，只能既从外又从内进行控制。但是这里面包括这种说法：在实施国内政治措施时，必须着眼于其对国外政治的影响。从表面看来这种说法是陈腔滥调，但其中包括一般人所没有看到的更深的含义。

我相信，其中包括的含义之一是：既然国家是当地的社会，要使国家长期存在下去，它们的组织便必须主要建筑在国家之内的当地社会上，而不是建筑在全国范围的“利益集团”上。“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在早年的英语中的概念就是如此。“Commons”这个字，当然和法语“公社”（communes）相同，都指的是当地社会。“下议院”的真正现代译名该是“当地社会——郡、自治市——议院”。事实上，中世纪的郡选议员和自治市选的议员所代表的当地社会，比今天人为的扯平了的选区，其代表性要完整得多、平衡得多。

如果国家的真正组织是由阶级和利益集团组成的——这和按地区组织的国家不同，是另一种组织办法[1]，那么邻近各国与

① 这是H．G．威尔斯先生所指出的，虽然他会——我想他这样做是错误的

之相当的阶级，无可避免地就会彼此结合，接着就会出现被称为国际社会的横断局面。幸运的是，贝伯尔的通天塔，是某种大规模的“进行中的事业”、人们称之为各种不同语言的开始，[①]而不同的语言妨碍了国际主义。但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现代斗争的发展，促使若干短语和词汇通行于国际之间；这些短语和词汇将少数关键性的思想，变成一般人都能掌握的思想。不幸的是，它们是和某些社会现实相符合的，而这些现实，在这次战争落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正迅速地增加其重要性。国际资本的联合组织的势力正蒸蒸日上，使世界上若干较小的国家望而生畏，而德国正在利用这种组织渗入，换句话说，也就是来捣毁和它敌对的国家之经济的和社会的平衡。劳工只能如法泡制，也设法进行国际组织。因此就产生了国际无产阶级和国际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战争的思想。在这次战争的进程中，我们费了不少心血，解散了资本的国际组织。劳工现在是否会坚持其国际祖织，而废弃我们在这方面所取得的一切呢？他们的国际组织是为了打击国际资本的正确目的而形成的。如果在国际范围内组织起来的劳工的动量很强大，那么这样的废弃是少不了的，因为不废弃，国际资本主义的再起便无可避免。接着发生的经济战争的结果，不是总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便是其中一个党的胜利，该党便会成为世界的真正的政府——若干组织者的新帝国。如果劳工胜利了，那不久就可以看出，在本质方面，劳工组织者和他们的前任

——屈服于当前的趋势，而接受由“利益集团”组成组织。

① 贝伯尔通天塔，典出旧约创世纪第 11 章。贝伯尔是巴比伦古名。旧约说，该城人民建筑一通天塔，忽然大家说的语言不同了，彼此无法了解，工作便无从继续进行，并认为世界之所以有各种不同语言，是从这里开始的。——译者

军人以及资本家，在主要方面并无不同，一样也紧紧抓住权力，继续盲目地组织，直到最后被一场新的革命推倒为止。因此历史的车轮又这样转动了，再次出现同样的混乱阶段和残暴统治阶段。未来的学生学习时要多知道一个“时代”——在教会万能主义时代、军国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之后的无产阶级时代。未来的劳工领袖一旦大权在握，便会和任何其他的惊惶失措的乱世英雄们一样，毫不踌躇地用机关枪对付无组织的群众。

如果要使各国过稳定的、因而也是和平的生活，那么组织必须建筑在当地的社会上；然后这些当地的社会必须有其本身的完整的和平衡的生活，同本国的生活水乳交融。此外，你再无其他办法阻止“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组织横行霸道，横跨到你那当地组织中来。只要你让一个大都市把许多当地社会的大多数出类拔萃的年轻人吸收了去——这不过是指出目前情况中的一个方面——组织便一定不恰当地集中在这大都市中，无可避免地成为全国范围的阶级和利益集团的组织。我相信，无论我们是从人的自由还是从国家的自由的观点来看这件事，我们所得的结论是一致的：最主要的一件事是，排斥阶级组织及其口号和只是暂时起作用的药方，而代之以有机的理想，即各省过平衡的生活的理想，省以下各较小的当地社会过平衡的生活的理想。

* * *

让我们从论辩的另一头，即人的自由这方面，来考虑这件事。普普通通的人所要的是什么？穆勒说，在饮食家室之外，他要有自由。但是更现代的民主主义者不仅重视抓住机会的自由，而且重视机会本身的均等。为数越来越多的身心健康的人所要

求的，是要获得实现其抱负的机会，获得过一种对生活有种种想法、并以行动来实现这些想法的生活的机会。他的想法可能是爱情以及他的子女得到很好的教养长大成人，可能是他的行业以及对一己之所长怡然自得，可能是在宗教方面以及拯救人的灵魂，可能是在某种体育运动中出人头地，可能有关于社会组织和社会的改造，可能是在美的欣赏和艺术表达方面。总之，不管他的想法究竟是什么，他都希望过一种充分发挥理性的生活，同时也希望他那人的尊严得到尊重。

由于初级教育的普及，我们已经把巧妙处理想法的门路教给了在古代社会中是奴隶的人。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所考虑的只能是具体事物，因此宗教大师总是以比喻、寓言来布道并说得很慢。没有教育的人既无理想主义之乐，也不会遭受理想主义之害。毫无疑问，我们西方各国社会，在目前这一代正经历着一个危险阶段。半受教育的人是极易受感染的，而今天的世界大部分是半受教育的人。他们能够抓住各种想法，但是并没有试试这些想法究竟好不好而暂时不作决定的习惯。换句话说，今天大多数人是很容易接受“暗示”的。凡是对选举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一点。搞选举的人很少会停下来对他的听众细讲道理的。德国宣传家使用的方法就是暗示。

“机会均等”这一名词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控制，因为人的天性一般都差不多，没有控制就不能有平等。第二是它含有不仅是思想自由，并且是行动自由的意思，亦即是须有机会使想法经过行动的考验。萧伯纳先生说：“能够的人，做；不能够的人，教。”如果你把“能够”与“不能够”解释成为有机会与缺乏机会，那么这一相当挖苦的警句表达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真

理。[①]凡是能有机会拿自己的想法进行考验的人，便成为有责任感的思想家。但是得不到这种机会的人，一时之间可能还有种种想法，然而是不负责任地，我们也可以说是纯学术性地有此想法。后一种情况正是我们今天大部分有智力读报的工人阶级的情况。其中也有人知道这情况，并引以为憾。

我们现代工业生活中的毒素是什么？当然是单调——工作的单调，无聊的社会生活和无聊的集体生活的单调。怪不得在大战之前我们的人都买足球票打赌，以求逃避。[②]大多数关系重大的决策是极少数人决定的，而这极少数人甚至都没有人看到他们在工作，因为他们都远在那些大中心地点。

最近两三代中，是什么东西给了民族独立运动这样大的力量？中世纪时民族独立并无多大吸引力，实质上在近代直到 19 世纪都如此。这一运动之兴起，是由于现代的国家不仅疆土大了，而且在本国社会中发挥的功能也广了。这种运动是建筑在有知识的年轻人的不安于现状上的。他们希望有发展的余地，过一种富有思想的生活，并厕身于有机会做的“能够”的人之列。在古希腊时代和中古时代，社会的组织十分松散，在任何一个相当规模的城镇中都大有发展余地。18 世纪以前的城镇历史之所以饶有趣味，而 18 世纪之后的城镇历史之所以索然寡味，不正是上述情况使然吗？翻阅我们比较重要的英国城市中一地的历史，看看是否有不是这种情况的。当你翻到最近几代的时候，城市的历史便只是物质成长的若干统计数字而已；充其极，也不过是该城

① 见萧伯纳（Bernard shaw）著《人与超人》(Man and Superman)，第 12 版，第 230 页。

② 足球赛在英国类似赛马、跑狗，是一种公开进行的赌博。——译者

该镇专门发展了某项重要行业，但已不再是一完整的有机体了。它的机关、学校、社会团体等等都是第二流的，因为最有才能的人都已经走了，除非它有某种行业或某种工业名闻遐迩。但是这种行业或这种工业，往往压制了而不是发展了真正当地的生活。

为什么雅典和佛罗伦萨是文明的神泉，两城成为世界的楷模呢？按照我们目前城市大小的标准，它们都是小城。但就政治和经济意义而言，它们都是独立自主的城市。在街上握手的人，家庭彼此通婚的人，就是同一工业中互争雄长的首脑人物，就是同一交易场所抢做生意的商人，而且，人的最高级的活动的各个主要范畴，在一个亲切的圈子里已都有了。你想一想，年轻有为的佛罗伦萨人有多少机会可以选择进行什么活动，并且记住，是在本城为了本城而从事活动，毋需出去到某某遥远的首都。不是当市长，他就可能当上首相；不是当地区的长官，他就可能当上将军，率领本城军民，真正和敌人作战——当然是一场小规模战争，但是足够他绞尽脑汁，运筹帷幄。如果他是个画家，或者是雕刻家，或者是建筑师，他便会被请去担任本地纪念建筑物的工作，而不是眼看哪里来的一位大师设计这些建筑物。当然，没有人在建议你应该、或者你能够回到雅典或佛罗伦萨式的体制。但是事实具在：你发展了全国范围的阶级组织，从而把当地生活中极大部分的价值和利益都汲走。

你是否十分肯定，爱尔兰独立自治要求的要旨——在较小的程度上苏格兰也如此——不是主要从青年中来的？这些青年正在进行鼓动（虽然他们不完全理解这一点），要求机会均等，而不是反对英格兰的所谓奸猾。波希米亚人在奥地利的残暴统治下，经济繁荣，异常出色，但是他们仍然为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国家

而战。这种情况，跟我们工会的厂代表同远在伦敦办公室内的工会负责人员硬闹别扭的情况，在人情上不是有相似之处吗?

怂意破坏我们当地生活的是放任主义的原则。100年来，我们在“进行中的事业”面前深深鞠躬，当它是无可抗拒的上帝。毫无问题，它是个现实；但是如果你有从理想产生出来的政策，那可以使它就范，为你服务。放任主义不是这样的政策。放任主义只是向命运投降。你告诉我，集中是本世纪的“趋向”。我答复你说，集中是每一世纪的盲目趋向——1900年前不就有“天助富有的人”的说法吗?

研究一下伦敦的成长。一个世纪以前人口100万，今天已上升至700多万；或者以更重要的情况来说明事实：一个世纪前的伦敦人口是英国人口的1/16，现在是1/5。情况何以如此？当初国会刚成立的时候，你不但要付钱给国会议员要他去出席，因为国会议员都被当地极有趣味的生活忙得不可开交，而且不久你还要罚款，处分那没有推选代表的当地社会。事情的情况正当如此，一方面是联邦化，一方面是当地强有力的吸引力，相互牵制。当道路开始改用碎石铺成时，伦敦便成了星形的碎石路网的中心，道路都从伦敦发射出去。道路把四乡的生命带到伦敦，吸取四乡的元气来帮助伦敦的成长。当铁路修筑起来的时候，星形的干线以伦敦为中心，快车开来开去，挤四乡之奶来哺育伦敦。不久，国家也必需参与其事，建立例如小包邮递一类的制度，来加重集中的趋向。于是，周围100哩以内的商业城镇的当地生活上不同的特色，渐渐消失了。

伦敦人在五件事情当中有四件是不能从这样的变化中真正得到好处的。他住在近郊，乘地下铁道火车飞速到伦敦城的办

公室，又飞速乘回近郊的卧室；只有在星期六和星期日他才有社交生活，于是他和邻居们作乐消遣，这些邻居们和他都不过是泛泛之交。在极大多数情况下，除却通过印刷了字句的篇页外，他和知识渊博又有见识的人没有真正的接触。对他来说，同对在乡间的产业工人一样，他的有种种想法的生活同他的负有责任的生活脱节了，结果两面都受累无穷。

可是，集中只是更广泛的过程中的一个方式。我把这种过程称为由于在“进行中的事业”面前发生了国家宿命论而引起的、社会的和经济的功能的隔离。你已经让工业生活挤在某些地区内，而使其他地区陷于贫困。我承认，由于动力有靠近采煤公司的必要，这种情况过去在某种程度上是难于避免的，但不是难于避免到现在那种程度。如果控制得当，在原来的“村落”上，你是能够代之以依靠一家工厂、或者若干小工厂形成一当地社会的；在这社会中不论贫富，无分主人工人，可以结合在一起，休戚相关，援急互济。但是你不此之图，倒让你的大城市中长起“东区”“西区”来。[①]当然，真正的政治家风度的主要特征是目光远大，预防社会疾病的发生。但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我们的办法是放任自流，而一旦情况糟了，我们就使用暂时使病情减轻的治疗办法——工厂法规，住房法规等等。依目前的情况而论，唯一根本的治疗是不计代价，松散城镇。

这些意见不仅应用于工业，也应用于我们的教育机构和神学、法学和医学等职业。我们英国的制度是收买——我们必须使用这样直率的字眼，因为各学院之间是有竞争的——最最才智

① 按西区是伦敦富人聚居及高级商店集中地，东区是工人穷人的贫民窟。——译者

出众的青年，用奖学金收买，在全国公开竞争。到上一世纪中叶，我们大体上废除了有限制的奖学金制度，这种制度规定了某某学校和某某学院的关系。照我看来，这是个比较好得多的制度。你按照社会的习尚，把散在全国各地殷实之家的其他若干有幸子弟弄来扩充你的学者队伍。因此你为你那公共学校，[①]你那牛津和剑桥添补学生，开头你便把孩子们从他们当地的环境中提了出来。他们许多人大学毕了业便在集中的文官制度的官场中谋得一职，参加了集中的司法界，进了甚至也是集中的医学界。他们在伦敦呆着，人生最可贵的几年都在心神交瘁中度过了。其中少数几个人熬出了头，在不合乎情理的、隔离了的钩心斗角中显露才华。你还发牢骚，说一班律师在操纵你的政府！这整个制度是历史的动量产生的。当英格兰的全境只包括英格兰的中原地区、东部和南部时，牛津和剑桥都是地方上的大学，伦敦自然而然成为一个纯朴的农村的市场中心。但是在过去的那个世纪中，公路和铁道使大都市把原来注定要在别处农村中鼓舞人心、创造事业的人都吸引来了。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的天然位置，是在于领导他的本地人民，帮助他们负起重担。你那出类拔萃的头脑，如果保持其当地的道地风味，便能对国家作出最大的贡献。[②]

要实现发展平衡的当地社会，最严重的困难之一是：老百姓和上层阶级使用的方言不同。在英国，诺尔曼征服之后我们的农民讲英语，但是我们的爵士讲法语，我们的神父讲拉丁语。结

① 英国私立的、索费极高的、富豪人家子弟进的学校。——译者

② 作为牛津的忠诚之子，衷心感谢母校的栽培，我不愿它由于改变它的若干功能——由低级的功能变成高级的功能——而衰，我愿它由此而盛。

果是，爵士同来自法国的爵士在一起倒比同他自己的人在一起来得舒服；神父的情况也这样。我以为，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之间，目前在这方面有很奇怪的不同之处。在英格兰，专门职业者的上层阶级和地主阶级进同一学校、同一大学，商人和工业界的首脑人物也把子弟送进这些学校。因此，谈吐和风度中可以看出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的社会分界线。而在苏格兰，社会的最上层的人极大多数把子弟送进英格兰的公共学校和英格兰的大学；而苏格兰教堂的牧师们，苏格兰法庭上的律师们，医生和教师们，大体上是在当地大学中受训的。商店的老板和技工们也把他们的子弟送进这种大学，其普遍程度超过英格兰。我相信，结果是苏格兰的贵族比之英格兰的贵族更和人民脱了节。我并不责怪他们，因为他们只不过听任命运摆布而已。据说有某一位苏格兰准男爵，他有八个美丽的女儿，其中几个已届婚年，他把她们都装在一辆马车里，从爱丁堡驱车至伦敦，因为他所认识的有钱的、或是有赚钱头脑的年轻的苏格兰人，都已经跑到那里去了！在18世纪末叶和19世纪初期，爱丁堡是欧洲的灯市之一，灯的火焰并有其特色。而今天，它成了一个例证，再一次说明：把一国一省的生活中的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拆开，是无益而痛苦的。

*　　　　*　　　　*

不管我们是从国家的自由向下推理，还是从人的自由向上推理，我们都得到同一结论。同别国家兄弟相待的国家，它必须在经济上和在其他各方面独立，必须具有并保有完整和平衡的生活。但是如果它分裂成几个阶级和不同的利益集团，这些阶级和集团同其他国家中等同的阶级和集团，为了同一战斗目标

总是要结成一气，这个国家也就不能独立。因此你必须把国家的组织建筑在省的社会上。但是，如果你那省要拥有充分的权力来满足当地的愿望，那么除了联邦所特有的若干权力外，它必须有其本身的完整的和平衡的生活。这正是人的真正自由所需要的东西——在其本乡本土有过美满生活的天地。由全国范围的各阶级和各利益集团形成的组织是冲突的结果，但是这个组织不能满足需要，因为它把较有抱负的人都搬到大都市去了。贫民窟以及人民其他许多物质上的困苦，是当地生活雕萎造成的，一切都是由于违反了保持生活完整和平衡的原则的结果。

生活完整的各省，当然意味着采用联邦制度。我们所考虑的不仅是反集中，而是把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都分散到当地同一单位中的反集中。毫无疑问，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政府的行政方面，目前正有这种趋向。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是联邦。而在英国，看来我们也离此不远。阻挡联邦之途的只有一个爱尔兰问题，但这在本质上是个小问题。我们不应当让400万人的争吵，妨碍4,000多万人的疾病的根治。可能有必要把英格兰划分成南北两省，从而使英格兰不再单独成为占有优势的伙伴。而从这里所采取的观点看来，划分本身就是件好事。达到这个在望的目的，使你那省仅仅拥有管理“煤气和自来水”的权力是不够的。它们必须深入本地区的经济生活，使主人和工人都把他们的组织建筑在省的范围内。如果社会的每一单位——国家、省、地方——有权（不，应该说大家希望它）采取适当步骤，来维持其生活的完整和平衡，任何阶级和利益集团大肆扩展组织的需要，除却为了互通消息了解情况之外，将逐渐变成不迫切的了。

我们来研究一下树的生活。天然林中竞争是很激烈的，没有一棵树可以充分发挥其本身性能，长足又长得匀称。森林中部的树挣扎向上长，争取阳光；森林边缘上的树一面倒地向外伸展，而在森林阴森之处，则为朽木腐叶、种种寄生物。如果像但丁（Dante）的梦那样，树身中都关着精灵，就可以想像有一森林之叶联盟，反对树根把这许多树干长上来；又有一森林之根联盟，反对树叶把甜美的阳光和空气挡住了。但是这些联盟都是白费，因为每棵树都有根有叶。文明世界布置园林的园丁掌握着根治药方，只有他才能使树的美充分发挥。他把树隔一段种一棵，以便各树依其性能独立生长。他保护树苗，修剪幼树，把大树上的病枝砍去。结果我们观赏到地球上最使人心旷神怡的景色之一，公园中树木亭亭如盖，每棵都长足又长得匀称。只有在树枝上跳来跃去的猴子和松鼠——森林中的不易捕捉的国际剥削者和牟取暴利者——遭了殃。

这园丁的寓言也有这个含义：成长和控制的功能是分开的，并且应该使它们分开。当国家的官员成了社会主义的官员，想要创始而不只是确保成长，他们就渐渐变得不善于发挥本身应有的功能。他们的功能是批评——谅解和同情的批评，但仍然是批评。批评的气质和艺术的以及造型的热忱是冰炭不相容的。根据坚持不懈的注意发现了成长中有不平衡的迹象而提出的批评，在我们是太少了。在放任主义统治下的英国商务部，无为而治之风根深蒂固，甚至连注意“进行中的事业”在干什么的相当的机构都没有。各种各样联合的权力机构，不问是国际联盟的还是各国的，主要应当由防御性质的、警戒性质的部门组成；担任注意或者担任警戒的部门应当发出警告，一再重复发出警告，

直到引起有关的当地舆论的重视而出面干涉时为止，舆论要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就阻止“进行中的事业”的某些畸形发展，使它不能致命地破坏世界或一国的平衡。我想是在美国，农业方面的事情是由各州负责，而联邦农业局（Federal Bureau of Agriculture）是管发出警告，要大家注意保护国家的天然资源。在罗马，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国际农业协会（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Institute)，专事蒐集世界各地收获的统计数字，以及时的警告来设法稳定市场和价格。在这次战争时期，该会对协约国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完全可以预料到，讲究实际的人要告诉我，每一地区完整的和平衡的经济发展的理想，是和时代的整个趋向相反，实质上是复古的。人家要告拆我，只有采用世界组织和地区专业的方法，你才能得到大规模的、廉价的生产。我承认，目前的趋向是如此，一时之间它还可能使你得到物质上的最高成果。但是，如果你繁殖家畜，不是也有时候你在同种繁殖方面做到了头、而要再次采取杂交来繁殖吗?

雅典和佛罗伦萨之所以伟大，是在于它们看到生活的全面。如果你冷酷无情，一味以效率和廉价作为追求的偶像，那你所要给我们的世界，是青年永远看不到生活而只能看到生活的一面的世界；只有国家和国际的组织者，掌握着可以看到全景的观测台的钥匙。是否照这样子，你就能不断地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由于思想活跃而愉快的工人？一切专业化都含有死亡的种子。最大无畏的军队有时候也必须等候给养部队跟上来。在智力和怡然自得的成长方面，比任何技术教育或者有益身心的住房，要难以捉摸得多。如果拒不尽快发财，一个世纪下来，我们是否一定

就不会此我们现在富裕得多呢?

我知道,在这次战争中你已经设置了控制人员和控制人员所组成的国际委员会,像一家公司那样管理大规模的贸易,结果没有让我们挨饿。在危机时期,你这是做得很对的,使用了你那智慧和经验的资本。这许多人之所以成为那样的人,是由于他们在时刻伴随着他们的破产的不安中创立起私人企业,他们是在始终掌握着自己的企业的命运中成长起来的。大规模的组织,不问是联合经营还是政府部门,由于它们的生活中没有风波险浪,就不会无限地为你培养出大批这样的人材。

你主张必须使信贷和保险具有广大的基础,我同意。它们的功能是在于调剂由于季节不同而产生的当地的不足以及各种事业的不同程度的成就。

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要承认,它们具有以金融控制世界的危险性。你那国际联盟可能必须把它们掌握在手,否则我们就要被社会的一个“利益集团”所统治了。关于它们,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由联合的力量控制它们,或者以其他“利益集团”的国际组织和他们对抗,使之平衡。联合的权力机构,不问是联盟的还是国家的,是由成长完整的各地方社会组成的,它本性是不会想建立帝国的,因为这个机构在各处都是由发展平衡的社会组成的。但是各种大规模的专门人材的组织,在专家的指导下,无可避免地要互争上风,争夺的结果是这一种或那一种专家来统治。这就成了帝国,因为那是不平衡的。

* * *

你是否理解到:我们现在绕了世界一周,每一种制度现在都是一种冻结的制度,每一件事情的天平现在已经没有你所能改

变的了，已经没有荒凉的海岸可供不周全的考虑的赘物去安然停放了？让我们争取掌握合乎逻辑的、平衡的思想，又有切合实际的、谨慎的行动，因为我们必须应付强有力的“进行中的事业”。如果你停止它的进行，甚至减低它运行的速度，它就会残酷无情地惩罚你。如果你让它运行，无拘无束，那它又要把你带到大瀑布上，猛泻而下。你不能只用些篱笆把它拦起来，不能只是在它把篱笆弄倒后便把篱笆修好；因为这“进行中的事业”是由于百万“追求”幸福的人们组成的。他们会像大队蚂蚁一般爬过你所有的篱笆。你只能用理想的吸引力来指导人类。基督教经过了 19 个世纪，克服了对其教义和奇迹的批评所造成的种种阻碍，仍能胜利前进，原因就在此。

我认为指导我们重新建设时必须有这样的政治家风度：主张平衡的国家和平衡的省，既不与自由贸易者同流，也不和关税保护政策者合污。如果我们以这样的理想为目标，坚持一两个世纪，我们可能就渐渐改变了“进行中的事业”，从而我们就会有兄弟国家、兄弟的省，而不会有敌对的、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始终致力于扩展其界限到国际的范围，图谋迂回包抄仍然停留在还只是国家范围内的敌对利益集团。要记住，那古怪的、消极的放任主义理想，是如何在两三代中渐渐地把英国社会的整个结构都同化了，以至于要有这次世界大战才能推翻这已经成长起来的既得利益集团。

我觉得，目前我们是在零打碎敲地考虑我们如何进行重新建设，所根据的是大战前慈善家的这个那个彼此没有关系的理想——住房、禁酒、工业的调停以及其他等等。但是如果你盖了 30 万幢新房子，只是把它们放在人们“所需要”的地方，你可能又

要随波逐流了，尽管船里的压舱石重了些。

战争中我们渐渐接受了统一战略指挥的概念和统一经济控制的概念。你为了和平有无勇气采取类似规模的措施，虽然这些措施难于捉摸得多，实行起来困难得多，因为它们所要处理的是成长而非破坏的问题?

> “这过错，亲爱的勃鲁脱斯，不在我们的命运，是在我们自己，我们是庸人。”[①]

① 见莎士比亚悲剧《裘力斯·凯撒》第一幕第二场卡歇斯道白。——译者

第八章　后记

写了这本书后，我在苏格兰参加了议员竞选，我的政敌一个是自由党，一个是社会主义者。关于自由主义，现在没有什么可说的；在我们不列颠种族的特性中，总有坚强的个人主义这一项，不问个人主义运动在19世纪组成的这个政党的命运如何。但是一再出现的社会主义宣传，目前正处于意味十分深长的地步。仅仅是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在最近的许多事情中已经被证明是不行的。战时官场当权人物的工作情况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想要他们永远成为我们的主人的可能性在我认为就越少。我那社会主义者政敌是要没收土地、取消资本的利润；换句话说，他要发动一场没收充公的革命。但这不是他的立场的主要内容。拥护他的人——眼睛里燃烧着信心之火的青年，虽然常常有话而缺乏充分表达的能力——几乎在每一次集会上，都大胆地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辩护。布尔什维主义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雅各宾[①]式的纯粹暴力和残暴统治，大多数大革命在某一时期都有这种剧变，另一方面是“工团主义的”理想主义。替他们说句公道话，真正吸引了和抓住了我那些年轻的苏格兰对手们的，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后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党人反对议会制度建筑在地方社会的基础上，用他们的话说，这种制度是建筑在许许多多社会的金字塔上的，每一座塔尖上有一个资本家。他们的理想是成立各种职业的苏维埃的或者各种工会的联合组

① 雅各宾（Jacobin）是法国大革命时的激进派。这里是泛指。——译者

织——工人的苏维埃、农民的苏维埃，如果你同意，还有专门职业者的苏维埃。因此，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彼得格勒的和在柏林的一样，一贯反对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形象制定议会政体的国民会议。他们的反抗，是趋向于依照利益集团进行组织，而不是依照地区。[①]按照在本书中列举的理由，我相信，这样的组织将无可避免地导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式的国际阶级战争，最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的一派反对其他派别的战争——俄国的城市工人现在已经在和俄国农民发生争执了。结果只能是：不是世界无政府状态，便是世界残暴统治。

因此我回到我那静静的书房里，相信我所写的是切合于这次人类大危机的实际生活里的热流的。我们英国关于下议院或地方议院的古老概念，美国关于各州各省联邦的概念，以及关于国际联盟的新理想，这一切，都是反对东欧和“心脏地带”专制政体铸成的政策，不论其为哪一个王朝的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专制可能是王朝专制的极端反应。但是事实仍然是：俄罗斯、普鲁士和匈牙利平原，它们的社会情况又极大部分相似，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和工团主义的宣传都是有利的。西方人和岛国的人必须抵抗这双头鹰的陆上强国。甚至在他们自己的半岛上和岛上，现代的交通工具已夷天险为平地，从而利益集团的组织构成了真正的威胁。在“心脏地带”，天然的显著不同较少，只能假着自觉的理想的帮助，顺着人心要求民族独立的趋向来形成政治生活，我们才能够保有真正的自由。即便只是作为“掺入”这危险的“心脏地带”的基础，海洋人民也必须努

① 农民的职业的苏维埃带有地方性，只是偶然的。地方性的充分涵义是指把各种当地的利益都汇集在当地社会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苏维埃不是地方性的。

力把他们自己的组织更巩固地扎根在地方上，在环境许可的范围内，各地尽可能使其本地生活完整、平衡。这种努力必须从上到下，从省一直贯彻到城市。“东区”和“西区”把我们的城市分成不同的社会阶级，不论作多大牺牲我们一定要减少这种显著的差别。地方上政绩卓著的领袖人物，注目地为其较弱的父老兄弟的利益服务，一定要成为我们的理想。

曾有过一个时期，人以“朋友们、邻居们”来称呼。我们仍然有我们的朋友，并且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阶级的，但是往往他们散处四方。或者，如果碰巧靠近我们，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阶级相聚而同城里其他的自己人相隔开吗？中世纪初期便如此。据说那时候可能在市场上相会的三个人，一个服从罗马法律，另一个服从法兰克人的风俗，第三个服从哥特人的风俗。今天在印度的印度教徒、回教徒和基督教徒也如此。14 世纪的佛罗伦萨，柏里格尔斯时代[①]的雅典，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则都不是如此。

由于我们住在城市里和郊区的人太多，生活在都市的文明之中，“近邻”这一古老庄丽的名称几乎废弃不用了。今天世界在呼吁，要的正是睦邻精神，反对的是到处游荡——只是因为有了现代交通的机会。我们要重新控制住自己，否则我们便要成为世界地理不折不扣的奴隶，遭受唯物主义的组织者的剥削。睦邻精神也就是对跟我们同住的人尽兄弟之责，它是作为一个幸福的公民的唯一可靠基础。其影响自下而上，从城市经过省到国家，又到世界的国际联盟。这是一服良药，既适用于解决穷人的贫民窟问题，也适用于解决富人生活无聊问题；既可以解决阶级之间的战争问题，也可以解决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

---

① 公元前 495（？）—429。——译者

附录　1919 年1月 25 日发生在法国外交部的事件的札记

各协约国代表齐集巴黎，举行和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代表们要就一项决议案进行表决，该案是任命若干委员会，就拟议中的国际联盟及其他事项提出报告。各委员会的成员组织，已由仅代表大国的十国理事会讨论决定，即五个大国（美、英帝国、法、意、日）各推两名代表，其他较小国家合推五名代表。现在是把该项组织提交全体会议通过。在较小国家中有并非不合情理的不满情绪。加拿大代表罗伯特·博登爵士（Sir Robert Borden）问道，各委员会的成员组织是由谁、经谁授权决定的，这个问题应由大会来处理。比利时、巴西、塞尔维亚、希腊、葡萄牙、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暹罗和中国的代表，相继起立发言，要求各该国应在委员会中有其本国代表。于是坐在威尔逊先生和劳合·乔治（Lloyd George）先生中间的克雷孟梭（Clemenceau）先生从他的主席位置上插言。他指出，在冲突停止时，大国在战场上有 1,200 万人，它们很可以按照自己的意见决定世界的未来，但由于受了新的理想的影响，它们邀请了较小国家和它们合作。决议案通过，未作更改。

因此，尽管在法律上假设主权国家毋分大小一律平等，但是世界仍然是靠武力统治的。本书的主旨是，如果我们希望国联永垂，便必须把拟议中的国联建筑在现实之上；这样说法是对的。再者，我们要注意到：大国的数目——五个——正好是战前

两国同盟（加上意大利才成为三国）和三国协约的合计数。大战正是由它们之间的冲突引起的。可以推论，只要目前联盟的五大国继续意见一致，我们就能保住国联。它们的数目，不足以阻止它们之中的一两个争取霸权。毫无问题，将来终有一天会有一个新的德国和一个新的俄国使它们的数目增而为七。说不定各较小国家有鉴于这次事件所暴露的赤裸裸真相，将设法各自联合。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集团、东欧中间层列（从波兰到南斯拉夫）集团以及西班牙语系南美集团（如果不包括巴西[1]），说不定都有组成的可能。无论如何，国联应当做这好事：使人类的舆论针对着陈腐的各项条约，要求在它们成为不能容忍的不合适的东西之前，进行公正的修订。但是我们不能赶时髦；民主必须考虑到现实。

① 巴西通用葡萄牙语。——译者

Ken777 校对及文字输入说明：

页码/行数	说　　　明
65 页/13 行	“两栖骑兵”，原文错为“两楼骑兵”。
104 页/15 行	“世界的自由”原文后漏一个句号。
147 页/25 行	“宾夕法尼亚”原文错为“宾夕耳法尼亚”。
178 页/13 行	“……和基督教徒”原文错为“……和教督教徒”。
95a、95b 页	原书缺图 23，由原文版图 23 翻译，补充插入该处。
全部	原书加着重点文字用绛红色显示，如：“重点”显示“重点”。
全部	原书所有繁体字及旧字形字用简化字、新字形字代替。



珍爱书籍，开卷有益，请支持正式出版物。

《民主的理想与现实》一校版，精确版面还原

全书由 凡剑（Ken777）OCR、校对、重绘封面、修图、补图制作。

感谢书友 lf7098 提供本书影印素材。

2009 年 02 月 12 日一校

Ken777
2009.02.12
eBook